

文学教育视角下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
语文课本选文的嬗变 (1949-2007)

**THE TRANSMUTATION OF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SENIOR MIDDLE HIGH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EDUCATION (1949-2007)**

付 利

FU LI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anuary 2018

文学教育视角下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
课本选文的嬗变（1949-2007）

THE TRANSMUTATION OF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SENIOR MIDDLE HIGH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EDUCATION (1949-2007)

By

付 利

FU LI

本论文乃获取文学硕士学位（中文系）的部分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January 2018

摘要

文学教育是语文教学任务之一，语文教学任务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教育、文学教育和文化教育，这些教学任务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中国国家语文教育政策的影响，一是受到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情况的影响。语文教育任务的载体是高中语文课本中的文学选文，从体裁上讲主要是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本文通过对这些选文体裁组成的变化、变化特点和变化原因的分析，找到文学教育中选文变化规律，以及选文存在的不足。论文共计六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是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文献综述和研究思路来论述；第二章主要是背景、理论预设和问题的提出，主要从国家教育政策、前六套和后七套教材分期的缘由和文学教育视角三方面论述；第三、四章是分析前六套教材和后七套教材选文的嬗变，主要从选文背后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状况、文学选文与非文学选文的教学任务、1956年版和2007年版语文课本中的文学教育为案例分析，同时也分析鲁迅的作品被选入与减少的缘由；第五章是文学教育与语文课程：工具性、经典性与时代性。文学教育有利于个性发展，有利于文学经典形成，文学选文时代性不足三方面论述。第六章就是总结和发现。本文的研究发现是，非文学选文不断减少，文学选文不断增加，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减弱，语言教育、文学教育和文化教育在加强。利用语文选修教材的当代文学进行文学教育，以便解决文学教育中的文学选文时代性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可以通过文学教育使当代文学经典的形成。

关键词：文学教育；文学选文；高中语文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

ABSTRACT

Literature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asks, language teaching tasks includ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ducation, the teaching task influenced by two factors, one is the impact of China's national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one is the people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nguage discipline nature. The carrier of language education task is the selection of literature in high school Chinese textbook, tell from the genre mainly poetry, novels, drama, and prose. Through the change of the selected article genre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zing the cause of change, change, text Selection change rule, can find the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text Selection in shortage. Paper a total of six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introduction, mainly from the research object, research method,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way of thinking to discuss; The second chapter mainly is the background , the theory of presupposition and the question put forward.mainly from the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the former six sets and the cause of the seven sets of teaching materials after staging and literature education perspective in three aspects; The third and fourth chapter is the analysis of six sets of material before and after the change of the seven sets of teaching materials selection, mainly from the selected article behind the language discipline nature understanding situation, selection of literature with the literature selection of teaching tasks, the 1956 edition and 2007 edition of Chinese textbook education as a case study of literature, as well as analysis of Lu Xun's works was elected to and reduce the reason.The fifth chapter is the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chinese curriculum:instrumental,the classic and ages. The literature education is beneficial t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s advantageous to the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lack of literature selection times three aspects. The sixth chapter is conclusion and findings. The study of this paper is the literature selection, selection of literature continue to increase, thus weakene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ducation to strengthen. Use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 choice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or literature educ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lack of literature education of literature selection time problem, at the same time also can form in literature education makes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

Keywords: Education Literature, Selected Literature, Chinese Textbook for High School,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谢 词

本论文的完成，感谢尊敬的曾维龙导师和许多关心和帮助我的老师和同学。

曾老师的帮助与鼓励，给予我无限的精神动力。论文的写作不仅有利于我的学术能力提升，更利于我意志的磨炼。这三年来，每当遇到困难，想要放弃时，老师都会出现，给予我帮助。对老师的报答，唯有好好的成长，好好的工作，这才是对老师最好的感激。

同时还要感谢方美富老师给予我的帮助，难忘方老师的细心帮助；感谢许文荣老师、余历雄老师、黄丽丽老师、陈明彪老师给予我的无私照顾。

在马来西亚几年，感受到了师生情的可贵，同学情的真挚，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文学教育视角下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课本选文的嬗变（1949-2007）为付利亲自撰写，是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学位取得之学位论文要件。

此证

日期：_____

（曾维龙老师）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金宝校区）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日期：22.1.2018

硕士学位论文提交

此证付利（学号：14ULM07879）在中华研究院中文系曾维龙博士指导之下，已完成以此为题文学教育视角下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课本选文的嬗变（1949-2007）的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pdf格式上载本硕士学位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供作拉曼大学教职员生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论文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前或同一时间提交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姓名：付利

日期：2018年1月22日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谢词.....	iv
论文核实书.....	v
论文声明.....	vii
目录.....	viii
表目录.....	x
图目录.....	x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	1
第二节 研究方法.....	11
第三节 文献综述.....	13
第四节 研究思路.....	21
第二章 背景、理论预设和问题的提出.....	25
第一节 中国国家宏观教育政策与语文教育政策的历史脉络.....	25
第二节 人民教育出版社前六套、后七套高中语文课本的分期缘由.....	30
（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前六套高中语文课本（1949-1978）.....	32
（二）人民教育出版社后七套高中语文课本（1978-2007）.....	37
第三节 文学教育视角的提出.....	48
第四节 小结.....	52

第三章 文学教育视角下人民教育出版社前六套高中语文课本的嬗变（1949-1978）	54
第一节 选文嬗变背后语文学科性质争论	54
第二节 文学选文与非文学选文的教育任务	58
第三节 1956年文学课本选文分析	64
第四节 鲁迅作品入选课本是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需要	73
第五节 小结	81
第四章 文学教育视角下后七套高中语文课本选文的嬗变（1978--2007）	83
第一节 选文嬗变背后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发展	83
第二节 文学性选文与非文学性选文嬗变的分析	88
第三节 2007年语文课本选文分析	100
第四节 小结	110
第五章 文学教育与语文课程：工具性、经典性和时代性	112
第一节 文学教育的工具性：文学接受在教学中的作用	112
第二节 文学教育的美学功能：课本的选文与经典化意义	115
第三节 课本选文时代性与文学教育	120
（一）必修课本文学选文时代性与文学教育	121
（二）选修课本文学选文时代性与文学教育	126
第四节 古代文学选文与文学教育	132
第五节 小结	137
第六章 结语	138
引用文献	143

表目录

表 1: 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课本 1952-1963 年体裁比例统计表	59
表 2: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6 年版初高中文学课本编排	70
表 3: 人民教育出版社前六套课本鲁迅选文统计情况	79
表 4: 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课本后七套教材体裁比例	90
表 5: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文学教育要求的高中语文课本中鲁迅作品统计情况	119
表 6: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套高中语文教材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统计对比表	122
表 7: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套教材中国当代选文中四个体裁统计	122
表 8: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6 年和 2007 年课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统计表	124
表 9: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6 年和 1957 年高中语文课本当代文学选文统计情况	125
表 10: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套高中语文教材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篇数对比统计表	133

图目录

图 1: 人民教育出版社前六套教材中散文与非文学性散文对比.....	61
图 2: 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文学课本 1956 年体裁比例	67
图 3: 人民教育出版社后七套教材中文学性散文所占非文学散文比例对比.....	93
图 4: 人民教育出版社后七套教材中文言文与现代文所占比例对比.....	96
图 5: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 年高中语文课本体裁比例	105
图 6: 人民教育出版社后 7 套教材与前六套教材鲁迅选文变化对比表.....	108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

文学教育是本论文的研究视角，就是说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分析、审视和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课本选文的嬗变。

在对文学教育进行界定之前，先界定高中这个概念。在中国中学教育包含初级中学教育和高级中学教育，初级中学简称初中，高级中学简称高中。初中和高中的学制各三年，就是说初中和高中的学习时间各为三年。初中主要是学习基础的文化知识，高中主要是在初中的基础上培养基本能力。以语文学科而言，初中主要是学习基本的语文知识，高中主要培养基本的语文能力，如文学的审美能力。

本文主要探讨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高中《语文》课本的选文嬗变，并藉以指出语文教育和文学教育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文学教育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重要性。按国家高中语文教育大纲的要求，高中语文课本被指定为文学教育载体，以进行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对学生进行情感体念和审美教育，以及传授人文知识。鲁定元认为：“简言之，文学教育是以文学为媒介来培养人的活动。文学教育对学生语言文化知识的掌握、语言读写能力以及审美能力的提高、思想品德的完善和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具有独特的功效。”（鲁定元，2005：32）也有学者认为：“文学教育，指的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之间，经由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丰富情感体念，获得审美愉悦，培养语文能力，进而传授人文知识、提高文化素养、陶冶道德情操的一种教育行为”（郭英德，2006：11）。孟抗美认为：“文学艺术教育是以文学为媒介培养人的艺术能力和艺术境界的自由有序的系统活动，文学教育是通过文学欣赏品评和文学创作来陶冶情操，塑造

人性的一种教育活动。”（孟抗美，2002：2）。三位学者都提到文学教育中文学文本作为文学教育的载体的重要性，文学文本是开展文学教育的物质基础，没有文本，文学教育无从谈起。文学教育可以分为体制外和体制内两类，体制外的文学教育是本人自学的，家庭的，社会的一系列方式的文学教育形式（秦春，2009：6）；体制内的文学教育是，“指文学教育纳入到国家教育体制中，规定文学教育所要实现的目标、实施途径以及评价机制等，往往以教学大纲、文学教材等形式出现，而这种体制形态的文学教育终落实到各级各类学校文学教育教学实践上”（秦春，2009：6）。体制内的文学教育是由基础的文学教育，还由专业的文学教育构成，而本文只限在基础的文学教育，本文研究的就是中国高中语文课本为载体的文学教育。因此综合以上观点，本文的文学教育定义就是：按照国家高中语文教育大纲的要求，以指定的高中语文课本为文学教育载体，进行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对学生进行情感体念和审美教育，以及传授人文知识的一种教育行为。

高中语文课本选文是文学教育的载体，就是说要从事文学教育，语文课本提供了文学教育所需要的选文，为此需要先界定语文和选文。中国著名语文教育家叶圣陶（1894-1988）认为“‘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此前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而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故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叶圣陶，1980：730）。可见“语文”的重要要求是‘听’、‘说’、‘读’、‘写’，从此以后都叫语文，或者叫语文课本。而语文课本的组成主要

是选文，这些选文分为文学选文和非文学选文，由于文学体裁分为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四分法’将文学分为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它兼顾到文学作品在形象塑造、体制结构、语言运用和表现方法等方面的特点，定名具体，类属单一，符合我国的文学传统，成为流行的体裁分类法”（陈文忠，2007：72）小说、诗歌和戏剧都是文学性作品，但是散文有文学散文和非文学散文之分。散文可分为广义散文和狭义散文，谭家健认为广义散文可分为，纯文学散文，具有文学性的散文和一般的文章。通常情况下，把前二者称为狭义的散文，即文学散文，后者称为非文学散文。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文的区别是什么呢？谭家健认为，划分的根据首先是形象性，应为这是文学区别于非文学的根本特征，其次是语言艺术，因为形象性是通过语言来体现的，最后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作者充满个性化的感情。（谭家健，2010：3）在本文中采用的是广义的散文，明确分为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文。因此文学选文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和文学性散文，非文学选文主要指非文学性散文，文学选文就是文学教育中主要教学文本，或者叫文学教育的主要载体，由于这些文学选文是语文课本选文的重要构成，因此说语文课本选文是文学教育的重要载体。

本文研究的高中语文课本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和出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是教育部所属的一家大型出版社，主要从事中国基础教育教材的出版、发行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于1950年12月1日，毛泽东题写了社名，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是中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出版家叶圣陶先生。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教育部的领导下参与拟定了2000年以前历次中小学各科大纲，目前为止先后编撰出版了1952年版、1956年版、1958年版、1959年版、1960年版、1963年版、1978年版、1982年版、1986年版、1990年版、1996年

版、2003年版和2007年版，共计13套高中语文教科书¹，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2007年，1949年是新中国刚成立，是第一套教材形成之前的过渡时期，因此以1949年为起始时间；2007年版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到2015年为止出的最新的教材，在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教材的地方依然使用2007年版教材，因此取2007年为截至时间。它编写的高中语文教材是目前中国使用范围最广，使用人数最多、使用历史最悠久的教材，因此选用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使用的高中语文课本。

高中语文课本选文的嬗变是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说论文研究的重点在这些选文体裁的构成情况的变化，这些选文变化的特点，这些选文承担的语文教学任务的变化，这些选文变化的原因，这些选文变化的意义等。需要界定高中和语文教学任务，在中国中学分为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初级中学简称初中，高级中学简称高中，它们的学制都是三年，初中教学是高中教学的基础，高中教学是初中教学的更高层次，论文研究的是高中阶段的语文课本；语文教学任务是指语文教学要完成的教学目标和内容，语文教学任务主要包括语言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文学教育和文化教育四个任务。语言教育是指，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思想政治教育是指，指对学生进行爱国、爱党和做人处事等方面的教育；文学教育在上文已经界定过，此处必在界定。文化教育是指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因此论文主要是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3套高中语文课本选文体裁构成情况的变化、变化的特点、变化的原因、变化的意义等。

¹ 以上内容摘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官方网站关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简介，下载网址是：www.pep.com.cn。下载时间 2015/11/15。

文学教育是语文教育的一部分，语文教育包括文学教育和其他语文知识教育，因此语文教育是工具性与文学性的统一。钱理群认为：“几乎每一个成年人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成长时，怕都会提到中小学语文老师对自己的影响与引导，这大概不是偶然。道理也很简单：语文教育所用的教育材料是语言文字，是各类文体的文章，文学作品又占据了很大的比重，都无一积淀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钱理群，2003：9）。钱老先生这句话说明了文学教育与语文教育的关系，文学教育在语文教育中的重要性。作为占很大文学作品的语文课本，就是文学教育研究的关键的载体和对象。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语文课本所走的道路是曲折的，从它的历程可看出新中国以来文学教育曲折的历史。中国文学教育的历史是研究当下高中文学教育问题的背景。要了解新中国以来的语文教育和高中文学教育历史，先初步了解中国的文学教育历史。

在中国，文学教育自古有之。儒家的作品如“四书五经”，“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作为文学经典成为儒家文学教育的重要教材；南朝梁昭明太子（501-531）编的《昭明文选》和刘勰（约465-520）的《文心雕龙》作为后来文学教育的重要读本和文学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著作；唐宋八大家，即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91）、欧阳修（1007-1072）、苏洵（1009-1066）、苏轼（1037-1101）、苏辙（1039-1112）、曾巩（1019-1083）和王安石（1021-1086）的作品，如明代茅坤（1512-1601）编撰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成为明清时期重要的文学教育读本。

近现代以来文学教育迎来一个新的时期。民国初期，中国依然内忧外患，国家如何建设，民族的出路在哪里，社会精英提出了各种救亡途径。而文学在救亡图存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学受到非常大的重视。梁启超（1873-1929）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胡适（1891-1962）的《文学改良刍议》，周作人（1885-1967）的《人的文学》等文章都提出文学对人的教育意义。新文化运动后，作为白话文的文学教育登上了历史舞台，为文学的普及和对民众的教育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实际上是文学教育工具功能论在近代的体现。

以上就是新中国成立前文学教育的概况，说明中国文学教育自古有之，在每个时代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高中文学教育的重要载体就是语文课本，而语文课本又受语文教学大纲的指导，在这六十年中以大纲为依据可分为两个重要的阶段：

（一）一纲一本阶段（1950年代初—1980年代末）

所谓的“一纲一本”是指全国按照统一的语文教学大纲，只使用全国统一的高中语文教材。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由于欧美的封锁，新中国实行的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更由于没有建设国家的经验，很多行业都照搬苏联模式，包括语文教育。学习苏联进行语言和文学的分家教学，文学教育有自己的大纲和课本。从语文教育和文学教育本身而言，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但由于教学任务太重，大纲要求太多，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学质量出现大的滑坡，如何改变这个情况，上世纪六十年代，对语文大纲进行了调整，取消了文学大纲和文学课本，同时随着政治气氛的变化，大纲反对把语文课当成文学课来上，工具成为语文教育

的主要目的，虽然语文课本依然有很多文质兼美的文章，但不是当成文学教育的载体，而是语文知识的载体。在“文革”十年，语文教育基本停止，所选的都是以阶级斗争为需要的文本，语文课本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真正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已经消失，更谈不上文学教育，这是语文和文学教育的灾难时期。

文革结束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面对十年的破坏，国家该何去何从，是摆在当时国人面前的重大问题，在邓小平（1904-1997）领导的“改革开放”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就是要实事求是的解决国家面对的实际问题。面对荒废已久的语文教育，该采取什么方式呢？当时的大纲几乎恢复文革前的语文教学要求，也就是语文教育是重要的工具，所选文章依然是古今中外文质兼美的文章，但还是没有提到文学教育。随着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为社会带来经济的繁荣，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新的问题和需求不断产生，人们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而这一切反映在语文教育中就是出现与社会需求的不适应的矛盾，语文教育的单纯的工具性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新的需求，寻求变革是唯一的出路。1986年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教学目的中首次出现了“健康高尚的审美观”，教学要求中提到“初步具有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文学常识的学习和文学名著阅读。这次大纲，初中依然没有提文学教育，高中不仅提到文学知识教育，文学阅读教育，更提到文学鉴赏教育。至此高中语文教育开始重视文学教育。

（二）一纲多本阶段（1980年末—2015年）

所谓的“一纲多本”是指按照全国统一的高中语文大纲指导语文教学，指导语文教材编写，但可以采用多种适合本地区实际教学情况的语文教材。80年代末,国家教委允许各地依照《九年义务教育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精神编写

不同类型的语文教材,于是,“一纲多本”中学语文教材雨后春笋般相继问世(史荣光, 2006:9)如今现行的高中语文教材是在全国现行的 2000 版大纲指引下,以人教版,苏教版,沪教版,粤教版,京教版等多个版本构成。国家实行“一纲多本”是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由于中国幅员太辽阔,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有自己独特的区域文化特色,尊重多元文化。

语文教育进入九十年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进一步的发展,社会对语文教育变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作为语文教育的纲领性文件,语文教学大纲在 1996 年首次把“初步具有文学鉴赏能力”写入教学目的,在教学内容和要求中写道:“初步鉴赏文学作品的语言,形象,和技巧”“文学鉴赏常识”“文学发展常识”“传统戏曲和影视文学常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大纲‘试用本’》, 1996: 2),很显然,这次大纲对文学教育有了很大的重视,对文学教育的内容,对审美鉴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在一些地区开始试行根据新大纲编写的教材。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华民族的复兴成为国人的梦想,社会对语文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0 年的大纲认为,语文不仅是重要的交际工具,还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学习不仅弘扬民族文化,还可吸收其他进步文化,培养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情,培养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爱国主义精神,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发展健康个性写入教学目的。

教育内容更是要求学生要感受文学形象,更要学生会品味文学作品的语言和艺术技巧的表现力,从而让学生能够初步鉴赏文学作品,还要了解课文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知识,了解中国文学发展简况,另外学生的课外自读文学名著要得到 10 部以上。

可见改革开放后，语文教育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停的进行调整，文学教育从只是社会呼声进入语文教育大纲，从而进入教学目标和教学目的，到新大纲把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发展健康的个性写入教学目的，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中国高中文学教育被慢慢重视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也是语文教育中工具性和人文性慢慢协调的过程。

中国的文学教育自古有之，从古代的“文以载道”和“经世致用”，到民国时期的文学对国民的教育意义，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强调文学对人政治教育作用，都是在强调文学教育的“工具性”，那文学教育仅仅就是这点吗？很显然，从这些年的语文教学大纲可看出，语文教学回归“人文性”，对文学教育而言，就是文学审美性文化性的回归。而文学教育的主要载体语文课本为此也掀起了巨大的变革，由过去的一纲一本，进步成现在的一纲多本，从只提“工具性”到对“人文性”的呼唤，语文教学在寻找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为文学教育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空间。

研究文学教育视角下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课本选文的嬗变这个题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民族复兴的主要标志是文化的复兴。而民族语言是其重要的载体。“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吸收都要通过语言去实现，因而语言的历史往往同文化的历史相辅相行。……语言浸透了民族文化的精神；它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民族经济、文化、心理素质各方面的特点。学习一种民族语言，也就是掌握、继承和交流一种民族文化的过程。正因为语言和民族文化有如此紧密的联系，所以研究一种民族文化，离不开对民族语言的研究。反之亦然。”(申小龙，1996：12)。这段话我们可看出，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关系是

紧密的，作为所有人必须经历的语言学习的学校教育载体---语文课本，在对文化的教育和继承上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文学作品作为语文教材的主要选文，因此文学教育就有义务承担着文化复兴的责任。

其二随着中国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相应提高。作为语文课本，如何从自身的角度来满足社会的需要，那就是要加强文学教育，培养青少年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

其三通俗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进一步的加强，各种通俗文化对青少年高中生的影响加深，如何在这种文化中以高中语文课本为基础加强语文教育和文学教育，是一个大的课题。现在的高中生面临着视觉文化，网络文化，影视文化，通俗文学等通俗文化影响，传统的文学教育受到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教育该何去何从？

这些告诉我们要为高中语文教育寻找一条突破口，既能对高中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继承，又能使学生在各种通俗文化面前，能够正确的面对，那就是加强文学教育。

我们面临着新的语文教学要求。2000 年的高中语文新大纲认为，语文不仅是重要的交际工具，还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学习不仅弘扬民族文化，还可吸收其他进步文化，把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情，培养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爱国主义精神，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这是对语文教育的要求，更是要通过文学教育来实现。这显然是把文化和审美这种人文性提到了语文教育重要的地位。

我们还面临新的文学教育问题。虽然我们的语文教学大纲已经把文学教育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文学教育在实践中还存在以下几个大的问题。其一，语文

课本中文学选文时代性不够，有不少作品较陈旧，已经不能反映时代的要求；其二：教师文学素养有待提高；其三：应试教育为主导的高考评价机制，迫使老师、学生和社会接受更加功利化的语文教育，对文学教育处于一种排斥状态；其四：语文教材中中华文化特色的选文还不够丰富，尤其是古代文学作品的诗词，散文太少；其五，尤其在当下大众文化的背景下，各种通俗文学充斥，高中文学教育更被不停的消解。

要解决文学教育面临这些挑战，笔者试图从文学教育的视角来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年来出版的共计 13 套高中语文课本中的文学选文，从这些课本中文学选文的嬗变中找到答案。

第二节 研究方法

文学教育的教育者是教师，载体是语文课本中的文学文本，学生是接受者，这个过程就是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的过程，目的是为了实现在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文学的其他社会功能。因此在研究中会使用到的文学理论就包括文学的传播与接受。

文学传播是指“传播者运用一定的物质媒介和传播方式，将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信息传递给文学的接受者”（陈文忠，2007：157），以这个定义而言，文学教育中，高中语文课本就是文学传播中的物质媒介，传播方式就是教师讲解。

文学接受是指“通过多种阅读方式与作品进行与作品进行对话、交流。接受美学的理论家认为：文学文本的接受是一种解释活动。作品的意义并不是固有的、隐藏在作品之中，而是存在于读者对作品相互作用的结果”。（陈文忠，2007：158）文学接受有三个层次，主要是欣赏、批评、借鉴。“欣赏性接受，其接受

主体是普通读者，着眼于作品的阅读欣赏，目的在于对于作品审美性的感受、体念、赏玩，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它是一种审美接受活动，满足于个性读者的审美需要，着重实现的是作品的审美价值”。（陈文忠，2007：158）在文学教育中的接受者学生就是欣赏性接受，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阅读获得情感体念和审美享受，从而实现作品的审美功能的价值，进而培养了学生们的审美能力。

“批评性接受，其接受主体主要是学者、评论家，侧重于对作品的鉴赏研究、理性批判。它是在审美体念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理论观点和审美标准，对作品进行理性的分析、研究和评价、判断。它是一种建立在审美接受活动基础上的科学活动，是审美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着重实现的是作品的包括价值在内的广泛的社会价值。”（陈文忠，2007：159）教师在进行文学教育中，必然是建立一定审美体念基础上，结合一定的理论观点和审美标准，对所教的作品进行鉴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文学教学的讲解与传播。因此教师在文学教育中是一种批评性接受，目的是通过自己的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从而实现文学作品培养学生情感体念、审美能力和认知功能等社会价值的实现。“借鉴性接受，其接受主体主要是文人、作家，着眼于对作品的借鉴、学习。它是在审美体念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个性化的研究、分析，意在探寻其成功的奥秘，借鉴其艺术上的优长，学习其创作技巧，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它是一种一审美接受为基础的学习再创造活动，审美性、创造性是其追求的目标”（陈文忠，2007：158）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审美活动，在文学教育的过程中，学生也可以通过借鉴接受来提高自己的文学创作水平，但这不是文学教育中的主要审美接受形式，在文学教育中欣赏性接受和批判性接受是其主要的接受形式。

研究用到的方法还有文本研究法，它是指按某一研究课题的需要，对相关文本进行比较分析综合，并从中提炼出评述性的说明方法。（白勰，2011：32）。对教材中的文学作品按语文教学任务把13套语文课本按文学文本体裁分类，分析，总结，从而研究课本中文学作品的变化，发现其变化规律，就是采用文本研究法在本论文中的应用。

还会用到比较研究方法，它是把不同的客观事物加以比较，从而得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对其作正确的评价。在研究过程中对13套教材的文学作品的数量和选文体裁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找到文学作品变化的规律和原因。要进一步的研究分析，要采用此法。

最后一个是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来探寻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内在规律，从而导出一般的原理，理论，有助于理论研究学习的进一步深化。在本论文中就是要通过人教版多个版本个案的分析，尤其是以1956年版、2007年版和鲁迅作品为例，从而找到这些教材中能够体现的选文变化的规律，从而帮助找到这些课本中选文在文学教育中还存在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寻求解决方法。

第三节 文献综述

本次文献综述的资料来源是专著和中国知网上的硕士，博士论文和期刊文献，以中学文学教育为，高中语文课本选文变化与中学文学教育，中学文学教育接受作为关键词分别进行检索，现将综述情况展示如下。

一、中学文学教育角度

由于中学的文学教育是语文教育的短板，相关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少研究，他们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研究：中学文学教育史角度进行研究；文学教育现

况的得失进行研究；文学教育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新课程标准下的研究等。角度不同，成果不同，为中学文学教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和其他成果，在研究中也还有不足之处，现在对这些成果和问题综述如下：

如黄耀红(2004)在《新中国中学文学教育的发展流变与反思》中认为人们对新中国中学文学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对中学文学教育地位，作用，功能及实施策略的认识过程不足,同时他也认为这也凝聚着人们对整个语文学科本质规律与发展方向不断反思的成果。学者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时期：以汉语，文学分科为标志的文学教育繁荣期,以“工具论”产生为标志的文学教育低迷期,以人文说兴起为标志的文学教育复兴期。作者是基于对新中国以来，文学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进行研究的，作者对文学教育的第一阶段有很高的评价，认为那是文学教育的繁荣期，对语文工具论对文学教育的冲击进行了理智的思考，他对第三阶段是这样认为的:与汉语，文学分科时的文学教育目标相比,现在的新课程标准更强调文学的本体功能,还'文学手段'为'文学目的',强调个体的体验与感受.所有这些,都是语文教育人文性特点的体现与人文教育的根本要求。在整个论文中，作者认为语文教育大纲对文学教育的影响是很大的，目前为此，语文教育大纲中对文学教育的要求也与文学教育规律本身一致，这是作者的发现，同时也对此肯定。此文是一种阐述，至于如何实现大纲要求的目标，具体该怎么办，论文没有提出。

同样研究的文章还包括刘真福(2001)《建国以来中学文学教育述评》，作者通过对几十年的文学教育史的回顾，寻找其中的得失，他认为教育工作者对中学文学教育理论方面，未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文学教育是摸着石头过河，作者对几十年文学教育的得失进行总结后，也提出了自己的探索，认为文学教育需要构

建自己的教学理论，进行自己的教育实践，尤其要加大文学的审美功能的研究。作者是从得失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同时也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刘国正(2000)在《似曾相识燕归来——中学文学教育的风雨历程》,回顾这几十年,由于作者的工作原因,通过他自己掌握的相关资料,为这些年语文教育中的文学教育的变迁提供了很好的阐释,是从为什么会是这种状况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这为现今的文学教育困境提供借鉴和启发。

还有几份相关的文章,它们都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这个角度来梳理文学教育的流变,文中对国家意志对文学教育的影响这个问题看得特别清楚,或文学教育历史上的得失,或对现在文学教育的启发等。这种角度的好处是,对中学文学教育史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能从历史中找到原因;不足在于面对文学教育的现状,怎么办的问题,很少提出可行的方案,只是事实和问题的呈现。

周呈武(2003)在《中学文学教育现状研究》一文中,通过调查,他认为文学教育出现的问题,不是单一的原因,是一个系统化的,多方面的,如社会环境的影响,教育理念是否科学完善,课程设置是否科学,教育内容是否丰富,有趣,教育形式方法是否吸引学生,评估机制是否科学完善,物质条件是否具备等诸多方面。他认为要改变文学教育这些现状,需加强文学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形成一套完善的科学的理论,探索出可行高效的方法,转变文学教育的观念,完善结构,创造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和方法来激发学生文学学习的兴趣,总之对文学教育有效的措施,一定要尝试。本文是从文学教育的现状展开研究的,从而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作者其实也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任万军（2002）在《中学文学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中认为，现在的语文教育中文学气氛淡薄，语文教育的功利性太强，导致文学教育的人文性太弱。作者认为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语文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方法落后；语文教师的素质尤其是文学审美鉴赏水平不足；考试评价存在缺陷；中学生对语文和文学不是没有兴趣，只是审美趣味不高；课外活动开展不足，学生的课外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些是导致中学文学教育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些情况，作者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首先，着眼素质教育，改变教育观念；其次，立足教学改革，优化教育过程；接着，致力于继续教育，提高教师素质；再次，改变教学评价方式，为文学教育创设宽松的环境；最后，拓宽途径，开展课外活动。作者通过文献与调查的方式，发现上述问题，然后分析其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王雪艳（2003）在《还中学文学教育以本原面目》中，针对人们对中学文学教育的认识不够深入的问题，对中学文学教育的概念，文学教育的定位，文学教育的本质进行了阐述。对中学文学教育的构成，特征，功能进行界定并提出了中学文学教育的内容和相关教育的要求，如要对学生进行文学知识，文学欣赏，文学创作和文学评价的教育。作者是针对文学教育认识的问题而言，通过这些阐述，从而加深文学教育认识，但很多都停留在理论上。

周正逵（1988）在《中学文学教育问题浅谈下》中认为，中学文学教育还应该关注如何编写适合中学生阅读的文学教材问题，文中提到虽然我们现行教材有很多文章为文学作品，但在实际教育中相当排斥文学教育，他认为应该加强中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培养，增加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的范围等措施。这是从教材选编角度进行研究的，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但没有提出很有效的措施。

以上是对文学现状进行的研究，如有人提到文学教育出现的问题是由一系列原因导致的，也有人认为文学教育氛围不浓，人文性不强这些现象来寻求突破，也有人从人们对文学教育认识不够的角度展开，还有从教材角度进行探讨的。他们都是试图通过分析现在存在的问题，分析它们产生的原因，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张亚飞（2007）在《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文学教育》中，通过对现代文学在教材中选文的变化，发现选文从政治视角发展到审美视角，接受主体由隐形到凸显这两个现象，从而以鲁迅的作品为例，来研究中学生是如何对其作品的接受和接受情况的，从而探讨鲁迅现象与文学教育，研究接受主体是如何变化的。这篇文章是在文学接受理论的指引下来进行研究，以个案分析给以明确，充分的体现文学教育的主体性。

沈玉荣（2006）在《从接受美学看中学文学教育目标的设定》中指出，长期以来文学教育对认知目标涉及很深，但对情感目标涉及不多，对审美领域几乎是空白。他结合新课标认为我们的文学教育应该明确情感目标和审美目标，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这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分析文学教育目标的设定这个问题，但他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缺失的问题，这是需要补充的内容。

覃善萍（2002）在《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学教育》中，提出如何对日渐丧失人文精神的中学文学教育进行重新估价和重新构想这个问题。作者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是以下原因导致的：一，现行教育体制对文学教育在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二，现行中学语文教材的结构和内容文学性淡化；三，当前考试制度和升学压力对文学教育的误导和影响；四，当代视觉文化对文字形象和文学教育的冲击；五，大众文化，网络文化，网络写作对现代中学生审美趣味的影响。针对这

些原因，作者从文学教育的作用进行了解释，并提出通过改变教育观念和实现途径来加以提升。此文是在后现代理论的指引下重新认识文学教育的现状，从而提出解决方案的。本文是把文学教育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来思考，是个比较好的角度，从现实的实际情况来考量。

朱羽、倪文尖在（2007）〈叙事学与中学文学教育〉中，针对文学教育需要引进新知识，什么新知识，怎样引进的问题，作者从叙事学的角度谈中学文学教育中知识更新的问题，他认为叙事学是一门相对成熟的知识，如何研究引入当今中学文学教育是需要一个逐步的过程。本文是从一个知识理论的角度来研究的，是一个文学知识的更新的问题，切入点很新颖。

以上所谈的是以文学研究的某个理论为依托，在此理论的指引下，研究分析当下的文学教育现状从而提出问题，更深入的探寻解决之道，这种研究方式，使全文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但有时作者所用的理论难免让人感觉牵强附会，所以在笔者的论文中这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余宇士（2011）在〈新课程背景下的中学文学教育研究〉中，提出如何在新课标的背景下，针对中学文学教育的在现有理论上，就当代中学生的文学教育实际情况，提出文学教育该如何改进，进行理论探讨，并联系实际，作者重点研究当今中学文学教育的策略和方法。作者是以新课程标准为依托，探讨文学教育理论的方法和策略，但从全文来看，亮点太少。

张则桥（2003）在〈基于新课标理念下的中学文学教育〉中，认为要在新课标的理念下，认清文学教育的功能和意义，从而在文学教育中进行实践。作者在文中把文学教育的的功能和作用放在新课标下，重新审视建构。

董学农（2014）在《论新课标下的文学教育》中，对中学文学教育的特点进行了特别的强调，也对文学教育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文学教育的一些方法，如尊重阅读主体，整体感知的阅读，多元解读等。该文从文学教育的特点入手，主要是讲解文学教育的意义，并提出建议。依然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提出自己很鲜明的观点。

对以上从新课标下的中学文学教育的研究，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新课标的指引下，对现行的文学教育理念，方法重新认识探讨，但依然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文中的观点没有太多新颖的地方，而中学文学教育需要新的突破。

以上文献综述，主要是从中学文学教育史角度进行研究；文学教育现况的得失进行研究；文学教育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新课程标准下的研究等四个方面来分析的，各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分析当下中学文学教育，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高中语文课本选文变化与文学教育

陈思（2014）在《新时期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文变革研究》中对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人教社出版的1979版、1982版、1987版、1990版、2000版、2003版和新课标版等七套高中语文教材的共同篇目进行统计和分析，然后对各版本高中语文教材的篇目总数、特色篇目、增删篇目进行归纳整理，在以上数据统计的基础上，通过对教材选文变动做历时的系统研究，来探寻新时期以来高中语文教材选文变动的轨迹，总结各版教材的选文变化特点，并从课程标准与选文变动，价值取向与选文变动的关系上来探讨选文变动的原因。该文有两大不足，一是漏掉了1996年版，它是对前四版的大改革，同时又是后三版改革的开始；一是该

文从整体语文教学任务的角度来分析选文的变化特点，问题是语文教育任务有语文教学、文学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文中该文没有论述到。

李慧涛（2011）在《新课标下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文分析》中，只对新课标下的人教版的课本进行分析，他从语文新课标选文的要求和新课标下语文教材选文变化、具体选文篇目类型和选文编排这三个方面分析。该文的问题在于，既然是变化就意味着有对比，但是只有一版教材如何对比，每一版教材都是前一套教材的改进或者变革产生的，因此不能割断历史。

田朋朋（2011）在新《时期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文变动研究》一文中，对新时期的七套教材进行分析。主要是在统计各套教材的共同篇目、独有篇目和其他篇目，基础上描述高中语文教材选文编选概况，然后教材选文文体形式变化及分析、选文作者构成变化及分析、价值取向变化及分析这三个角度来分析，探讨课程标准、价值取向与选文变动的关系，价值取向具体从政治因素、时代气息、文化内涵、审美情趣四个方面进行探究，在第五章中提出自己的建议。

以上三篇文章，都谈到新时期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教材的选文变化分析，有从价值取向、课程标准、政治因素、时代原因、文化内涵这些角度来谈选文的变化，但没有从更大的历史来看，如从1949年后，这样才能看的更清楚，也没有谈到从文学教育角度来分析，更没有谈到是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发展，推动了语文教学任务的变化。

三、中学文学教育的文学接受

张亚飞（2007）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和中学文学教育》中，从现行中学文学教材中现当代文学的选文变化入手，研究这些文学作品在文学教育中的文学接受状况和特征，以鲁迅的作品为例。此文只从文学的接受角度来分析。

沈玉荣（2006）在〈从接受美学看中学文学教育目标的设定〉中，从接受美学的对当下文学教育中的不足进行批判，认为文学教育应该确立情感和审美目标，对学生进行审美和情感的熏陶。他是从文学教育的目标入手的，没有提到文学教育的其他功能。

对以上两篇关于中学文学教育与文学接受范围类的文章的分析，可看出一个是对现当代文学接受状况的分析研究，而另一篇是对文学教育中的接受目标进行研究。他们都是从文本本身出发，至于选这些文学作品的原因，这个范畴是没有涉足的。

通过综述，无论从中学文学教育，高中语文课本选文的变化与中学文学教育，还是中学文学教育与文学接受三个层面综述分析，但都没用提到从文学教育视角下来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课本选文的嬗变，文学教育是语文教育的一部分，它的变化一定受到语文课本的变化的影响，而语文课本的变化又受到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变化的影响。从 1949 年到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共计出版 13 套教材，从文学教育的角度看，这些课本又是怎么样变化的呢？如从体裁上，从文学史角度，从文本编排体系，从典型的作家作品这些角度去分析。这些变化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有什么不足，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以上文献没有研究到的，因此笔者计划从文学教育的视角来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课本选文的嬗变。

第四节 研究思路

论文主体分为六章。

第一章主要阐述清楚研究对象、研究的方法、文献综述和研究思路。研究对象是以文学教育角度入手，论述清楚中国文学教育的历史，从而证明文学教育在中国历史上自古有之。其次是简述文学教育的载体语文课本的发展史，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即“一纲一本”和“一纲多本”阶段，主要是梳理清楚研究对象的历史发展脉络。研究方法主要是文学理论中的文学的传播与接受，通过这个理论的梳理，得出文学教育就是一次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的过程，还有文本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通过文献综述找到论文研究的题目是文学教育视角下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课本选文的嬗变。

第二章主要是论述背景、理论预设和问题的提出。主要通过三个层面来分析，一是中国宏观教育政策和语文教育政策的历史脉络，一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前六套、后七套高中语文课本的分期缘由，一是文学教育视角的提出。通过这一章阐述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套语文课本产生的背景，语文课本的嬗变背景是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国家教育政策，国家的教育政策又影响着语文学科的教育政策，另外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发展情况的影响，这种认识最后反映在语文教学大纲和语文课本上。这些原因导致 13 套课本分为两个阶段，1949 年到 1978 年，是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争论时期，这期间语文课本有 1952 年版、1956 年版、1958 年版、1959 年版、1960 年版和 1963 年版共计六版教材，称为前六套教材。1978 年到 2007 年，是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探索认识时期，这期间语文课本有 1978 年版、1982 年版、1986 年、1990 年版、1996 年版、2003 年版和 2007 年版共计七套教材。从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的变化和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两方面，分析它们整体的嬗变。对于这种嬗变要站在文学教育的角度，因此对文学教育的理论进行梳理，为后面的论述做好理论支撑。

第三章主要是论述在文学教育视角下人民教育出版社前六套课本选文的嬗变。时间段是 1949 年至 1978 年，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选文嬗变背后的语文学科性质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是语文学科是承担思想政治教育的，或是文学教育的，或是语言教学的，但这几个方面都相互排斥，这就导致了前六套语文课本所承担的任务各不相同，课本没有传承性。二是从文学选文和非文学选文的教学任务来分析。先弄清楚语言与文学的关系，为后文的论述做好理论上的准备。这些选文从体裁上分为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四个体裁在课本中的比例为突破口，从非文学散文承担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和文学文本承担的文学教育和语言教育任务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发现 1956 年的文本是承担文学教育的。以 1956 年文学课本为例进行分析，主要从这套教材的产生、文学文本的组成和课本的编排体系入手进行分析；以鲁迅作品为案例，来分析他的作品入选缘由。主要是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作品鲜明的政治特色、课本中鲁迅作品的杂文和小说选入情况进行分析。以两个具体的课本案例来论述语文学教育视角下前六套教材中课本中选文的嬗变。

第四章主要是论述在文学教育下人民教育出版社后七套课本选文的嬗变。时间段是 1978 年至 2007 年，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选文嬗变背后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发展，语文的工具性已经确立，但还不够，它还有文学性、文化性，这样语文教育的任务就变为语言教育任务、文学教育任务、文化教育任务和思想教育任务。这些任务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协调的，这就使后七套教科书发展具有继承性。语文学科的性质的探索结果体现在语文教学大纲和语文课本上。二是从文学性选文和非文学性选文嬗变的分析，先弄清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为后文的论述做好理论准备。从文学选文的组成比例的变化入手，从而找到变化

的特点，进一步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从非文学性散文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和语言教学任务，文学选文的语言教育任务、文学教育任务和文化教育任务入手分析选文的嬗变，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文学教育。三是以最重视文学教育的 2007 年课本为例进行分析。从课本的产生、文学选文的构成、与 1956 年的选文编排进行对比、鲁迅选文减少原因共四个角度具体分析选文的嬗变。

第五章主要是研究文学教育与语文课程：工具性、经典性和时代性，从文学教育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文学教育有利于文学经典的形成、课文选文时代性不足与文学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就是重视国民个性的发展，文学教育能体现个性发展观。文学教育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就是在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审美感知和审美创造力，这些能力都是个性化的，这就是文学教育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观，这就是文学教育工具性的体现。文学教育就是对文学的诠释与传播，是文学经典形成的方式，以鲁迅的作品作为案例分析，分析其作品在文学教育时期如何成为文学经典的。通过对 13 套教材中当代诗歌、当代小说、当代戏剧、当代散文比例分析发现，前三者无论是在前六套教材，还是在后七套教材中比例都是最低的，尤其是在两套重视文学教育的教材中当代诗歌、当代戏剧和当代小说严重不足，针对这个问题，建议充分利用选修教材弥补必修教材当代文学选文的不足，对选修教材的发展进行回顾，尤其是对 2007 年必修教材配套的选修教材进行详细的阐述，从这套选修教材选入当代文学作品进行文学教育，以弥补必修教材当代诗歌、当代小说和当代戏剧选文不足，同时通过使这些当代文学作品加入高中文学教育，有利于这些作品文学经典的形成。

在论文的结论中主要是讲述两个问题，一是研究发现与目前研究的限制，二是未来的研究建议。

第二章 背景、理论预设和问题的提出

第一节 中国国家宏观教育政策与语文教育政策的历史脉络

中国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与国家教育政策和语文教育政策影响人民教育出版社对高中语文课本的编写。

中国共产党建政开始就面临着如何建国的问题，虽然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但对于如何建设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他们是没有经验的，这对于他们而言，比革命斗争还难。在 1949 年到 1978 年 30 年的时间里，面对如何建设国家，产生一场巨大的争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建设国家还是以经济建设为纲来建设国家，从而进一步形成如何斗争与如何建设的争论，这些争论很快就在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里体现出来。

在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教育方针政策作了规划，它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中共中央，1949：118）。在共同纲领中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一观点在后来的全中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得到更进一步的明确，会议认为“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1958：8）这解决了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当时学习对象是“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

义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1958：8）。这个指导思想具有开放性，兼容并蓄，学习新旧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就这些被否定了，开始全面向苏联学习，从教育制度、教育理论、教育管理等方面进行学习，构建苏联的社会主义教育模式，但它不适合当时的中国国情，1958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得到了纠正，认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必须由党来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1959：4）这个指示确立了新的教育方针，否定了全面学习苏联的模式，而是把教育当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工具，从此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重要的教育任务，这一教育政策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到极致，完全破坏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教育的探索成果。

1978年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作为国策得以确立，一个稳定而开放的国内国际环境，推动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教育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转换到为建设服务。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任务，要求我们非但必须放手使用和努力提高现有人才，而且必须大力提高全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90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人才。”而且“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中共中央，1985：44）这个决定使国家的教育方针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需要培养新的人才，所以需要新的教育改革。1999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首次提出素质教育，“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

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道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共中央国务院，1999：4）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关注国民素质的教育，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把教育用来全面服务于国民。新中国的教育由最初的为人民服务，发展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再发展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再发展到为全面提高国民的素质服务，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复兴成为中国教育面临的新的任务，只有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而民族文化的复兴只有以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因此必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因此教育部在1999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基础上，制定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这里的基础教育指幼儿教育、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目标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课程培养目标应体现时代性”，“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对于普通高中课程“高中以分科课程为主，为使学生在普遍得到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现有个性的发展，课程标准应有不同水平的要求，在开设必修课的同时，开设丰富多样的选修课，开设技术类课程，实行学分制管理”。（教育部，1999：6）这次改革落实到基础教育的课程，从具体的课程入手。中国中学文化教育的课程主要是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化学、物理和生物，共计9门课程。初级中学9门课程都在学习，高级中学分文科和理科，文科学的课程是语文、数学、英语，外加政治、历史和地理，理科的课程是语文、数学、英语，

外加化学、物理和生物。不管文理科，语文都要学习，原因是，语文是学习这些课程的工具。“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语文学科是学习各门学科的基础。语文学得好，对其他学科的学习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将来从事工作和继续学习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2001:456）。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接受基础教育的人是最多的，只有把基础教育改革好了，大多数国民素质提高了，才是素质教育的关键，只有这样素质教育才能为民族复兴提供动力。

语文教育政策受到国家教育政策的影响，在中国语文教育政策通常是指语文教学大纲，包括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初中语文教学大纲、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和大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导高中语文教育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是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从新中国成立后，高中语文课本是在国家语文教育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编写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2007年，共有八个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这里的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和一个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它们分别是：《1956年高级中学文学教育大纲（草案）》、《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草案）》、《1980年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1986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1990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1996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2000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育大纲》和《2003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新课程标准》。在中国全日制中学包括普通初级中学和普通高级中学，学制各三年，本文研究的是普通高级中学，后文简称高级中学或者高中。在1996年之前，除了1956年的文学教育大纲之外，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的语文教学大纲都是合在一起的，从1996年开始，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的语文教学大纲开始分开。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的语文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不同的两个阶段，是不可

分割的，初级中学的语文学习为高级中学的语文学习打下基础，高级中学的语文学习是初级中学语文学习的深化。因此两个大纲合在一起，但二者又有不同，为了更有针对性起到语文教学的指导作用，就让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大纲分开，从2003年开始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开始称为普通高级中学新课程标准。

语文教学大纲分为两个阶段：“一纲一本”阶段（1950年初-1980年末）和“一纲多本”阶段（1980年末至今）。所谓的“一纲一本”是指全国按照统一的语文教学大纲，只使用全国统一的高中语文教材。在“一纲一本”阶段，都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编写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依据是语文教育政策，即语文教学大纲。“一纲多本”是指按照全国统一的高中语文大纲指导语文教材编写，各地区可以采用适合本地区实际教学情况的语文教材，高中语文课本依然是在全国统一的语文教学大纲下编写，但出版单位不只人民教育出版社，如有江苏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等地方出版社编写中学语文教材，这就为各地区的中学语文教材提供更大的选择，使教材适合地方、学校及学生。本文研究的高中语文课本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和出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是教育部所属的一家大型出版社，主要从事中国基础教育教材的出版、发行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于1950年12月1日，毛泽东题写了社名，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是中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出版家叶圣陶先生。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教育部的领导下参与拟定了2000年以前历次中小学各科大纲，在2000年后，它依然继续编写中国高中语文教科书，如2003年版和2007年版，目前为止先后编撰出版了13套高中语文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依然继续编写高中语文教科书。它编写的高中语文教材是目前中国使用范围最广，使用人数最多、使用历史最悠久的教材。

通过以上国家教育政策和语文教育政策的梳理，可以清晰的看到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式影响着国家教育政策的形成，国家的教育政策又影响着语文教育政策的制定，这些因素影响着人民教育出版社对高中语文课本的编写。之所以选择高中语文课本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高中生与初中生相比，初中是重视语文的基础知识，而高中注重语文基本能力的培养。高中生的身心更适合语文学习难度的加大和加深；同时高中生的身心已经适合接受文学审美教育。

第二节 人民教育出版社前六套、后七套高中语文课本的分期缘由

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着国家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国家教育政策指导着语文教育政策，语文教育政策又指导高中语文课本的编写。另外高中语文课本的编写还受到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影响，语文学科性质决定语文的教学任务。张传宗认为“学科的性质对教学任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学科具有怎样的性质，就具有怎样的教学目的，语文学科也不例外，它的性质决定他的教学目的任务。”（张传宗，1999：10）语文学科性质是指语文学科所具有的特性，如语文工具性，是指语文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工具，就是要解决使用语言文字工具的问题，可以进行语言教育；如思想政治性，是指语文可以进行思想政治意识形态教育；如文学性，指语文可以进行文学教育；如文化性，指语文学科可以进行文化教育，如知识性，指语文教学中还要有知识教育。“语文学科的工具性、思想性、文学性和知识性，决定了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和其他任务。培养听、说、读、写能力是基本任务，思想教育是重要任务，文学教育和知识教育是应有任务”。（张传宗，1999：10）。

从 1949 年至 2007 年，人们对语文学科的认识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949 年到 1978 年，这是语文学科认识的争论期。争论期是指，在这一时期，语文学科的性质是政治性、文学性、还是工具性，人们一直处于一种争论之中，表现在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不确定，即一下认为语文学科只具有政治性，因此只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一下认为语文只具有文学性，只进行文学教育；一下认为语文只具有工具性，只进行语言教育。三个性质相互排斥，三个教育任务也就相互排斥，这里的排斥是指在一套教科书里，只能体现一种语文学科性质和语文教学任务。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最终通过语文教学政策确定下来，也就是语文教学大纲，而语文教学大纲又指导着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高中语文教材。因此把语文学科性质的争论期作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产生的 1952 年版、1956 年版、1958 年版、1959 年版、1960 年版和 1963 年版教材称为前六套教材。第二个阶段是从 1978 年至 2007 年，这是语文学科认识的探索发展期。探索发展期是指，人们已经确定语文学科性质是工具性，但还不够，通过不断的探索认识到，语文还有政治性、文学性和文化性，因此语文教学，应该具备语言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文学教育和文化教育，这一时期语文学科性质和语文教学任务在教材里的体现是不断增加的，这一时间产生的 1978 年版、1982 年版、1986 年版、1990 年版、1996 年版、2003 年版和 2007 年版教材，称为后七套教材。现在把这两个阶段的课本进行整理，第一阶段，即前六套(1949-1978)：1952 年版、1956 年版、1958 年版、1959 年版、1960 年版、1963 年版；第二阶段，即后七套(1978-2007)：1978 年版、1982 年版、1986 年版、1990 年版、1996 年版、2003 年版、2007 年版。

（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前六套高中语文课本（1949-1978）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新中国建国后，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先进国家对新中国进行封锁，国家的外交政策采用了一边倒向苏联的方针；国内政权需要得以巩固，百废待兴。面对内忧外患，当时的中央政府全面向苏联学习，当然也包括语文教育。所以此时的国家语文课本有明显的两个特点：一是政治意识形态浓；二是教材内容的编排苏联化。语文课本政治化，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而脱离了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在共产党统治的解放区实际上也在进行着自己的语文课本尝试，有自己的国文课本，这是由语文教育家叶圣陶主编的国文教材，这些教材经过改编后在1949年秋的的中小学国文课中得以使用，是一种临时性的过渡教材。这些教材采用白话文，课文的特点是高度的政治化，有很强的政治性。

1950年，国家的语文教育纲领性文件还没有制定，但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名义下写的《编辑大意》，起到了教育大纲的作用，它提出了“语文”这个概念，认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是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为‘语文课本’”（顾振彪，2001：511）。提出了按照“听说读写四项并重”的原则，也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第一”指导²。1950年12月，叶圣陶³成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按照“听说读写四项并重”原则，在1951年7月编写出版了第一套《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和《高级中学语文课本》，以及后来的修订本，1952年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课文中出现革命政治话

² 《编辑大意》是一个临时性的指导文件，次文选自《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2月1日，第27页。

³ 叶圣陶(1894, 1988)，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

题的文章很多，初中如《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学习白求恩》、《任弼时同志二三事》。高中选了大量反映革命与斗争的作品，语文课本变成了政治教育的工具，但它坚持了一个重要的原则，注重学生听、说、读、写，对学生这四个方面的能力的培养，这四个能力培养的提出与叶圣陶在民国时期参与的国文教育大变革实践是分不开的。顾振彪认为这套教材主要有四个大的问题“第一，忽视语文课本的工具性”；“第二，忽视语文知识”；“第三忽视文言文”，“第四，编排上缺乏严格的逻辑程序。”（顾振彪，2001：512）

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第一”，说教性太强，语文课本更缺少文学性，并且没有解决这些当时课本存在的问题，随着国家政治局面的稳定，这需要进行调整。

1956年教育部颁发了初高中《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明确提出了汉语与文学分开教学，要求在初中进行汉语文学教育，高中没有汉语课本，只进行文学教育，这使文学教育受到了重视。195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叶圣陶的领导下，按照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把语文分为汉语和文学两个部分进行编写，实行两个教学大纲和两套教材：即《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初级中学文学课本》和《高级中学文学课本》。由于向苏联学习，此时的《初级中学文学课本》引入了不少苏联优秀的文学作品，如契诃夫《小公务员之死》，普希金的《寄西伯利亚》等，使课文的文学选文增加了外国元素，增加了多元文化的因素，当然也体现出意识形态的选择，但《高级中学文学课本》就没有选入外国文学作品。这两套教材形成了系统的汉语知识教育和文学教育，是中学文学教育的第一次大胆尝试。但这套两套教材中文学教育任务过大，师生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难以操作，尤其是高中的文学课本只重视文学教育，

对学生语文基本能力训练未加以重视。语文教学成绩受到影响；加上左倾思想的影响，认为课本脱离了思想政治教育。（顾振彪，2001：520）

1958年的“大跃进”⁴终止了1956年大纲的执行，终止了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教学，同时在当年8月，政府允许各地自行编写教材，语文课本失去了大纲统一指导，课本中文学性较高的文学作品被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文章所取代，语文课变成了宣传课，语文教育无纲可依，完全违背语文教学规律，导致语文教育质量下降。针对1958年课本的问题，1959年和1960年都相继进行了调整，最明显的是1960年。对语文课本政治化严重的文章进行了一定替换，各册课文分为精讲和略讲，课文按照表达方式，即记叙、说明、议论来编排，语文知识分散在每一册课本中，这种编排对后来的课本影响很大。通观这三套教材，思想政治教育依然是第一位的，这是受到当时的“左”的政治形势的影响。（顾振彪，2001：535）

“大跃进”结束后，1963年5月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这套大纲总结了十多年来的高中语文教学经验和教训。大纲提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行工作的工具”，“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63：402），从这些要求可看出大纲明确的提出了语文学科性质是工具性。同时大纲还提出：“一般不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也不要讲成文学课”。（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63：403）明确从国家层面纠正语文教学实践中不按语文规律教学，只是把语

⁴ “大跃进”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虽然这条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文课上成政治课或者文学课，但明确的否定了语文学科文学性的一面，这是对1956年大纲后，过分重视文学性的纠正，但此大纲又过度强调语文工具性而否定语文学科还具有的政治性和文学性。大纲还要求选文要“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足为学生学习的典范”，基础知识要“简明扼要，切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63：404）

此时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长依然是叶圣陶，具体负责日常工作的是戴伯韬，在1961年到1965年间，共进行了两套教材的编写：《新编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课本》（试用本）和《新编十二年制学校中学语文课本》。前一套教材是没有大纲可循的，只是根据当时中央的缩短年限，提高质量的指示，这依然带着“大跃进”的性质。这套教材，初中6册，高中4册。后者是根据《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编写的，从1962年开始，文革开始时停止，没有编排完。这套教材重视语文的工具性，对的基础知识的重视是对语文教育回归的开始。

“文化大革命”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解散，全体下放劳动教育，语文教科书按大纲统一编写的局面又消失了，各地自行编写教材。与1958年到1960年三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的语文教育相比，“文革”对语文教育的破坏是彻底的，语文课本是首当其冲。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1966年5月，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语文教育成就，当然也就否定了17年的语文教学探索，语文教学没有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只有思想政治教育，它对语文教学系统性进行彻底的破坏，如残酷迫害语文教师，挑动学生斗教师；批判17年的语文教材；“文革”批判‘学校以教育为主’，‘教学以课堂为主’，要求语文教师只能利用学生学工，学农、学军的间隙上一点课；作文练习次数太少，每学期两三次作文，大多是写批判稿，照抄报

纸，假话、大话、空话成风。在 1966 年 6 月 13 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 1966-1967 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而且此前出版的各套教材都进行了批判和否定。过去的教材都批判了，否定了，编教材的人后来也送去劳动教养了，学生用没有教材可用。1967 年 10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先前闹革命，停止念书的中小学全部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逐步提出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的革命方案，自定课程，自编教材。但各地自定课程，自编教材，需要时间，学生和老师们在这一年就无教材使用，直到 1968 年开始北京、上海等地教育部门组织人员编写暂用教材，在 1969 年发行，没有自编教材的地方只有用他们的教材。从否定 17 年教材到地方自编教材的出现，共计 3 年，这三年是没有语文课本的，最后虽有了教材，但都是没有质量只讲政治的地方教材，根本算不上是语文教科书。各地面对语文教育破坏的情况，都在想办法补救。如北京 31 中学的初三语文老师，在毛泽东“要自学，靠自己”的指示下，创造了适合他们自己的“读、划、批、写”结合的自学方法，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自学习惯和能力，这是在那个年代一次不错而有效的尝试，但就这一个尝试，最后都毁在“文革”中。“文革”越来越失控，越来越远离语文教学本身，阶级斗争意识变得更浓。在 1974 年 3 月，国务院教科组发出通知，把张铁生的答卷⁵和《辽宁日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等编入中学语文教科书。把一篇没有文字功底，只有完全的愚忠思想和对文化教育进行排斥的一系列文章编入教科书，这是对各地自编语文课本的更

⁵ 1973 年全国举行了文革中唯一的高考，辽宁知青张铁生参加全国高校入学文化考试时写在理化试卷的一封对党和政府效忠的信，信中，信中对劳动革命的肯定，对知识青年一味只学习书本知识的否定。除了这封信的字多之外，只做很少的题，但他的忠心让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肯定，在此试卷基础上作了修改后，发表在《辽宁日报》，并加入编者按：“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大学招生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后来《人民日报》、《红旗》等转载，并得到江青等人支持，成功入大学，成为当时有名的“白卷英雄”。这件事的影响是巨大的，完全使高考招生政策改变，“白卷”成了英雄，而高分者却无缘大学。

进一步的破坏。在当年的 11 月，国务院教科组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检查自编的现行教材，先抓中小学史、语、政和大学的文科教材的修订工作，再修订其他科目。目的就是要彻底的把课本变成宣传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工具。（张鸿苓等，2001:19-20）

（二）人民教育出版社后七套高中语文课本（1978-2007）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⁶在 1976 年结束了，它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是空前的，经济上、政治上、科技文化教育上都难逃此劫难，中国社会在这十年非但没有进步，而是倒退。面对这样的国家局面，该何去何从？国际上美苏冷战正酣，中苏关系在中美关系缓和的情况下，进一步恶化，面对这样的国际局面，该何去何从？

“文革”后经过两年的过渡，否定了“两个凡是”⁷的束缚，以邓小平为首的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开始了对国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决策，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⁸，从此主动否定闭关自守，尝试走向世界，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取代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国策。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国际间美苏的冷战加剧，意识形态斗争也随着加剧，最终导致中国 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国际上的东欧巨变与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后，中美新的意识形态斗争又开始，中美国家关系又开始紧张，美国为首的西方又开始加紧对中国的国际封锁，全国上下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冲击开始出现徘徊，但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没

⁶ “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的是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在中国又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

⁷ “两个凡是”是指的是在“文革”结束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华国锋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两个凡是”的目的是稳定当时失去了革命领袖后的社会，目的不是要限制邓小平的复出，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限制了人们的思路，使人民面临新的转折时不敢大胆的迈出步伐。

⁸ “改革开放是指”是指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强国之路。

有停止。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推动了“改革开放”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宣布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有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的召开，进一步排除了对改革开放的干扰思想，再次确定改革开放不动摇，又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直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重新融入国际社会。面临新的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复兴成为中国各界努力的目标，民族国家意识进一步加强，社会国家呼唤民族文化的复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对语文教育的要求更高，不再只是停留在语文工具教育本身，文学教育的要求、文化教育的要求成为语文课本改革的新的要求，因此语文课本改革提上日程，后七套教材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产生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语文教育也不例外。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戴伯韬努力主持下，1978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提出了选文要“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基础知识要“精要、好懂、好用”，教学方法上“提倡启发式”。在大纲中也明确的提出选文的标准“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这种意识形态鲜明的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78年：420-421）但也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中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78年：420）。虽然依然强调意识形态的教育，但却注意到对语文学科规律的重视，而不像在过去的的时间里，违背语文学科的规律，一味的讲政治教育。

在这一时期语文教学大纲的指导下，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全日制十年制高级中学语文》，教材中宣传政治思想的文章减少了，好的文章多起来，尤其是古典诗词被大量选入；另外更具时代感的文章被选入，如科技说明文和西方的文

学作品也逐步选入课本，语文课本选文开始了明显的改革。课文的编排以选文的表达方式为依据，即记叙、说明和议论三种表达方式。采用单元编排方式，初中侧重记叙文和说明文，高中侧重复杂的记叙文和议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78年：422）这种编排是考虑到了教学中读写训练的要求，这是大纲确定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后，选文在编排上对读写训练的重视。

1980年发布《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对1978年的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尤其是选文标准调整为“选文要选取文质兼美的文章，必须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80：434）而不是像1978年的思想政治第一，这是一种进步，一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思想更加开放了，二是与学界与官方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进一步加深有关。这套教材是由中小学通用教材中学语文组编写，负责人是刘国正。但是这套教材还是没有分清在语文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与读写能力训练的轻重，编排上还没有形成科学的编排体系。（顾振彪，2001：564）

1986年，国家教委颁布《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个正式的教学大纲，正式提出“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教育目的中提到“开拓学生的视野，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健康的审美观”，同时在教学要求中明确提到学生要有“初步具有鉴赏文学作品的 ability”，对学生意识形态的教育提出了“四有”⁹公民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1986：445-446）。大纲为“一纲多本”的出现作了相应的改革，除了给定的课文为教学范围外，允许各地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自行安排，没有对教材的编写做统一的规定，这在为“一纲多本”的出现做准备。在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的大

⁹ 指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1986)，《1986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收录自《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北京：语文出版社。页445-455

局，迎来了社会自由开放的风气，这些在语文课本中也表现出来。课文大量选用文学性更强的文学作品，能体现人性的文章，这些表现在古诗词被大量选入课本。由于对西方世界的开放，西方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出现在课本中。这显然是“开拓视野，发展智力，培养健康的审美观”具体在教材中的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1986：446）这是中国的语文课本回归语文教学，尝试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结合。

1986年的《全日制高级中学语文》课本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二室编写的，由庄文中主持，王文英任组长，姚富根、熊江平、胡长江任组员，成立编写组，起草高中语文课本的编写方案。还邀请上海、北京、湖南的优秀教师、优秀人员参加编写工作，成立年级课编写小组。高一年级：于漪、卢之、方仁工、冯起德、步根海、唐晓云。高二年级：顾德希、黄庆发、刘超尘、鲁宝元、张浩、柯素文。高三年级：曾仲珊、刘上生、曾谷荪、邓日、林泽龙、李中兴、王伊思、吴良球。课本的审定者是刘国正和陈国雄”（庄文中、王文英，2001:589）

1986年大纲在90年代作了修订，主要是为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在1986年消失的思想政治教育又出现了，“语文训练和思想政治教育二者是统一的，相互相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2001：456）这是由于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引起的。在大纲的指导下，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二室修订高中语文课本，这次主要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编写组分别与北京的赵育民、徐必成、顾德希、连树声、王有声、刘芳扬和浙江的蒋传一修订高中三个年级的课本。（庄文中、王文英，2001:589）从1986年和1990年的教材编撰人员来看，教材的编撰吸收了不少一线的优秀教师参与，这更能让教材反映教学一线的需求。所修订后的教材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建立了完整的知识能力

训练体系。“建立了高中语文读写能力的训练体系，主要是文章读写训练体系，文学鉴赏训练体系，文言文阅读训练体系”。（庄文中、王文英，2001:589）

二是1956年后首次出现了文学鉴赏的教学系统。“构建了文学鉴赏的训练系统，把文学教学独立出来，提倡把文学作品教学课教成文学作品鉴赏课”。（庄文中、王文英，2001:589）这是文学教育第一次系统性的回到教材，是文学教育从1986年大纲重现后，在教材上的一次大进步。

三是对传统文言文教学进行系统化教学。“构建了文言文教学系统，明确阅读能力，量化词句，列出文言实词340个和文言虚词32个”。（庄文中、王文英，2001:589）

四是构建学生与教师的教学体系。“设计了便于学生自学、教师教学的课本结构体系”（庄文中、王文英，2001:589）这套教材系统化的编排与设计，是语文课本设计的一大进步，这是语文课本编排的一次大的尝试。

1995年教育部颁布《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和1996年颁布《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首次将初中和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分开，有利于义务教育的发展，也有利于形成初中和高中语文教育更明确的培养目标。高中语文大纲明确提出了“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2001：473）把语文认为是文化载体是第一次出现在语文教学大纲里，显示出国家层面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深化。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教学大纲编撰的课本称为《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课本一改过去单一的语文课本教学形式，扩展到语文课本教学与活动课教学相结合；扩展到编写必修教材和选修教材。这套教材的主要特点是，以能力训练为主，注重文化熏陶，还有其他三个特点。即建立了阅读、写作和说话的结构体系，目的在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注重实用性，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口语交际能力，再次体现

加强了文学教育，发展学生的个性和特长，提高教材的灵活性，对学生的自学能力加强培养。（顾振彪，2001：635-639）这套高中语文教材，首先在江西、山西、天津三地试行，2000 年在全国开始推广，这是第一个独立的高中语文大纲指导下的高中语文课本正式在国内使用。这套教材编写人员有庄文中、顾之川、刘真福、张德平、温立三、张必锷、王序良、伊道恩、梁捷、黄光硕、张传宗。（顾振彪等，2003：3）

教育部在 2000 年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本）》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本）》，认为“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0：1）这与 1996 年的大纲相比，语文由人类文化的载体变成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语文的文化性的进一步的肯定。高中语文大纲的教学目的认为，“要在初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水平，使他们具有实际需要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头交际能力，具有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和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掌握语文学习的基本方法，养成自学语文的习惯，培养、发现、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继续学习和终生发展打好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0：1）大纲还要求，至少看 10 部以上的文学名著，300 万字以上的科普书刊和其他的读物。2000 年的大纲很注重学生的基本的语文能力，对文学的鉴赏能力得以重视，文学教育开始在大纲中得以重视；对语文的文化性得以重视。

2003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总结上一版教材的经验的基础上，在 2000 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本)》、2001 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的指导下，结合高中语文教育的实践，

编写了《全日制普通高级教科书（必修）语文》，此教科书分为：阅读、综合性学习和写作、口语交际三大块。在阅读部分，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也就是高一年级，在初中的基础上，学习我国现当代文章、外国文章、中外文学作品和我国的古代散文，着重培养理解文章的能力、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第二阶段，也就是高二年级，学习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古代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和我国古代散文，着重培养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第三阶段，也就是高三年级，学习文化内涵比较丰富的现代论文、科技说明文和文学名家名作，着重培养研讨、评价论文和文学作品的能力”（《全日制普通高级教科书（必修）语文》，2006:1）。在这套教科书中，作品的阅读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是以提高学生欣赏评价文学作品的能力为核心，从而提高他们的文学审美能力。这套教材在综合性学习中更加注重文学、语言和文化三个方面结合，如对诗歌的了解在《拥抱文学的骄子—诗歌》中得以体现，如何欣赏诗歌，在《解意象，品诗歌》中进行了讲解；对戏剧的欣赏，在《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文学作品主题的多样理解》；如何欣赏小说，在《感受小说的魅力》得以讲解；关于如何了解作家，在《我说鲁迅》文中得以讲述；作为由语言构成的文学世界，它如何的精彩，在《缤纷多彩的语言世界》中可以体会。这些是对文学知识的讲解与传播，扩大了学生的文学知识与视野。这套教材特别对中华文化更加重视，如《民居文化》、《〈兰亭序〉与书法文化》、《山水与文化》、《编剧与演剧》和感受《儒家文化》。从这些选文可看出，语文课本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方向发展，也是从这套教材开始真正重视文化在语文课本中的教学，也开拓了学生的文化视野。

这套教材的编写单位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顾问：刘国正、巢宗祺，主编：顾振彪、顾之川、温立山。修订人员：顾振彪、赵晓非、聂鸿飞、贺敏、李世中、张必锟、郑晓龙、王序良、张德平、李镗。（顾振彪等，2003：3）

新世纪，中国社会上下对基础教育进行了大的讨论，社会期盼基础教育发生大的变革，教育部在2001年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对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和内容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课程改革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贯彻素质教育；新课程的目标应体现时代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1：1）从这个指导思想可以看出，由过去注重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开始向更注重学生本身素质提高方向转变，更注重人本身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和学生的适应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1：1）也就是说，课程可以有国家的课程，地方的课程，学校的课程，从而使这些课程反映地方和学生实际需求情况，打破了过去由国家统一课程的局面。在教材的管理与发行中，新课标认为“完善基础教材的管理制度，实现教材的高质量与多样化。实行国家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新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改革中小学教材指定出版的方式和单一渠道的发行体制，严格遵循中小学教材的国家标准；教材的出版发行实行公开竞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1：2）。实行国家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就是要使“一纲多本”得以落实。这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为后来新课程改革纲要的正式实施进行了前期的探索。

国家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颁布后，各学科都相继推出自己的学科课程改革要求。教育部颁布了《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它是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基础上，结合本学科的特点制定的，也遵循了2000年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本）》。新课标在前言中认为“新世纪高中语文教育面临着新的要求，要顺应社会发展新的需要，调整课程的内容和结构，要在追求高中教育共同价值的同时，充分发挥语文课程促进学生发展的独特功能，要使全体高中学生获得必须具有的语文素养，同时帮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探寻自己发展的方向，给他们展示才华的舞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3：1）。语文课始终注重学生个人素质的提高，关注学生个人的发展问题。

新课标认为语文学科的性质是“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3：1）。这是首次在国家语文教育的指导文件里提出语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这是中国语文教育经过几十年探索的结果。课标还认为“高中语文课程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语文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终身学习和个性发展奠定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3：1）。课标具体到学生应该具备的语文素养与语文能力，始终围绕学生的发展这个中心。

课标在课程的基本理念中提到“注重语文应用、审美和探究，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又个性的发展”，还进一步阐述道“审美教育有利于促进人的知情意全面发展。文学艺术的欣赏和创作是重要的审美活动，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和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贯穿着美的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2003：2）文学作品是重要的审美载体，科学及其他社会生活也融入审美的需求，因此丰富多样的语文教材是课标改革的要求。课标还提到“遵循共同基础和多样选择的原则，构建开放、有序的语文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3：2）这就是说要在统一的课标要求或大纲要求下，可以进行多样化课程的开发使用，也就是实行“一纲多本”。

在《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的指导下，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语文教育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相继出版自己的高中语文教材，开始了高中语文教材“一纲多本”的真正尝试。

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语文新课标指导下，结合2003年语文课本的教学实践，在2007年出版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这套教材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类，这里主要研究必修教材。必修教材主要分为“阅读鉴赏”、“表达交流”、“梳理探究”和“名著导读”。这四个内容是结合语文教学大纲和语文新课标的共同指导来编写的。“阅读鉴赏”是新课标下的语文课本的主要内容，所选的文章都是著名作家的作品，所选的作品有不少是反映当今时代特色的。这套教材依然采用分单元编排的方式，它的变化之处在于兼顾文体和人文内涵。整套教材共分六册，有一部分文章主要是文学性较强的文学作品，有一部分是主要是思辨性较强的说理文章，有一部分是应用性很高的文章。“梳理探究”主要目的在于对曾经所学习的语言、文学、文化进行梳理，从而使这些知识更加系统化，同时也训练了学生的探究能力。“名著导读”共选了国内外共计10部作品，在前五册每册两本。它们是：《论语》、《大卫·科波菲尔》、《家》、《巴黎圣母院》、《红楼梦》、《高老头》、《莎士比亚戏剧》、《谈美》、《三国演义》和《堂吉珂德》。在导读的文章中，主要包括：背景介绍、作品导读和思考探究，通过

导读，唤起学生阅读兴趣，培养阅读的习惯，从而让学生形成良好的思考能力和艺术欣赏水平。从这套教材可看出，文学阅读的分量增加了，对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的要求提高了，这在“阅读鉴赏”和“名著导读”中得以体现，尤其是“名著导读”在高中语文教科书第一次出现，这些文学作品体现了传统的中华文化和西方的传统文化，在“探究梳理”中，对文化的梳理比较多。从这些可看出，这套教材对文学与文化的重视程度在提高，就像新课标所讲的，语文课本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行霈主编，2007：1-6册）

这套教材共五册，高一和高二各两册，高三一册。编写单位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语文教育研究，主编是袁行霈，执行主编是顾之川和苏培成，编写人员是温立三、聂鸿飞、刘真福、朱于国、顾振彪和孙移山，审稿是顾振彪和黄成稳。（袁行霈主编，2007：1-6册）

中国的语文教科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发展时期，它受国家的政策方针、意识形态、编者的影响，尤其是前两者一直左右高中语文教科书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高中语文教科书呈现出几个特点：第一，国家的教育政策方针一直影响着高中语文教科书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就是各个时期的中学或高中语文教育大纲对语文教科书的指导。在有大纲指导的时期，高中语文教育的发展是正常的；没有大纲指导是就是一片混乱。第二：高中语文教科书，由“一纲一本”向“一纲多本”发展。有了“一纲”使各地区，各出版社有一共同遵循的标准，“多本”让各地区，各出版社有了更大的灵活性来编写适合自己地区情况的高中语文教科书。第三，每个时期的语文教科书都能体现出那个时代的政治时代特征。第四，语文教科书由为政治服务，逐步向为学生的个人发展服务。在教科书的初

期，政治服务有很明显的表现，到逐步的淡化，如今强调为学生个人终生发展服务，即由政治化向人性化方向发展。第五，语文课本由服务政治的工具，发展到注重语文学科读、说、听、写等沟通交际工具，再发展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是重要的文学载体，更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综上所述，国家的语文教育政策一直在探索中，越来越尊重语文学科的规律，高中语文课本的文学性、文化性、时代性越来越得到尊重。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语文教学大纲和语文学科性质影响着高中语文课本选文的嬗变。

第三节 文学教育视角的提出

语文学科性质决定语文教学任务，语文教学任务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教育、文学教育和文化教育，可见文学教育是语文教育任务之一，本文以文学教育为研究课本选文嬗变的视角。

对于文学教育的理解，鲁定元认为：“简言之，文学教育是以文学为媒介来培养人的活动。文学教育对学生语言文化知识的掌握、语言读写能力以及审美能力的提高、思想品德的完善和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具有独特的功效。”（鲁定元，2005：32），郭英德认为：“文学教育，指的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之间，经由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丰富情感体念，获得审美愉悦，培养语文能力，进而传授人文知识、提高文化素养、陶冶道德情操的一种教育行为”（郭英德，2006：11）。孟抗美认为：“文学艺术教育是以文学为媒介培养人的艺术能力和艺术境界的自由有序的系统活动，文学教育是通过文学欣赏品评和文学创作来陶冶情操，塑造人性的一种教育活动。”（孟抗美，2002：2）。三位学者都

提到文学教育中文学文本作为文学教育的载体的重要性，文学文本是开展文学教育的物质基础，没有文本，文学教育无从谈起。文学教育可以分为体制外和体制内两类，体制外的文学教育是本人自学的，家庭的，社会的一系列方式的文学教育形式（秦春，2009：6）；体制内的文学教育是指，“指文学教育纳入到国家教育体制中，规定文学教育所要实现的目标、实施途径以及评价机制等，往往以教学大纲、文学教材等形式出现，而这种体制形态的文学教育终落实到各级各类学校文学教育教学实践上”（秦春，2009：6）。体制内的文学教育是由基础的文学教育，还有专业的文学教育构成，而本文只限在基础的文学教育，本文研究的就是中国高中语文课本为载体的文学教育。因此综合以上观点，本文的文学教育定义就是：按照国家高中语文教育大纲的要求，以指定的高中语文课本中的文学文本为文学教育载体，进行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对学生进行情感体念和审美教育，以及传授人文知识的一种教育行为。可见文学教育不仅可以进行情感体念和审美教育，还可以进行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等人文知识的教育，因此文学教育作为语文教育的一部分是很有必要的。

文学教育的文学文本就是高中语文课本中的文学选文，研究高中语文课本的文学教育就要研究课本中的文学选文的组成与变化。由于文学体裁分为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四分法’将文学分为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它兼顾到文学作品在形象塑造、体制结构、语言运用和表现方法等方面的特点，定名具体，类属单一，符合我国的文学传统，成为流行的体裁分类法”（陈文忠，2007：72）小说、诗歌和戏剧都是文学性作品，但是散文有文学散文和非文学散文之分。散文可分为广义散文和狭义散文，谭家健认为广义散文可分为，纯文学散文，具有文学性的散文和一般的文章。通常情况下，把前二者称为狭义的散文，即文学散

文,后者称为非文学散文。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文的区别是什么呢?谭家健认为,划分的根据首先是形象性,应为这是文学区别于非文学的根本特征,其次是语言艺术,因为形象性是通过语言来体现的,最后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作者充满个性化的感情。(谭家健,2010:3)在本文中采用的是广义的散文,明确分为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文。这就意味着在课本中有不少散文不是文学散文,这对弄清楚文学文本在教学中承担的教学任务很重要。

泰勒认为“教育就是一种改变人的行为方式的过程。这个‘行为’是广义上说的,它既包括外现的行动,也包括思维和感情。当人们以这种方式看待教育时,显然教育目标代表着教育机构寻求使它的学生发生各种行为的变化”。(泰勒:1994:3)根据这个理论文学教育也是一种改变人的行为方式的过程,文学教育的目标就是国家、学校、老师寻求通过用文学选文来教育学生,从而使他们发生各种行为的变化,学生的这些变化就是文学教育的目标。文学教育的概念中提到,文学教育是通过对本文的阅读、讲解和接受,进行情感体念和审美教育,以及传播人文知识的一种教育行为,因此学生的情感体念的到变化,审美能力得以提升,人文知识得以丰富,这些变化就是文学教育的目标。

由于文学教育不仅有文学审美与情感体念的教育,还有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的教育,这就需要弄清文学与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情感体念也叫情感功能,也叫情感教育,是指读者与作家的一次心灵情感的交流,“在欣赏过程中,读者会依据自己的情感需要和受感染的程度与作者进行情感的交流和心灵的对话,从而使情感得到宣泄、补偿、调节以至升华。”审美教育,是指“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满足读者的审美需要,将读者带入自由的审美境界,并在审美的愉悦和精神自由的快乐之中,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审美趣味。”(王文忠,2007:179)文学

教育还有文化教育功能，“文化涵养，就是以审美的方式建设学生的内在文化环境，优化他们的文化学养体系，促进学生整体文化素质、文化人格的提高”；文学教育还有语言教育功能，“言语培养功能，就是让学生欣赏到语言艺术的精华，获得丰富的语言底蕴，受到特有的语言磨炼，培养语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文学教育还有思维训练功能，“思维优化功能，就是促进学生形象思维、理性思维和创造思维的发展。”。（范冬梅，2003：17-22）

文学教育可以促进文学经典的形成。林玫仪认为“所谓的文学经典，是指文学作品在时间的洗练之下，藉由多元的传播方式散布发扬，并由经历不同时期研究者不断解读、诠释而形成之历久弥新的名著。文学作品需历经不断的传播与诠释，最后才能形成经典；而传播与诠释又相互影响。”（林玫仪，2013：2）林玫仪指出了文学经典的概念，还指出了传播与诠释是文学经典形成的途径。对于文学的传播途经，林玫仪认为“拟作、改写、续写、笺注评点，乃至于改编、重版等，往往衍生出新的文本，甚至产生不同文类或艺术形式的相关产品”（林玫仪，2013：2）新的文本产生，就会产生新的诠释。对于文学的诠释，林玫仪认为“从新的角度、或不同的评鉴方式诠释文本，或是因时代变迁形成新的思潮或阅读兴味，就会带动研究热潮，导致另一波传播。”（林玫仪，2013：2）因此认为诠释与传播是相互影响的，它们是文学经典形成的途径。

关于文学传播的重要性，陈文忠也认为“文学活动并不单指作家的创作，还包括作品的传播与接受。作家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只有经过传播、被读者接受，才能转化为现实的作品，才能实现其审美价值和社会功能功能。”（陈文忠，2007：157）

文学教育中教师对文学文本的讲解，其实就是一种诠释，通过教师的讲解，学生接受了文学作品，培养了审美能力，进行了情感体念，这样文学作品就传播给学生，因此文学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学经典形成的过程。

使用文学文本进行教学是否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进行情感体念，传播人文知识等为教学目标；同时文学教育是否促进了文学文本文学经典的形成。本文通过这两个方面来研究高中语文课本选文的嬗变，这就是文学教育视角。

第四节 小结

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影响着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1949年到1978年，意识形态斗争成为之一时期的主要政治特征，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导致这一时期的国家的教育政策整体上是为政治服务，1978年改革开放后，政治意识形态变弱，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政策，这一时期的国家教育政策以服务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发展到提高国民素质服务，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教育政策的目的。国家教育政策又指导着语文教育政策产生，语文教育政策是国家教育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1978年前的两个教学大纲，和1978年后的七个教学大纲都是为了实施当时的国家教育政策。语文教育政策主要体现为语文教学大纲，语文教学大纲和语文学科性质影响语文课本的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二者的指导，编写1952年版、1956年版、1958年版、1959年版、1960年版、1963年版、1978年版、1982年版、1986年版、1990年版、1996年版、2003年版和2007年版，共计13套高中语文课本。

根据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情况，这些教材分为前六套和后七套。语文学科性质决定语文教学任务，人们对语文学科认识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从

1949年到1978年，语文学科的性质是政治性、文学性、工具性三个性质的争论期，这一时期的语文教学任务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学教育和语言教育的争论，产生了前六套教材：1952年版、1956年版、1958年版、1959年版、1960年版、1963年版，只有在1956年版课本实行文学教育；1978年到2007年，是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发展期，语文学科性质确立了工具性，逐步认识到语文不仅是重要的交际工具，还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载体，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此时期产生了后七套课本：1978年版、1982年版、1986年版、1990年版、1996年版、2003年版和2007年版，从1986年版课本开始进行文学教育，以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为目的。

文学教育就是按照国家高中语文教育大纲的要求，以指定的高中语文课本中的文学文本为文学教育载体，进行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对学生进行情感体念和审美教育，以及传授人文知识的一种教育行为。进行审美教育主要是在高中阶段，因为初中的语文课程主要是让学生掌握基础的语文知识，而高中的语文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基本能力，包括文学的审美能力。文学教育是以培养学生的情感体念、审美能力，传播人文知识为教育目标的，这就是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为中心的教育；同时文学教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文学的诠释与传播，这个过程就是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文学教育促进文学经典的形成；这一过程中作为文学教育载体的文学选文是在变化的，这就要求研究文学选文嬗变的特点。使用文学文本进行教学是否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进行情感体念，传播人文知识等为教学目标；同时文学教育是否促进了文学经典的形成；在文学教育的过程中是否发现课本选文嬗变的特点与问题。本文通过这三个方面来研究高中语文课本选文的嬗变，这就是文学教育的视角。

第三章 文学教育视角下人民教育出版社前六套高中语文课本的 嬗变（1949—1978）

前六套语文教科书经过频繁的修订，从外部看是国家政策层面的影响，内部看是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的争论导致的，主要争论是语文学科具有语言工具性、具有政治性还是具有文学性，语文学科性质决定语文教学任务，这就导致了语文学科的教学任务是政治思想教育，语言工具教育，还是文学教育的争论。课本上所选文章文学作品很多，从文学体裁来看，有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四大类。在这一章中，将从文学教育的视角来分析这些文学选文，通过选文中这些体裁变化的特点，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这些课本中如何承担文学教育的选文。以 1956 年的文学课本和鲁迅作品为案例，分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学课本的特点和鲁迅作品入选的原因，涉及时间段是 1949 年到 1978 年前，这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的闭关锁国时期，分析的课本是 1952 年版、1956 年版、1958 年版、1959 年版、1960 年版和 1963 年版共计六套教材。

第一节 选文嬗变背后语文学科性质争论

学科性质决定学科任务，语文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的教学任务。对于语文学科性质的争论，在语文教育的前六套课本时期是很激烈的，这种争论帮助人们逐步找到语文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语言教学任务和文学教育任务。

1951 年周祖谟、游国恩等编写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共六册）需要修改，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此基础上进行修订并于 1952 年出版新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但由于缺乏经验，这套教材忽视语文课本的工具性，忽视语文知识、忽

视文言文，编排上缺乏严格逻辑程序，受到各方的批判。1952年成立的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在1953年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报告特别指出“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历来都是把语言和文学混在一起，这样教学的结果，不仅从语言方面、从文学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失败”，还提出“一般语文教学注重文字解释方面，并没有有计划地教给学生以系统的语言规律的基本知识，所用教材也不适用于进行语言教育。其结果是使学生缺乏严格的语言训练，在写作中形成语法、修辞、逻辑的严重混乱，遗害甚大”（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1953：2）。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要改变这种“语言教学与文学教学两败俱伤”的状况，只有实行“语言文学分科教学”，（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1953：4）报告得到当时中央政治局批准。这是对当时语文教科书存在教学目标不明确的批判，首次提到分科教学。1955年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在北京《人民教育》第8期上发表了《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的文章。文章认为，语言是科学，文学是艺术，二者学科性质不同；语言教学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能力，文学教学扩大对生活的认识，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二者教学任务不同；语言教学有语言理论基础：词汇、语法、修辞，文学有文学理论系统：文学史、文艺学、文学批评，二者理论体系不同。叶圣陶认为，只有分科教学才能更好的进行语言和文学教育。（叶圣陶，1955：1-8）于是在195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就出版了教育部颁布的《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由叶圣陶、吴伯箫、朱文叔校订，张毕来、王微、蔡超尘主编的《高中文学课本》。高中没有语言课本，只有文学课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高中文学教学大纲和第一套高中文学教学课本。

但这套文学教材在接下来的“反右”斗争¹⁰中被批是“脱离政治、脱离劳动、脱离实际”¹¹，1957年下半年起，文学教材停止使用，1958年春国务院第二办公室正式决定取消汉语与文学分科，恢复语文课本，而文学教育的重要载体文学课本也停止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了中学语文编辑室编写的中学语文课本，在1959年和1960年相继进行了修改，但这三套教材都是把思想政治放在第一位，很显然语文课本开始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具阶段，这是“极左”思想的影响，语文课本变成了政治思想教育课本。

洛寒在1961年发表在《人民教育》第8期的《反对把语文教成政治课》，掀起了一场大讨论。他在文中指出各地的中小学语文教学，违背语文教学特点，忽视语文的基本训练，过多的讲课文的思想、政治内容和生硬的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把语文课当成政治课来教。他认为语文是一种工具，学习语文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思想政治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因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削弱语文的基本训练。对于课本的选文，他认为选文的最高标准是政治思想强与文字技巧好的文章要多选。语文课就是语文课，不是政治课，不能把语文课当政治课教。洛寒的言论是对1958年、1959年和1960年在“极左”思想¹²下形成的三版教科书与教学情况的批判。（洛寒，1961：50-53）另外洛寒发表在《人民教育》1963年第一期的《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文章认为语文教学成

¹⁰ 也叫“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于1957年发起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最初定位5千人，但后来被严重扩大化，主要结果是，给空前大量响应党的号召的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定位“右派分子”身份。

¹¹ 这是根据毛泽东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出的。中学语文教学开展批判三脱离，即“脱离政治、脱离劳动、脱离实际”，提倡三结合运动，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教学内容上选时文，教学形式上走出课堂，走进车间和田间，练习写诗歌、总结、广播稿，教学方法上多使用讨论法。

¹² 极左思想就是把左派的思想路线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线”。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必须建立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

效不高的原因是“我认为主要是把语文课教成了政治课，把语文课教成了文学课或单纯的语文知识课。其中影响最广泛的是把语文课教成了文学课”。（洛寒，1963：15）他认为产生这种原因是对语文的工具性和语文教学的目的认识不清，以及对苏联分科教学经验的生搬硬套。这两篇文章所掀起的讨论就是，要认清语文具有工具性，而不是具有政治性与文学性，也就是认为不能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和文学课。这些讨论促使1963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和《高中语文》课本的形成。大纲明确提出“语文是学生学习各门学科首要掌握的最基本工具”，就是“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还强调“一般不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也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63：402）语文学科的工具性首次在大纲中确立，语文教学的目的也明确，这是对十多年语文学科性质争论结果的明确回应，但同时也结束了高中语文教育中的文学教育，语文变成一门进行语言教学的工具。

这套教材是在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二套语文教学大纲指导下形成的，并且又是改革力度很大的教材，但遗憾的是它没有编撰完成，只编到初中第四册就停止了。由于1964年以后，要结合三大革命运动¹³，要对课本进行精简。这套课本被扣上“工具论”和“工具课”¹⁴的帽子，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教育出版社在1964年不得不修订刚开始使用的初中第一、二册课本，删除文学性课文、读写知识和语法教材，这样一来减少课本的分量，但也增加了反映阶级斗争、有关工农业生产和进行劳动教育的文章。这样，初中前四册课本实际上已经面目全非了，很难

¹³ 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毛泽东在浙江省农村干部参加劳动的7个材料的批语中提出的。

¹⁴ 这是在文革初期，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形式来对语文学科工具性的批判，认为语文课本缺少政治性，这实际上是对1963年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的批判和否定。

体现大纲精神。初三以上年级仍旧使用上一轮教材。一套精心准备，大力改革的高中教材，还没有出世就消失了。（顾振标，2001：554）

语文的工具性很快被“文革”否定了，而且彻底否定了17年的教育方面的成果。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年--1967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以前出版的教材都被批判。后语文教学开始没有统一的大纲与课本的时代，语文课又回到了思想政治教育。而为新中国语文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全体成员，非但没有受到肯定，而是送到农村劳动教养去了。

语文教育的第一阶段的争论结束了，通过这场争论找到了一个性质，即语文的工具性，发现三个教育任务，即思想政治教育任务、文学教育任务和语言教育任务。但语文学科最终该教什么？语文学科的性质最终是什么？始终没有定下来。只是在政治意识形态斗争激烈时，思想政治教育占主要地位；在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不激烈时，文学教育与语言教育得以重视，当文学教育影响了语文工具教育时，二者又彻底分离，只重视语文工具教育。

第二节 文学选文与非文学选文的教育任务

叶圣陶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运用语言的最好的范例。因此，讲授语言离不开文学作品，讲授文学作品不能不提到语言的运用。语言教学担负着学生掌握语言规律的任务，文学作品的语言正是证明语言规律丰富的资料，反过来，语言规律又是理解文学作品的语言钥匙”。（叶圣陶，1961：4）

叶圣陶所言与笔者所言文学教育担负着语言教学的任务，语言教学也担负着文学教育任务一致，所以语文教育有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双重任务，二者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对于要不要进行文学教育，叶圣陶认为“我谓之课本之中各体各类之文都有，书籍报刊亦复兼备各体各类，故政治性之文而不言政治，文学性之文而不及文学，断无此理。所谓‘勿教成’云云者，勿舍本文于一旁而抽出其政治道理而教之，或化作品之内容为抽象概念与术语而讲之也。苟如是讲课，学生即完全理会老师之所讲，而于本文尤其生疏，或竟不甚了了，此与练习读书之本旨不合，故务必戒之。”（转引自顾振彪，2001：554）

叶圣陶所言正是对当时语文教育反对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学教育的纠正，指出这句话并不是反对文学教育和政治教育。

作为语文教育专家的叶圣陶是支持语言教育的，也是支持文学教育的，也没有反对思想政治教育。在叶圣陶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与主持教育部工作期间，语文教育面临着多次的争论与变革，但语文课本的选文遵循着一个标准，那就是文质皆美的文章，其中包含不少文学作品。虽然在1958年、1959年和1960年三套教材中出现不少没有质量的文章，但当政治形势恢复后，很快得以纠正。

文学教育、语言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就是课本中的选文，即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当它们承担不同的教育任务时，这些选文体裁的构成也是不同的。先看下面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课本四类体裁的统计图。

表 1：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课本 1952-1963 年体裁比例统计表

	诗歌比例	小说比例	戏剧比例	散文比例	总比例
1952 年	19%	20%	1%	60%	100%
1956 年	50%	19%	4%	27%	100%
1958 年	14%	17%	0%	69%	100%

1959年	16%	18%	1%	65%	100%
1960年	9%	13%	0%	78%	100%
1963年	9%	11%	0%	80%	100%

来源：以上资料整理自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2 年、1956 年、1958 年、1959 年、1960 年和 1963 年共六版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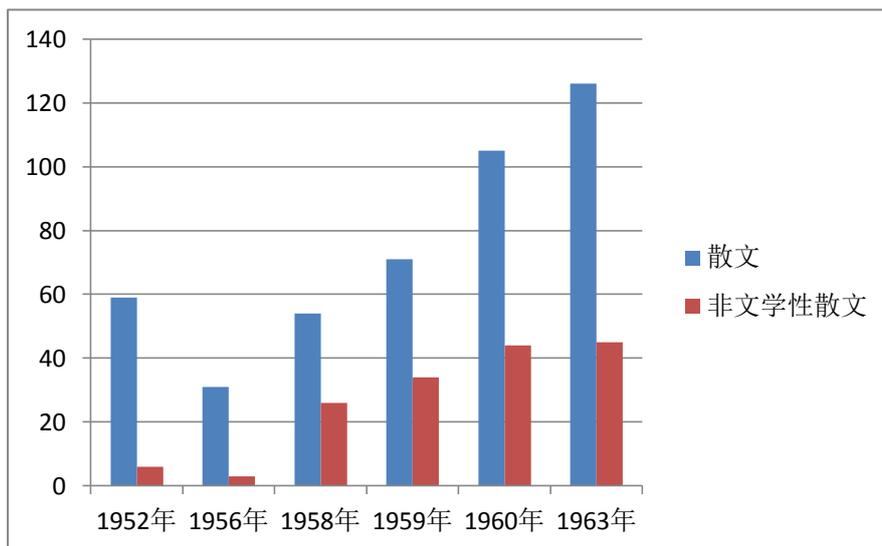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看出，整体上看 1952 年版、1956 年版和 1959 年版四个体裁都有，而 1958 年版、1960 年版和 1963 年版是不完整的，没有戏剧选文。这些课本中四个体裁所占比例大小依次是散文、小说、诗歌和戏剧。散文是占多数，从 1952 年 60% 递增到 1963 年 80%，1956 年版除外，散文比例是 25%；小说是从 20% 递减到 11%；诗歌从 19% 递减到 9%，1956 年除外，诗歌比例是 50%；戏剧 1956 年是 4%，1952 年和 1959 年是 1%，其他年版本的没有。可见 1956 年的文本组成与其他几年的文本相比是不一样的，后文将会进行论述其原因；在六版教材中散文比例主要是递增，而其他文学体裁则是递减。

散文所占比例一直递增，其他文学体裁比例却是递减，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与当时的语文学科性质争论有关，这导致了语文是思想政治教育、是文学教育、还是语言教育之争。一是与散文的表达方式灵活多样而又实用有关，散文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文体，它包括故事、寓言、特写、传记、游记、杂文、说明文、议论文、科学小品文、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通讯、书信、报告、总结等应用文，（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404）这些选文在对学生的语言能力的训练、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学教育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此就被大量选入课本。问题是这些散文承担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是文学教育，还是语言教育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看下表中非文学性散文¹⁵的变化：

¹⁵ 散文分为文学性散文和非文学性散文，非文学性散文包括政论文、应用文和其他一般非文学性的文章。

图 1：人民教育出版社前六套教材中散文与非文学性散文对比



来源：以上资料整理自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2 年版、1956 年版、1958 年版、1959 年版、1960 年版、1963 年版共计六套教材。

从以上图表可得知，散文是递增的，它的递增源自于非文学性散文的递增。非文学性散文从 1958 年版开始剧增，历经 1959 年版、1960 年版和 1963 年版，到 1963 年得到最高。1956 年是例外，原因在后文会详细论述。

原因在于文学课本受到批判后，1958 年版、1959 年版、1960 年版的课本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要克服课本“脱离政治”的缺点，大量选用政论文和时事性强而文字质量不高的文章来代替文学作品，选入不少反映“大跃进”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文章，课本几乎变成了政治读物和报章杂志集锦。（顾振彪，2001：534）如：毛泽东的政论文¹⁶1958 年就有 9 篇，1959 年有 8 篇，1960 年 14 篇；报章 1958 年有 10 篇，1959 年有 7 篇，1960 年有 5 篇。这些散文属于非文学性散文，而它们大量充实课本，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的载体。这是非文学散文增加的原因，它们的增加导致了散文总量的增加。

¹⁶ 政论文是政治性议论文的简称，是从政治的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政论文不是文学作品，归为非文学性散文。

1963 年的教材定位要突出语文的工具性，对课文更是提出了特别的要求，正如在《1963 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所说：“课文必须是范文，要求文质兼美，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足为学生学习的典范”。这里不仅强调了文章的艺术形式要美，更要思想内容要积极。先从选文形式而言，大纲认为“课文是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主要教材。选材的范围应该广泛，包括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包括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内容；包括记叙、说明、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包括书信、通讯、报告、总结等应用文。题材、体裁、风格各方面都要丰富多多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63：404）选材范围扩大了，内容增加了，表达方式多了，这是散文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散文数量的增加导致了小说、诗歌、戏剧的选文数量的减少。就像大纲所要求一样：“课文以散文为主，包括故事、寓言、特写、传记、游记、杂文、说明文、议论文、科学小品文等，散文可以占到 80%”（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63：404）。但从思想内容而言，大纲要求选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的文章，选入能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文章，认为“语文教育里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训练是分不开的”，特别提到“选用的现代政治论文，应该是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观点和党的基本政策方针政策的，反映时代精神面貌的，而在语言文字方面又可作为学习典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63：404）根据大纲的要求，在所选的 1963 年的散文中选入的非文学性散文得到 45 篇。其中所选毛泽东政论文 18 篇，其他中共领袖和苏共领袖的文章共计 11 篇，报章文章共计 6 篇，这些文章加起来就有 35 篇，政论文占了非文学性散文总数的大部分。这些文章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目的是要：“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培养学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培

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革命意志，反对和防止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反动思想的侵蚀，为逐步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打下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63：404）可见在1963年的教材中，非文学性散文依然是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

综合以上六套教材的分析，非文学性散文是在以意识形态为主要时代特征时选入课本的，选文以政论文和报刊文章为主，它们的主要任务是思想政治教育，诚然在客观上他们也起到一定的语言教学功能，却是次要的。

文学选文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和文学性散文，他们是文学教育和语言教育载体。正如叶圣陶所讲“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的语言正是语言规律丰富的资料，反过来，语言规律又是理解文学作品的语言钥匙”（叶圣陶，1955：4），叶圣陶的话证明文学教育与语言教育是离不开文学作品的。

但是由于当时语文学科性质的争论，往往把二者人为的分开，要不是文学教育，要不就是语言教育，如1952年课本中的文学选文，由于没有分清楚文学教育和语言教育，被批判成导致“语言教学与文学教学两败俱伤”，（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编，1953：4）1956年的高中文学课本选文，由于高中没有语言课本，即使在大纲中明确提到要进行语言教学“高级中学的文学教学，应该指导学生熟悉作品的语言，丰富学生的语言知识和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高级中学教学大纲规定的教材，在语言教学上提供了充分的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56：383）但这套教材被批判为忽略语言教育和政治教育，在1958年、1959年、1960年文学选文被批判为思想政治教育太弱，还把语文当成文学课来上，而1963年的文学作品，完全就是语言的教育，不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完全就没有了文学教育。其实在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教育的文本时，它们在客观上也是起到语言教育

的作用,这种教育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就是为什么在 1956 年的文学大纲和 1963 年的语文教学大纲都要求加大学生的课外阅读,正如 1956 年大纲所言:“教师应该指导学生有系统、有重点地阅读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进一步扩大学生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培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培养独立阅读、理解、欣赏文学作品和运用语言的能力,配合课堂教学完成高级中学文学教育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1956: 383) 这里明确提到了文学作品语言学习的关系,1963 年大纲认为“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一方面要让学生精读课文,另一方面要让学生广泛的阅读”,“课外阅读的指导主要是选择有益的读物”。(中华人民共和国, 1963: 407) 是文质优美的文章就是有益的读物,当然包括文学作品,这里明确提到课外读物对语文水平的提高是有帮助的。

虽然文学教育中有语言教育,语言教学中有文学教育,这是客观存在的。从文学教育的角度看,这些文学作品在政治思想教育和语言教育为主的时期,没有起到主要的文学教育,因此通观这六套教材中的文学文本,真正起到文学教育作用的教材就是 1956 年文学课本。

第三节 1956 年文学课本选文分析

以 1956 年的文学课本作为讨论个案,原因是 1956 年的文学课本是前六套教材中唯一一本文学教育课本,所选文本主要为文学教育服务。

这套教材是经历了争论、探索、向苏联学习后形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有文学大纲指导的文学课本,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套既有大纲又有文学课本的教材,它的出现首次证明中国高中语文教学中曾经是有文学教育的,这对 1978

年后的文学教育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将从课本产生的背景、课文中体裁的组成、课本的编排和文学作品的赏析四个方面进行探究。

语文该教什么成为建国初期教育界甚至其他各界争论的话题，人们对国学课本把语言和文学混在一起进行了批判和大讨论，如何破旧立新又成为人们讨论的难题，这些争论在 1951 年 3 月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正式出现了，并提出语言和文学分科的设想，他们认为如果不分科会造成教学上很大的混乱。这种争论扩大到社会各界，1951 年 6 月的《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中指出：“只有学会语法、修辞、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但是我们还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这方面，我们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有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人民日报社论，1951）这提出了语文课中要有语言教学内容。对于文学教育，苏联成为当时学习的对象，全国开展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热潮，教育界认为应该学习苏联的模式——语言和文学分科教育。1953 年，新成立的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报告给中央的《关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对语言与文学混在一起的坏处进行详细分析，提出了分科教学的好处。1954 年 2 月，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中学语文实行分科教学。至此，这种决定成为国家语文教学的方针政策。（顾振彪，2001：517）

在社会各界讨论的过程中，人民教育出版社早就在当时教育部的委托下，为分科教学做准备了。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2 年成立汉语、文学教育大纲起草委员会，1954 年开始编写汉语教材和文学教材。文学教材主编是张毕来、王微、蔡超尘，编者是冯钟芸、李光家、姚韵漪、董秋芬、语文、张传宗、刘国正、梁伯行、韩业行、周同德，校订者是叶圣陶、吴伯箫和朱文叔；文学课本主编是张志

公，编者是张中行、郭翼舟、周振甫、洪心衡、吕翼平和陈治文，校订是吕叔湘。在这些编辑人员中，叶圣陶、吕叔湘和张志公都是中国著名的语文教育专家，可见当时这两套教材的分量。在1955年秋季开始，当时的教育部指定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区的79所学校，在初中一年级对汉语、文学新教材进行试教。这种新教材出来先由一些地区试行，然后根据实际教学情况调整后再全国推广的方法自此开始，一直被后来所用。（顾振彪，2001：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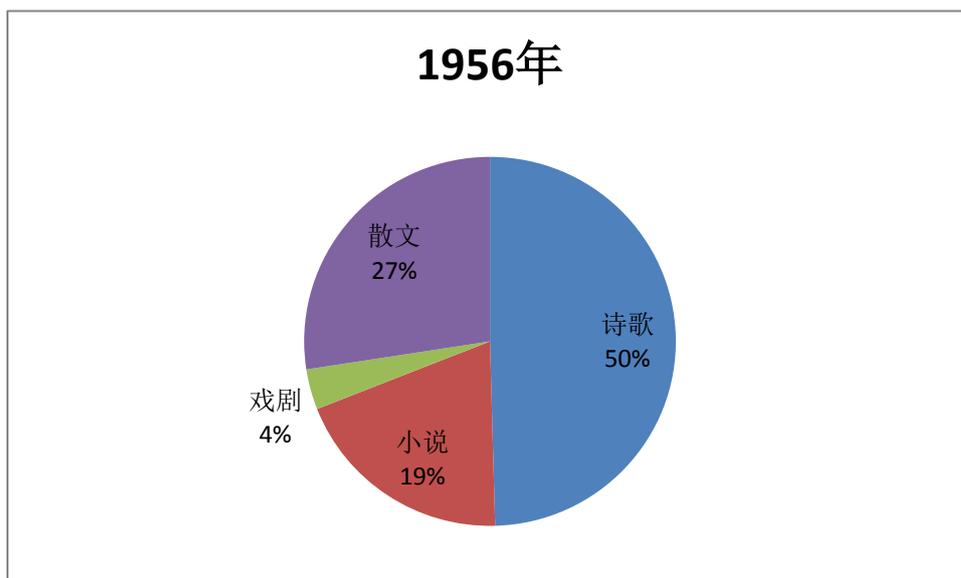
1955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在北京《人民教育》第8期上，发表了《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他认为分科的根据有3点。第一是，语言是科学，文学是艺术，二者学科性质不同；第二是语言教学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文学教学扩大对社会生活的认知，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二者的教学任务不同；第三，语言教学有语言理论基础：词汇、语法、修辞，文学有文学理论系统：文学史、文艺学、文学批评，二者理论不同。所以叶圣陶认为二者需要分科，但特别提到语言和文学虽然分科，但是二者之间依然是联系紧密的，他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运用语言最好的范例”。（叶圣陶，1955:1-8），而且1956年的文学大纲也明确提到了在文学教育中的语言教育学问题，大纲多次讲到中学的文学教学，不仅仅是文学教育，以文学教学为载体，应该指导学生熟悉作品的语言，丰富学生的语言知识和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但是这一点没有被世人所注意，教师和学生在进行文学教育和学习过程中忽视了语言学习，因此不少人认为1956年的高中文学课本只是纯文学教育，没有语言教育。

文学课本分为初级中学课本和高级中学课本，初级中学课本共计六册，每学期两册，共三年，是按照《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编写的；高级中学只编到第四册，是按照《高级中学文学教育大纲》编写的。高级中学课本与初级中学课本

不是独立的关系，而是在初级中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学生进行文学教育，它们是文学课本的两个不同层面。

这套教材主要选用的是文学作品，古代文学为主，现当代文学为辅，而其他五套教材是现当代文学为主，古代文学为辅。这些选文绝大多数是名家名作，是经典作品。名家有中国古代的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施耐庵、罗贯中、吴敬梓、曹雪芹等，现代的鲁迅、瞿秋白、矛盾、叶圣陶、老舍、曹禺等。大纲要求高中文学课本应该有外国名家名作，但由于教材只编到第四册，就没有在这套教材中体现出来。从名家名作的数量与质量这个角度讲，是超过了前六套教材中的其他五套。高中文学的体裁是多种多样的，有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这些体裁的组成与其他五套相比是很有特点的。

图 2：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文学课本 1956 年体裁比例



来源：以上资料整理自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6 年高中文学课本。

从上图可以看出，诗歌 56 首，占 50%，小说占 22 首，占 19%，戏剧 4 首，占 4%，散文 31 首，占 27%。这三者所占比例大小顺序是诗歌、散文、小说和

戏剧，这与非文学课本为主的课本相比，文学课本的诗歌多，而非文学课本的散文是最多的，而且诗歌、小说和戏剧加起来也没有散文多，这就体现了文学课本的目的在于对学生文学欣赏与审美能力的培养，而其他五套教材主要是从思想政治培养和语言能力的培养，这就是前六套课本中文学课本与非文学课本的区别之一。

诗歌选文是最多的。诗歌包括诗和词，可以叫诗词。这与选文的编排是有关的，它是按照文学史的顺序来编排的，而且这套教材在 113 篇文章中选入了 96 篇古文，其中诗歌 56 首。诗歌是中国文学里最常见，也是文学水平最高的文学形式，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课本选入了各个时期的诗歌，如先秦时期的《诗经》，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乐府》，曹植、陶渊明的诗歌，南北朝乐府诗歌，而诗词最鼎盛的唐宋主要的诗词名家都有，如唐朝的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和高适的诗，宋朝的如苏轼、柳永、李清照和陆游的词。学生能够全面的了解这些丰富的诗歌艺术，提高他们的诗歌审美兴趣和诗歌审美能力。

散文除了三篇政论文章，都是文学性散文，书信、游记、传记、随笔、杂文和富有文学风趣的论文，如《左传》、《孟子》、《战国策》、《史记》中的作品，韩愈的《钴姆潭记》和《小石潭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方苞的《狱中杂记》，姚鼐的《登泰山记》，梁启超的《谭嗣同传》等。另外这些散文作品还有讲述文学史知识的作品，如《秦代以前的散文》、《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唐代文学》《宋代文学》，从文学教育的角度讲，它们丰富了文学知识。这些散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散文的艺术魅力，培养学生散文的审美能力和学习散文写作的的能力。这些散文与其他五套相比主要是进行文学教育，而那五套主要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语言教育的。

小说选文比例得到 19%，也是前六套教材中最多的，小说选文包括传奇，如《搜神记》中的《李寄》和《干将莫邪》，宋人评话中的《碾玉观音》，施耐庵所著《水浒传》中的《林冲发配》，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中的《失街亭》，吴承恩所著《西游记》中的《大闹天空》，冯梦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吴敬梓的《严贡生与严监生》，曹雪芹所著《红楼梦》中的《诉肺腑》，现当代小说中有鲁迅的《药》，矛盾的《林家铺子》，老舍的《祥子》。这些小说选取了各个时代的经典作品，与其他五套教材中的小说相比，那五套主要是反映革命与生产的现当代小说。

在这套教材的文学体裁中，戏剧是最少的，但在前六套教材中，这套教材的戏剧又是最多的，从此套开始戏剧数量就是剧降。这些戏剧包括关汉卿的《法场》，孔尚任的《哀江南》，曹禺的《日出》第二幕，郭沫若的《屈原》第五幕。这些戏剧包括了元代的戏剧和现当代戏剧大师的作品，向学生展示了中国精彩的戏剧文学，了解戏剧文学，并学会欣赏戏剧。

文学课本的文学体裁与其他五套相比是完整，突出了文学性，也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特点和相关的文学史知识，这些文学作品的作用主要就是为了文学教育，而不像其他五套教材中的文学作品肩负的是思想教育和语言教育。

高中文学教育是初中文学教育的发展和深化，二者是一个体系的两个阶段，因此在研究高中文学文本的编排时，应该探究初中的文学课本的编排，这些编排是根据教学任务的要求而定。下文将从 1956 年初高中文学文本编排对比、1956 年高中文学编排具体情况、1956 年高中文学课本编排与其他五套的编排进行对比，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表 2：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6 年版初高中文学课本编排

年级	教学要求	编排方式
初一	初步认识文学的意义、作用以及同社会生活的关系	按照思想内容组织单元
初二	了解我国文学发展的轮廓	按照作家和作品年代先后编排
初三	了解文学的各种体裁	按照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种体裁组织单元
高一、二	了解我国历代主要作家和作品，了解我国文学史的基本常识	按照文学史系统编排

来源：转引自张鸿苓等主编的《新中国语文教育大典》中，顾振彪著《人教版 1956 年初中、高中文学、汉语分科课本介绍》（2001：520）。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教学要求是课文编排方式的依据，高中课文编排方式是建立在初中的基础上的。初中是把高中的文学教学内容与编排细分到各个年级，有了这个了解基础后，就通过文学史的编排把所有的整合起来。整体而言，这种编排灵活多变，考虑到了学生在各个年龄阶段的接受心理与能力。只有在初中了解了文学的意义与作用、中国文学发展的轮廓和各种文学体裁，才能够更好的实现高中文学课要求：了解中国历代主要作家和作品，了解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常识。

高中文学课本以文学史为编排体系，它很系统的再现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在这样的历程中学生更易对作家、作品文学史常识进行了解。高中文学教育大纲规定高中文学教学内容有：中国文学¹⁷、结合作品讲授的系统的中国文学史基本知识，外国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的基本常识，对于后两者在 1956 年的课本里是没有体现的，原因是文学教材受到批判后没有再继续编写，而后两者原计划是作为高三的教学内容。

¹⁷ 这里的中国文学，不仅是汉民族文学，还包括少数民族文学，这是大纲明确规定的。

对于高一、高二的教学内容的编排，大纲是这样规定的“高级中学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的四个学期要按中国文学史的系统分学期学习各个时代的文学，第一年第一学期学习秦代以前的文学和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第二学期学习唐代和宋代文学；第二学期学习元代到‘五四’的文学，第二学期学习‘五四’以来的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56：379）。这是大纲对各个学年的教学安排，教科书按照这个要求进行了编排。在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教学内容中，它又包括按文学史系统编排的一系列专题和这个时代的文学概述。其中专题又分为两部分：以作家为中心和以作者为中心。专题主要分析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相关的知识。

文学大纲要求选入外国文学作品，特别以苏联文学作品为代表，要求是要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这些作品在高中三年级进行学习。大纲规定：“三年级第一学期学习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第二期学习以苏联文学为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56：379）。用一年的时间来学习外国文学作品，这是第一次，从这些可以看出当时的编者是很希望学生了解世界优秀文学的，由于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相同，只能选择苏联经典作品。从对外国文学的态度而言，这是一次巨大的尝试，因为它选苏联的文学作品，其他五套教材其实也选了不少苏联的作品，但它们只是宣传政治思想的政论文，如选斯大林和列宁的文章。由于此套教材受到“反右”斗争的批判和中苏关系恶化，没有继续编写高三课本，外国文学教育也就没有实现。

至于文学理论基本常识和中国文学史知识，没有编入课本，而是要求教师在讲解专题时适当的加入。

大纲对各年级课外阅读参考书目都进行了详细的列举，为同学们的课外阅读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这套教材以文学史系统为编排的，内容丰富，通过学习学生能够对中国文学作品、作家和文学史知识有了解，另外它有很明确的教学目标，建立了完整的文学教育体系，选文都是名家名作。

但顾振彪认为：“片面强调纯文学教育，严重忽视一般的读写能力”、“只选纯文学作品，只编写文学常识，排斥记叙、说明、议论的文章，也不讲授一般的读写知识”；“文学课本分量过重，要求过高”，“脱离语言文字，偏重文学分析”；“对培养阅读中国古代作品的的能力，要求不明确，应该要培养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课本没有编入文言文知识，也没有文言字词句的练习”（顾振彪，2001：379）。张传宗在<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和其他任务>中也认为“1956年的文学教育大纲片面强调纯文学教育，忽视了一般读写能力的培养，教学目的的任务就有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全面地体现语文学科的性质”（张传宗，2001：246）。此二人的观点都指出了文学文本忽视了语言教育，这一点笔者也认同。无论文学课本，还是汉语课本，它们都是语文教学的一部分，只强调文学教育或者语言教育都是片面的，文学教学离不开语言教学。虽然在1956年版中学语文教材中，初中有汉语课本，但很基础，因此高中还是要继续学习，但高中却没有汉语课本，所以各界又把这个任务让文学课本来承担。必须承认作为学生，他们必须具备一定的读写能力，写一些实用的文章，这些能力的形成需要一般的文章写作训练，完全对学生进行文学教学是达不到要求的，如要对学生进行记叙、说明、议论等表达方式的训练，对学生进行书信、通讯、通知等应用文写作训练，只有文学作品是不够的。由于所选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古代文学，因此也需要文言文的教学，但问题是高中教学大纲和文学课本又没有如此要求，所以文学课本无法解决语言教学的问题，这也是它最后不被继续使用的一个原因。

1956年的文学课本编排以文学史为依据，知识线索比较清晰。而1952年版、1958年版、1959年版和1960版四套教材是以思想内容为编排依据，这是语文教学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时的编排方式，虽然思想教育清楚了，但是对语文基本知识的要求和基本语言能力的训练要求是模糊的。1963年是以“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顺序为主要线索，组成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63：405）开始尝试以记叙、说明、议论三种表达方式为编排依据，这是基于语言教学任务而定的。这种编排明确了各年级，各学期的重点与目标。三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因为三者的教学任务完全不同，有思想政治教育，文学教育，语言教育，但是后二者能够清晰的展示知识系统，能力训练系统，有利于语文教学，这是相同的。

第四节 鲁迅作品入选课本是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需要

鲁迅的作品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是文学原因，是政治原因，还是二者相结合呢？本节将从鲁迅在中国学史上的地位、鲁迅作品鲜明的政治特色、课本中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三个层面，对鲁迅作品入选课本的缘由进行分析。

鲁迅的主要成就在于小说、杂文和散文诗，对于他的文学成就，朱晓进认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的文学创作最先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而且是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朱晓进等，2007：43），郜元宝认为“他卓越而不间断地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多种形式，并一一使其成熟”并认为“他是现代文学不可替代的灵魂”。（郜元宝，2000：57）

两位学者对鲁迅的地位给予很高的评价,可见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鲁迅主要为两本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对于鲁迅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朱晓进认为“《呐喊》、《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巅峰”。(朱晓进等,2007:43)严家炎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由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严家炎,1983:10)另一位学者郜元宝认为“从1986年到1926年,他创作的小说(全部收在《呐喊》、《彷徨》中)虽说都是短篇,一共仅有25篇,也有偶有不尽如人意者,但绝大多数不仅当时,就是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也仍然是清醒地看取现实而又显示了高超艺术的无与伦比的典范之作”。他还认为《故事新编》“开创了中国传统历史小说的新生面,是现代历史小说开山之作。”(郜元宝,2000:57)以上三位学者对鲁迅的小说成就的开创性予以肯定。中国现代小说是鲁迅开创的,他使它得到成熟,可见他的小说艺术成就是足可以让他的作品有资格进入课本,成为高中生的范文。

鲁迅的另一成就是杂文¹⁸。他一生写了不少杂文,共计16部,如《花边文学》、《坟》、《华盖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末篇》、《而已集》、《南腔北调》、《集外集》等。

“杂文在鲁迅全部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是鲁迅这位精神界战士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战斗和自我‘释愤抒情’的重要文学形式。现代杂文正因鲁迅的积极倡导和大力实践得以踏入文学殿堂,成为新文学园地里的一枝奇葩”。(朱晓进,2007:

¹⁸ 杂文是鲁迅对古今中外所有可用于现代中国语境的文章形式的创造性综合,也是鲁迅文学成就的综合显现,包孕宏富,仪态万方,为世界文坛所仅见。郜元宝(2000),《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43)这是对鲁迅杂文艺术成就的肯定。鲁迅的杂文不仅仅是只提倡政治性，而是具有丰富艺术价值。朱晓进认为鲁迅的杂文有三大特点，是诗与政论的结合，是从砭锢弊为目的，塑造否定的艺术形象，是采用幽默和曲折冷峭的语言。（朱晓进，2007：245-246）可见鲁迅的杂文不是单一的政论文，是具有丰富文学艺术价值的一种文体，因而这为杂文被选入教材提供了艺术依据。

把鲁迅的文章作为语言教学的载体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用白话文来写作，创作的数量与质量都是空前的，创作了相当多的白话文小说和散文或者杂文。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离不开语言，而文学又给语言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材料。鲁迅的诗歌、小说、杂文创作成就，就是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材料。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鲁迅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尤其是小说和杂文成就，足可以成为其作品被选入课本，作为教学的文学文本和语言学习文本。

鲁迅是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的笔名。童年的鲁迅在家乡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后，他本是去日本学医的，可后来改学文了。至于学医的原因在《呐喊》自序》中说：

我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家族的同情；而且又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从后来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就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鲁迅，2005:438）

从以上可以看出从小受到传统儒家教育的鲁迅已经早早就有了救国救民的抱负，他是基于从身体上救民救国而去日本学医，但他后来就改学文了，原因在接下来他看见中国人麻木的欣赏自己的同胞被杀后，他在《〈呐喊〉自序》说出了原因：

这一年没有学完，我已经到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后，我便觉得学医并不是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不必以为不幸。所以我们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候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鲁迅，2005:439）

从这些话语中，可见鲁迅最初的目的是将文艺作为改变人的精神，然后实现救国救民的目的。纵观他的文学艺术一生，都是这样一如既往，通过其小说和杂文来得以展现。研究鲁迅文学观的朱晓进认为：“他在文学上有明确的社会功利价值取向，这是他文学观中的核心”（朱晓进，1996：31），他的文学功利价值就是通过改变国人的精神来救国救民。

有了明确的文艺创作目标后，就是文艺的实践行动了，用什么样的文学艺术形式来实现呢？他尝试过诗歌创作、小说创作和杂文创作，诗歌有《野草》，成就较高的是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如《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和等小说集，其中很熟悉的如《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祥林嫂》和《药》等，如成就最高的是杂文，如《花边文学》、《坟》、《华盖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末篇》、《而已集》、《南腔北调》、《集外集》等。鲁迅不停变换自己的写作方式的原因值得探讨，这就是要回到他要做文艺的目的，诗歌也好、小说也好，杂文也好，这些文艺形式是他实现改变精神上的国人的手段，当他发现自己的写作动机与艺术手段相冲

突的时候，就会寻找更易实现他的目标的那一个。就像他在《南腔北调.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讲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报着十多年前‘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又说“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是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之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鲁迅，2005：525）小说对于鲁迅而言是一种实现他改良社会的工具而已，当他发现自己的写作动机与小说体裁的文体局限时，他放弃了它，选择了杂文，因为杂文体以议论为主，思想情感的表达更直剖明示。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指出：“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的抗争，却也是现在的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因此“我一个人不能样样都做到；在文化的意义上，长篇巨制自然重要的，但还有别人在，我是斩除荆棘的人，我还要杂感下去”。（鲁迅，2005：3）鲁迅很明确的讲到他为什么要放弃其他形式而选杂文，为了现在的抗争，为了实现救国救民得梦想。

无论诗歌也好，小说也好，杂文也罢，都是为了从精神上来拯救国民，这是他的文艺的目的，诗歌、小说、杂文只是手段而已。国民麻木、看客、愚钝，他要揭露出来，就像医生一样发现病因；对这些国民的劣根性予以批判，就像医生一样给予治疗。所以在他的文学作品里常常采用揭露与批判的手法，如《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对封建吃人礼教的揭露与批判，《阿 Q 正传》中对无数像阿 Q 这样的中国人的采用精神胜利法的揭露与批判。他的杂文更符合这种批判，杂文以议论为主，在情感表达上没有限制，更利于他的批判与揭露精神，这就是

他一生主要使用杂文的原因。因此它的杂文、小说都是具有批判性的文学作品，是他的战斗武器。

鲁迅的文学，一开始就与政治结缘，这是由鲁迅文艺的目的决定的。他的任务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¹⁹，他要批判吃人的“封建礼教”，就与旧势力为敌；批判当政者对民众的残暴，就与统治集团为敌；他要批判欺压的国民的“友邦”，就与“友邦”为敌；他要揭露批判那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人，又与他们为敌；他要揭露并批判国民的劣根性，要拯救他们，这本身就是政治；他的文学本身就是政治一部分。就像冯雪峰所说：“政论活动是鲁迅全部工作的主要部分和主要特色，这是他终生从事革命活动，思想活动和文学活动的主要部分”（冯雪峰，1985：450）。杂文是政治论文，小说也是。当然从文学性角度讲，他的作品并非是纯文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文艺发展的特殊形式。朱晓进认为“这是文艺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文化的、思想的、政治的要求压倒了艺术的内涵，文化的整体的历史转换，必须以牺牲局部的文艺的本体特性为其代价”（朱晓进，1996：6）。

鲁迅把文艺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这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实现改良国民的目的在他的作品和言谈中得到了证实，而且他还领导和参与了政治色彩很浓的“左翼作家联盟”²⁰，成为旗帜式的人物，在大会成立上发表的《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主张，并指出作家要

¹⁹指的是鲁迅的文艺作品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弊病和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进行综合性的解剖，朱晓进（1996），《鲁迅文学观综论》，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²⁰ “左翼作家联盟”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简称“左联”，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目的是与中国国民党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其思想。左联的旗帜人物是鲁迅。刊物有《萌芽月刊》、《拓荒者》等。

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这些“左联”的文艺观与鲁迅从精神上救国救民是一致的。

鲁迅很早就和共产党有联系，一是他要通过文艺手段来救国救民，这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一致，只是鲁迅采用文艺来改良国民，而共产党采用革命，是形式的不同，但目标一致，同时他们面对的敌人也是一致的。拯救对象也是一致的，中国的国民主要是工农，为“工农大众服务”，在左联的成立大会上他就讲了。二是在国民党对红军和“左派”文化进行围剿时，他公开接触了共产党。毛泽东对此是这样说的：“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毛泽东，1960：695），可见毛泽东已经把鲁迅认为是自己人了。三是鲁迅参加了“左联”建立的作家统一战线，这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波兹德涅耶娃，2000：489）

此时的鲁迅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已经成为了共产党宣传方面的一面旗帜。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鲁迅文艺的政治目标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只是二者采用的方法不同，共产党把他作为宣传的旗帜。把他的作品选入教科书，也是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主要选取他的杂文。

从文学成就、语言成就和作品的政治特性三方面可以看出，鲁迅的作品是有实力被选入课本的。

鲁迅的作品很多，主要是杂文和小说，而且杂文的选入量又高于小说，不管是杂文还是小说，都有很强的政治性。

表 3：人民教育出版社前六套课本鲁迅选文统计情况

年份 \ 文类	1952 年	1956 年	1958 年	1959 年	1960 年	1963 年
小说	2	1	1	1	2	2

杂文	5	1	5	9	10	12
合计	7	2	6	10	12	14

来源：以上资料整理自中国语文出版社张鸿苓、陈金明、张定远和苏立康主编的《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2001：511-561）

上表清晰的展示出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在这六套教材中的变化，他的作品是年年增加，尤其是杂文增加最明显，而文学课本却很少有他的作品，只有一篇小说《药》和一篇杂文《对于左翼作家的意见》。

鲁迅的作品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是符合当时选文要求的。在 1956 年的文学大纲中讲到，提到学生学习的文学理论中要包含“文学中的人民性、阶级性、党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56：379），1963 年选文要求“就思想内容而言，应该注意选取有助于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63：405），从这些大纲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选文很重视作品的政治性。鲁迅作品的政治性被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旗帜，国家通过权力使其作品成为一种合法化的文本，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

鲁迅成为在意识形态斗争激烈时期的一种文化象征，拥有了圣神的地位。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可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1960：698）鲁迅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是一种旗帜。这个地位是从 1952 年版的高中课本开始慢慢培养起来，经过 1956 年的发展，到 1958 年、1959 年和 1960 年开始不断的强化，在 1963 年得到最高。

1952 年版选了两篇小说《药》和《祝福》，要这两篇文章都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作者在《药》这篇小说中采用多种手法塑造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结

构上采用明暗两条线索，来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批判，从而试图唤醒民众，实现作者从精神上救国救民的梦想。参与文学教育，在 1963 年包括又重新选入的《祝福》也考虑了其作为语言教育。杂文所选很多，如 1952 年的《我们不再受骗》、《纪念刘和珍君》、《藤野先生》、《友邦诧异论》和《为了忘却的纪念》，1958 年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答北斗杂志社问》、《好的故事》、《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1959 年在 1958 年基础上增加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呐喊自序》和《人生识字糊涂始》，1960 年在 1959 年基础上增加了《“丧家的”“资产阶级的乏走狗”》、《文学与出汗》和《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1963 年在 1960 年基础上增加了《论雷峰塔的倒掉》、《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论打“落水狗”》和《论“第三种人”》。这些课本中的杂文要不就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要不就是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批判，政治意识形态十分的鲜明，这些是与当时的国内国际的政治斗争在教科书里的体现，通过权力得到思想政治教育。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鲁迅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被大量选入主要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也体现了文学教育和语言教育的需要，但都是次要的。

第五节 小结

在语文课本的前六套时期，中国国家的建设是以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为中心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争论，最后以政治意识斗争为中心占据优势，这种争论影响国家的教育政策，这一时期的国家教育政策主要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过程中的争论影响着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导致了语文学科性质的争

论，主要表现在语文学科性质是政治性、文学性还是工具性的争论，这种争论导致这三种性质的相互排斥。学科性质决定学科任务，因此语文学科的性质决定语文教学的任务，因此语文学科性质的争论导致了语文教学任务的争论，语文教学任务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学教育还是语言教育的争论。

语文课本就是在这些争论下产生的，前六套语文课本选文主要是文学作品，因此文学文本就成为这些教育任务的载体。这些选文在前六套课本中嬗变的特点是：一是非文学选文以政论文、报刊文章和革命建设文章为主，主要是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任务，选文数量出现递增趋势；一是文学选文从 1956 年后就出现递减趋势，文学选文在 1956 年主要是承担着文学教育任务，在其他课本是承担着语言教育任务，文学作品的功能被人为的分离。一是这些课本主要是中国文学作品，外国的以苏联为主，苏联作品主要是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

在前六套教材中，文学选文承担着文学教育任务的只是 1956 年的文学课本。它的特点是课本以文学史进行编排，只进行文学教育，不足在于没有语言教育做支撑，尤其是没有文言文教学，学生难以读懂古代文学作品，因此古代文学的教育是难以进行的，并且文学教育的目标不明确。但 1956 年的文学课本为后来的语文性质的认识和文学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很多参考。并对典型的作家鲁迅及其作品进行分析，从而探究他的作品被选入不同教学任务的缘由，主要是鲁迅作品具备的政治性和时代性与当时的时代需求一致，在课文的选编时，偏重于选政治性的作品，这些作品主要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其次才是文学教育任务和语言教育任务。

第四章 文学教育视角下后七套高中语文课本选文的嬗变

(1978--2007)

在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进行争论时期，产生的六套课本，只有 1956 年的课本选文是用来进行文学教育，其他 5 套课本的选文主要是承担思想政治教育和语言教育。在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进一步完善的时期，尤其是在确定语文的工具性后，如何让它更完善，是否该增加文学教育？是否该增加文化教育？这种探索一直不停。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七套课本的主要选文依然是文学文本，本章将在文学教育视角下探究在以语言教学为主要任务的情况下，这些文学选文是否承担文学教育？如何进行文学教育的？以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高中语文课本和后七套教材鲁迅的选文作为个案，与上一章的 1956 年的文学教育课本与鲁迅选文进行比较，来探究文学教育选文的特点与变化。涉及时间是从 1978 年到 2007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范围是 1978 年版、1982 年版、1986 年版、1990 年版、1996 年版、2003 年版和 2007 年版，共计七套教材。

第一节 选文嬗变背后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发展

在确定了高中语文具有工具性和语言教育为主要教学任务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进行了是否增加文学教育，是否增加文化教育的探究，如何让语言教育、文学教育和文化教育三者协调发展进行新的探究。这种探索的成果作为对课本选文的修订依据，并为研究选文的变化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和依据。

这一节主要从语文课本的重建，语文课本新的探索：文学教育加入和文化教育的加入两方面进行探讨，从而厘清这一阶段语文课本的变化，就是在确定语文的语言教育后，如何在此基础增加文化教育，文学教育，这些更细致的探讨为语

文课本的产生做了更细致的准备工作，为探寻这些课本中的文学教育的特点与变化做准备。

“文化大革命”十年，大而言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小而言是语文教育的悲剧。“文革”前语文教育眼见要进入正轨，却遇到了“文革”，经过没有教材的三年，然后是纯思想政治教育的课本，谈不上是语文教育，更谈不上是文学教育。

1976年，“文革”结束了，语文课本也破坏了，无论如何抱怨与指责也无济于事，只有用行动来重建语文课本。1977年9月，邓小平亲自过问下，教育部积极安排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还没有恢复，但组织已经调回原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部分编辑人员和从一些大中小学选调的优秀教师300余人，采用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的会议形式编写中小学教材，也就是后来1978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是由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为组长的教材编审领导小组，以十年制为基本学制，制定教学计划（张鸿苓等，2001:21）。在实际编写过程中还是以1963年的课本为蓝本，改进了不少，编入了不少新的内容，加上“文革”刚结束，思想解放不够，虽然1978年的教学大纲确定了语文的语言工具作用，但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选编的课本依然还有不少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文章，而且1982年的教材主要任务依然是语言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这是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和语文教育任务的认识不够彻底的表现，思想还是受到束缚，虽还有很多不足，但在文革后，语文课本能够重建起来，这是需要肯定的，只是语文学科的性质和课本的修订还需要大力探索。

在语文课本重建后，重新确定了语文学科具有的工具性，但必须与思想性相结合，对于“文革时期”是进步，面对新的时代，还是需要加大探索，问题是还需要增加什么？

叶圣陶先生在 1982 年出版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中始终围绕着语文是工具这一学科性质这一主题来讨论，语文就是交际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这为语文教育任务的确立很有指导意义。就像张传宗在《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和其他任务》中谈到：“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决定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是工具性，从工具性出发，主要解决使用语言文字工具的问题，因此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培养听说读写的能力”（张传宗，1999:10）他认为基本任务有三层意思，“一是表明这是语文学科特有的任务，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任务”；“二是表明这是首先必须完成的任务，整个语文教学必须着眼于基本任务，从基本任务出发”；“三就是表明还有其他任务，其他任务与基本任务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其他任务都是以基本任务为基础，并且丰富和发展了基本任务”（张传宗，1994:10）。张传宗谈到基本性质是语文的工具性，基本任务是听说读写能力，还有其他任务，也讲到了它们的关系。

语文学科还有其他性质，而这些性质又决定它的任务。“语文学科具有思想性，决定了语文教学还有思想教育任务”，“语文学科具有文学性，决定了语文教学还有文学教育的任务”，“语文学科具有知识性，决定了语文教学还有知识教育”（张传宗，1994：11）。语文学科有四个任务，反思建国以来的到 1982 年的 8 套教材，没有一套是全具备这些任务的，这是由于没有认清语文学科的性质导致的，更是没有认清这些性质的主次导致的，所以认清语文学科的主次性质，才能更好的认清教学的主次任务，从而完成语文学科的教学任务。当然语文学科

的性质还有文化性，它的任务还有文化教育，这在后面探讨。张传宗认为，培养听说读写是基本任务，思想教育是重要任务，文学教育和知识教学是应有任务（张传宗，1994：11）。对于1980年代能认识到这个层面，已经是语文教育的大进步。基本任务、重要任务和知识教学任务，在1978年、1982年的大纲和教材都在体现，就是没有体现文学教育这一任务，这是一个语文教学认识需要突破的瓶颈。

应不应该进行文学教育，张传宗从语文学科的性质讲到了，对这个问题张志公从文学教育的作用再次讲到，他在《语文教学要同现代化建设接轨》中再次提到文学教育。他说：“我很重视文学教育。不是要求学生们人人成为文学家，但是人人要接受文学教育。文学教育，当然培养学生欣赏文学作品的的能力，这是不在话下。更重要的是文学可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这一点常被忽略。思维，一般说来可以分为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文学培养形象思维。不过，不要绝对化了。文学作品，不论诗歌、小说、戏曲，也有各的逻辑结构，同样也有培养逻辑思维的能力的作用。只不过文学作品之所以感人，首先要靠形象，而不是逻辑推理。文学最足以唤起人们的联想、想象，进而诱发创造性思维”。（张志公，1994:3）对于如何进行文学教育，他建议减少课程，不倾向于增加，不单独开设文学课。语文课本分为两种读本，一个叫《文学读本》，进行文学教育；一本叫《语文读本》，进行语文教育。（张志公，1994：3）。

学界的讨论，最终也影响高中语文教育的改革，尤其是国家的中学语文教育政策。1986年和1990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在学科性质中是这样定义语文的：“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1986：445）语文的性质更加清晰。在教学要求中是这样讲的：“在初中的

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说话能力。能够比较熟练的阅读一般的政治、科技和文艺读物，初步具有鉴赏文学作品的的能力。能写记叙、说明、议论的文章，做到中心突出，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能够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显的文言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1990：457）。两个大纲都提到了高中生要初步具有鉴赏文学作品的的能力，这是1956年文学大纲之后第一次出现在大纲中。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民族文化的复兴与中西文化接触的增加，学界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发展，认识到语文不仅是重要的交际工具还是人类文化的载体或组成部分。在1996年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对语文性质的定义是：“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1996：472）2000年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和2003年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新课程标准》对语文性质的定义是：“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学科的基本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0：1）文学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语文学科新增加的学科性质，也就新增加了教学任务，即文化教育，其中包括文学教育。文化教育不仅包含对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文化，还包括科技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教育。

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对语文学科性质的探讨，学界对语文学科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由过去确定语文学科的性质是什么，到认识到语文不仅是重要的交际工具，还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是一种进步与深化，当然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不会停止，语文学科教学的任务新的探索也不会停止。

以上语文学科的探索，在语文课本的选文上表现出来，因为学科性质决定学科任务，这为下文对课本选文的探究做好了必要的背景材料和基础工作。

第二节 文学性选文与非文学性选文嬗变的分析

语文学科的性质，不仅是重要的交际工具，还是重要的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就决定了语文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等重要的语文的应用能力，还要培养一定的文学审美能力、探究能力、思想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素养等，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做好准备。²¹其中文学审美能力的培养离不开文学教育，这一点在上一节里多次探讨。这一节将从改革开放后的七套语文课本的选文进行分析，找出文学选文的文学教育任务。主要从两个问题进行探究：一是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二是后7套教材中文学选文与非文学性散文关系分析，主要探讨这些选文在课本中承担的功能，如语文的语言能力培养任务，文学审美能力培养任务，也就是文学教育任务、思想教育任务还是科学文化教育任务。

要了解文学与文化的关系，首先要了解文化的概念，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中对文化是这样定义的：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的意义上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只要能够用普遍适用的原理来研究，就可以成为适合于研究人类思想和活动规律的对象。（爱德华·泰勒，1992：1）

²¹ 参考的是2003年的全日制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

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在其所著的《文化与社会》中文化有四种含义，一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追求完美的思想观念有密切关系，二是社会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三是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四是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雷蒙德·威廉斯，1991：20）

以上两种文化的定义中都提到艺术是一种文化形式或文化现象，而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因此文学艺术是一种文化形式或现象。文学是文化的一个分支，而文学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因此进行文学教育，其实也是进行文化教育。

高中语文课本中选取的文学文本是中国文学的精华，外国文学作品是西方文化的精华，学习它们其实不仅是在学习文学本身，还是在学习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同时也在学习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

在这七套教材中，选文的组成，它们承担的教学任务，历次的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中都有要求，一般而言，必须是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的作品。从文学体裁上讲就是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其中散文又分为文学性散文和非文学性散文。将从文学选文的组成、文学体裁变化的原因、非文学性散文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和语言教学任务、文学选文的语言教学任务与文化教学任务、文学选文的文学教学任务等五方面进行分析。

无论是文学教育还是文化教育，甚至包括思想教育、语言教育，都离不开选文这个载体。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以及散文中的文学性散文和非文学性散文，就是语文学科教学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弄清楚它们的组成、体裁变化的原因，有利于分析其所承担的教学任务。

所要分析的共计七套教材，分别是1978年版、1982年版、1986年版、1990年版、1996年版、2003年版和2007年版。

表 4：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课本后七套教材体裁比例

年份	诗歌	小说	戏剧	散文
1978 年	15%	17%	4%	64%
1982 年	11%	16%	2%	71%
1986 年	17%	16%	3%	64%
1990 年	13%	10%	3%	74%
1996 年	20%	10%	4%	66%
2003 年	31%	12%	4%	53%
2007 年	31%	15%	5%	49%

来源：以上资料整理自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8 年版、1982 年版、1986 年版、1990 年版、1996 年版、2003 版和 2007 版共计 7 套高中语文教材。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几点：一是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四种体裁在以上八套教材中都按一定的比例存在，这与前六套相比而言，更具有稳定性，但也有局部的调整。二是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四种体裁选文比例具体的变化趋势，散文的比例整体是下降的趋势，诗歌、小说和戏剧的比例是上升趋势。散文比例从 1978 年的 64% 一直增加到 1990 年 74%，然后从 1990 年的 74% 下降到 2007 年的 49%；诗歌比例整体上是 1978 年的 15% 增加到 2007 年的 31%，1986 年与 1990 年相比是减少的。小说比例是从 1978 年的 17% 下降到 1990 年 10%，其中 1986 年与 1990 年相比是从 16% 降到 10%，从 1996 年开始从 10% 增加到 15%。戏剧比例是从 1978 年的 4% 下降到 1982 年的 2%，然后增加到 2007 年的 5%。散文比例先下降，诗歌、小说和戏剧比例的比例增加，这种变化是在 1990 年后比较明显的表现出来。

此 7 套教材文学体裁的比例组合比前六套更加稳定，只是局部的调整，1990 年后散文的比例下降，诗歌、小说和戏剧比例是上升。这是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决定的。语文学科的主要性质确定后，即语文的工具性，语文学科的其他性质在逐步的完善，如文学性和文化性等。而前六套教材是语文学科性质的争论

时期，对语文学科的认识不清楚，所以导致对语文学科性认识的不稳定。这些认识在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中体现出来，这又影响课本选文的形成。语文学科的性质变化过程是，由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丰富到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再到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语文学科性质决定语文的教学任务，这就决定了选文承担着语言教学任务、文学教学任务、文化教学任务，思想教育任务，这些教学任务是随着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发展而不断增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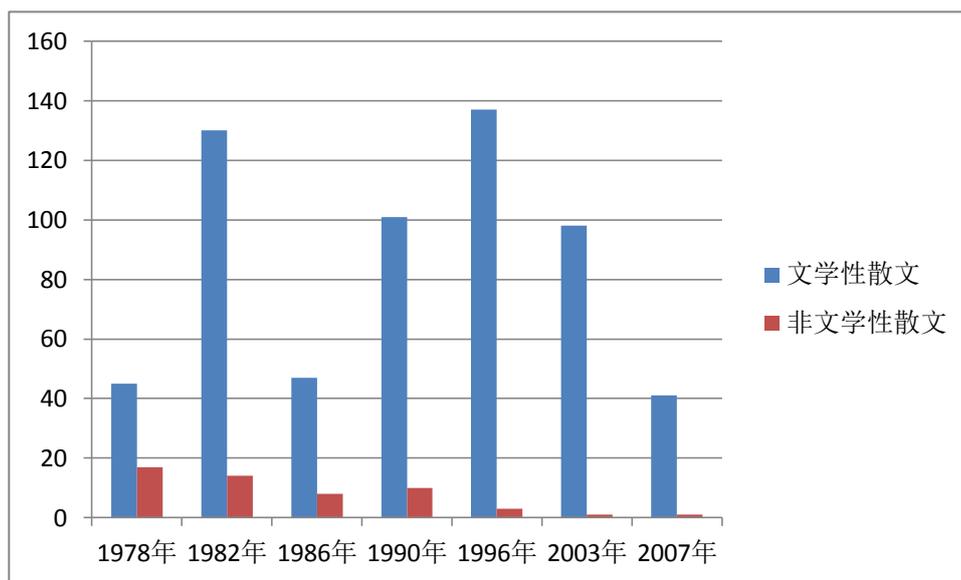
1978年后，每套教材的产生都更加严谨，除了学界与社会的研究之外，7套高中语文教材的产生，就有七套高中语文教学大纲进行指导，这与前六套相比只有两套大纲相比更加的严谨，同时这七套大纲具有连续性与开创性，而前六套教材的两套大纲没有连续性，只有相互排斥。特别是1978年和1980年两套大纲经过了语文工具性和思想政治性的探索过渡期后，在1986年确定语文学科的性质是“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1986：445）同时在教学要求中明确提出高中生要有“初步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1986：446），语文教学任务除了语言教学任务外，开始增加文学教学任务，1990年也是具有同样的要求。但1996年大纲要求又增加了：“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1996：473）语文教学任务除了语言教学和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外，还要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吸收热爱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人类的进步文化。2000年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和2003年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新课程标准》对语文性质的定义是：“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学科的基本特点”。

（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2003：23）大纲强调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人文性包括文学性和文化性，这些性质决定语文教学的任务与1996年大纲基本一致。但在2003年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新课程标准》中对文学教育的要求更细：“学习鉴赏中外文学作品，具有积极的鉴赏态度，注重审美体验，陶冶性情，涵养心灵。能感受形象，品味语言，领悟作品的丰富内涵，体会其艺术表现力，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思考。努力探索作品中蕴涵的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了解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2003：24）

从以上语文学科的性质变化中可以看出，语言教育、文学教育、文化教育与贯穿于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是语文学科的教学任务，由这七套教材中的文学选文承担。但这七套教材与前六套教材相比，教学任务明确，丰富，全面。文学选文承担的任务复杂许多，以诗歌、小说和戏剧和文学性散文为例，在1986年前，它们承担的是语言教育任务，1986年和1990年，它们逐步承担语言教育任务和文学教育任务，1996年后，在前面基础上增加了文化教育任务，由于文学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进行文学教育其实也进行了文化教育。散文也依然承担着这些任务，但由于散文分为文学性散文和非文学性散文，二者承担的教学任务是不一样的。

为了能够分析非文学性散文的教学任务，首先要分析这七套教材中非文学性散文的构成和变化。

图 3：人民教育出版社后七套教材中文学性散文所占非文学散文比例对比



来源：整理自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8 年版、1982 年版、1986 年版、1990 年版、1996 年版、2003 年版和 2007 版共计七套高中语文教材。

从以上文学性散文和非文学性散文的对比中可以看出非文学性散文是出现递减趋势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语文学科性认识的加深，语文课本的思想政治性教育整体在降低，转变成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政治性，后者强调个人的道德层面。如 1978 年和 1980 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大纲（试行草案）》中这样说到：“在语文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和读写训练是辩证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读写训练必须以正确的观点为指导，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78：420）。但从 1986 年开始就不再提思想政治教育，而是：“语文学科对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 1986：445）这种变化是对过去两套大纲中对政治教育的弱化，进而发展到对学生个人道德层面的培养，这种变化就为非文学性散文所占比例降低提供了政策层面的依据。

具体而言，就是体现政论性的文章减少了。如在 1978 年的课本里，共产党革命家的论文有毛泽东文章 6 篇，周恩来 2 篇，邓小平 1 篇，还有两篇报纸上的政论文，分别是《人民日报》的《伟大的转变和重新学习》和《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82 年毛泽东 7 篇，刘少奇 1 篇，邓小平 2 篇，报纸政论文 1 篇，《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政论文，是当时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不清和思想解放不到位。直到 1986 年的选文中出现明显下降情况，毛泽东 2 篇，邓小平 1 篇，和另一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这种变化与当时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分不开的，当然这也是受人们对语文学科认识发展状况的影响。1990 年，国家教委又根据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和国情教育，这与当时发生的国内国际政治斗争有关，因此此时政论文一改过去下降的趋势，迅猛增加。毛泽东 5 篇，刘少奇 1 篇，邓小平 1 篇，江泽民 1 篇，还有其他两篇如《为了总理的嘱托》和《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1996 年只有毛泽东的两篇，分别是《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2003 年只有江泽民 1 篇《在庆祝北京大学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7 年有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很显然，从 1996 年开始政论文又开始大量的下降，直到只剩一篇。恩格斯这篇文章出现在每一版教材中，虽然是共产党革命家的文章，但与其他革命家文章相比，政治性不是很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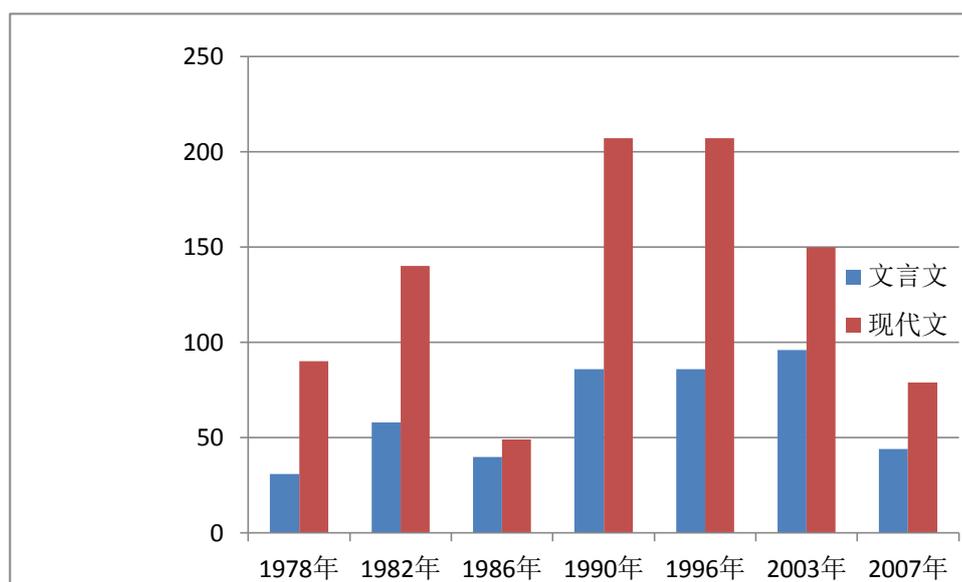
这与前六套教材相比政论文少了很多。在前六套教材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列宁、斯大林与报章的政论文大量占据着课本，尤其是在 1958 年版、1959 年版、1960 年版和 1963 年版中。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非文学性散文的思想政治教育随着语文学科性认识加深，越来越弱化，具体表现在课文中政论性的文章减少。当然这些文章也承担着语言教育的任务，如政论性的文章对于培养学生逻辑思维和发表意见的能力作用很大，如1990年版中有请示、合同、请示和简报的文章，这对训练学生写作应用文有很大的帮助。

这些版本中诗歌选文、小说选文、戏剧选文和文学性散文选文都是文质优美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语言优美，是语言教学的好载体，承担着语言教学任务；而且这些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形式，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和现当代文学作品是中国的优秀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是人类优秀文化的一部分，是多元文化在课本中的体现，因此也承担着文化教育的任务，所以这些文学作品承担着语言教学任务和文化教学任务。本节将从文言文与现代文这两种语言形式来分析它们所承担的语言教育任务和文化教育任务，在现代文中，又从用现代文写成的文学作品，用散文写成的有关中国文化和西方科技文化知识的作品，与西方文学作品这些层面更深入的分析。

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它采用两种语言形式来表现，一种是文言文，即古代汉语写成的作品，一种是现代文，现代汉语写成的作品。文言文书作品的数量和数量远远大于现代文作品，这与中国悠久的历史相关，因此要了解古人的文学、思想、文化，必须先懂得他们的语言，也就是懂得文言文。从1978年的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开始就要求高中生要能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这是语言教学任务之一。当然作为现代社会的高中生，必须要掌握现代语言的使用，现代文就是语言学习的主要载体。

图 4：人民教育出版社后七套教材中文言文与现代文所占比例对比



来源：以上资料整理自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8 年版、1982 年版、1986 年版、1990 年版、1996 年版、2003 版和 2007 版高中语文教材。

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出文言文与现代文比例的变化。整体而言，是以现代文为主，文言文次之，这在语文教学大纲中明文规定的，如 1996 年高中语文教学大纲规定：“以中国现代作品为主，兼顾古代和外国作品”（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1996:476）。但从图表中可以看出，从 2003 年后，文言文与现代文的比重是在缩小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加深，尤其是在加强文学教育和文化教育后，文言文的比重变加大。文言文是重要的语言载体，同时又是重要的文学载体。中国五千年的民族文化主要是用文言文写成的，只有学好文言文，才能够认识、理解中华文化的精华，传承民族文化。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兵家思想以及文学成就，那一个不是文言文写成的。学习这些用文言文写成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学习中华文化。所以这些文言文写成的文学作品既可以进行语言教学，又可以进行文化教育。

当然现代文写成的文学作品，是高中生学习的主要的语言，是高中生训练听、说、读、写的主要载体。尤其是课本中所选的现代文大多是名家名篇，如朱

自清、鲁迅、老舍、矛盾、沈从文等，他们是现代语言的集大成者，他们的文学作品就是语言的艺术，而他们所写成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也是现代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学习现代文学其实就是对现代语言的学习，同时也是学习现代中华文化。

另外有关现当代科技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的作品，是用散文体裁来书写的。科技说明文，如 1978 年版语文课本中，李四光的《人类的出现》和王谷岩的《眼睛与仿生学》，1982 年增加叶圣陶的《景泰蓝的制作》，1990 年版法布尔的《蝉》和壶井荣的《蒲公英》，1996 年版霍金《宇宙的未来》、里夫金 霍华德的《熵的定律》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序言，2003 年版梁思成的《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齐民有的《数学与文化》，2007 年版的卡尔 萨根《宇宙的边疆》、刘易斯 托马斯的《作为生物的社会》等，这些科技文化知识是用散文体裁来写的，这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现代语言学习材料，而且有利于学生了解国内国际科技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散文，如 1990 年版施向东的《义理、考据、辞章》、矛盾的《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1996 年版朱光潜《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和《谈白居易和辛弃疾的词四首》、余树森的《散文的艺术魅力》、吴祖缙的《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宗白华的《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与实》、汪曾祺的《中国的戏曲和小说的血缘关系》、钱钟书的《谈中国诗》等，2003 年版汪曾祺的《胡同文化》、雷达的《现当代小说鉴赏》、林庚的《说‘木叶’》、鲍鹏山的《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黄仁宇的《孔孟》等，2007 年版袁行霈的《中华文化精神》、梁思成的《中国建筑的特征》和朱光潜的《谈美》等，这些由关于中国的古代文化散文，既是语言学习的载体，又是文化教育的载体。

还有就是用现代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他们既是现代语言学习的载体又是多元文化的载体。

在前六套教材中，主要是苏联的选文，主要是用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但后七套教材从 1978 年版开始就开始引进西方的文学作品。1978 年版 11 篇，1982 年版 13 篇，1986 年版 4 篇，1990 年版 13 篇，1996 年版 27 篇，2003 年版 28 篇，2007 年版 19 篇，特别注意的是由于 2007 年版的教材只有五册，其他都是六册，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文学作品依然很多，而且 2007 年版教材要求学生阅读名著，其他版大多是单篇文学作品。从这些外国作品数量整体上是递增的，这些作品都是世界名著，不仅提供丰富的语言学习材料，而且向学生提供了了解西方文化历史的文本。

上文中探讨了文学文本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语言教育任务和文化教育任务，现在回到文学选文的另一个任务文学教育任务。

前六套课本中只有 1956 年的文学文本是有文学教育任务的，其他的只是语言教学任务，没有让文学文本的作用发挥完全。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 1978 年版和 1982 年版都是把文学文本只当成语言教学的载体，文学教育依然没有。随着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深入和社会对语文提出新的需求，文学教育才出现。在 1986 年的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的教学要求中提到培养初步鉴赏文学作品的的能力，从这以后文学教育成为语文教育的一部分，每一次的语文教学大纲都明确要求文学教育的能力要求，但在 2003 年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新课程标准》中对文学教育的要求更细：“学习鉴赏中外文学作品，具有积极的鉴赏态度，注重审美体验，陶冶性情，涵养心灵。能感受形象，品味语言，领悟作品的丰富内涵，体会其艺术表现力，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思考。努力探索作品中蕴涵的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了解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3：7）这是提出如何培养学生具有初步鉴赏文学作品能力方法，是一大进步。

文学教育经过多年后又重新被重视，除了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深入有关和社会对语文教学提出新的需求外，主要在于文学教育本身具备的作用。

一是具有语言教育的作用。这一点叶圣陶先生曾提出自己的看法，叶圣陶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运用语言的最好的范例。因此，讲授语言离不开文学作品，讲授文学作品不能不提到语言的运用。语言教学担负着学生掌握语言规律的任务，文学作品的语言正是证明语言规律丰富的资料，反转过来，语言规律又是理解文学作品的语言钥匙”（叶圣陶，1955：4）。这段话就是说文学与语言是相互依存与促进的关系。文学作品的教育其实担负着掌握语言教学的任务，语言教学也担负着理解文学作品的任务，这就是承担语言教学任务的文本即使在反对文学教育时期也要选取名家名著作为课本选文的原因。

二是文学教育能提高学生认识能力、起到思想教育作用和培养审美能力的作用。顾振彪在《面向 21 世纪，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质》这篇文中提到：“文学作品有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可以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思想道德水平和审美能力。”（顾振彪，2001：638）文学作品在培养学生认知能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

三是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顾振彪认为：“文学教育的根本优势在于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顾振彪，2001：638）。这是从学生的形象思维层面讲的。

文学教育的作用和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加深，才使文学教育在消失多年后又出现了。

文学教育的主要载体是文学文本。这些文学文本主要是由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组成，而散文又分为文学性散文和非文学性散文。在上文中已经发现，文学性散文和诗歌、小说、戏剧这些文学文本整体上是递增的，而非文学性散文

是递减的，尤其是从 1996 年版开始诗歌、小说和戏剧的增幅很大，到 2007 年版，这三者已经占课文的比例的 51%，而占 49% 的散文中，非文学性散文只有几篇。

这些作为文学教育的文学文本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如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和散文等，也包括现现代文学，如鲁迅、朱自清、沈从文、老舍、巴金等人作品，甚至也包括中国台湾作家的作品，如李乐薇的《我的空中楼阁》，余光中的《乡愁》。这些对中国文学作品的选择与前六套教材相比，古代文学选择更具有连续性，是逐步增加调整的。现代文学更注重名家名著，而 1956 年的现当代文学很少，只有鲁迅的两篇。另外选择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从上文分析得知，外国文学作品是不断增加的，包括欧美日名家名著，而前六套教材中即使是文学教育文本，一篇外国文学作品都没有。对外国文学作品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加强对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学习，这为文学教育开辟了新的渠道，开拓了学生的文学视野。

通过以上对文学文本的分析，不仅明确了文学文本中（包括非文学性散文）所承担的思想教育任务、语言教学任务、文化教育任务，同时还理清了文学文本所承担的文学教育具体任务及其特点。

第三节 2007 年语文课本选文分析

文学教育从 1986 年的语文课本就开始了，历经 1990 年、1996 年、2003 年和 2007 年共计五版教材，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都是培养初步的鉴赏文学作品的的能力，之所以选择 2007 年版的语文课来研究，是因为文学教育在经过了多版教材后的调整和修改后，尤其是 2007 年版是 1996 年版和 2003 年版的调整与发展，到 2007 年这版是相对完善的，同时在大纲中把文学教育要求的更加细致的是

2007 年的语文课本。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加深，鲁迅的作品在后七套教材中变化是很大，本节将从文学教育的角度对其作品在后七套教材中的嬗变进行分析。

将从 2007 年课本的产生的背景，课本的文学文本组成、文学选文编排体系进行分析；对后七套教材鲁迅作品的嬗变进行梳理，从而找出变化的原因。在分析过程中，会把前六套教材与后七套教材中的文学教育与鲁迅作品进行对比。

这版教材是在 1996 年版、2003 年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来的，是这些教材与实际教学相结合后，充分论证的结果，因此，要了解这版教材的背景需要先从 1996 年版开始。

自从 1978 年开始，人们没有停止对语文学科性质和学科任务的探索，虽然早就确定语文的工具性质，并在 1986 年和 1990 年大纲中明确提出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但为什么要培养，如何培养？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在上世纪末，语文教学大纲试图寻找答案，从文化层面来诠释文学教育，1996 年的《全日制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是这样认为语文学科性质的：“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语文学科，对于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对于学好其他学科、日后工作和继续学习，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的进步文化，促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提高民族素质，都有重要的意义”，（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1996：473）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情，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1996：473）。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学教育本身就是文化教育，而文学教育还具有其他作用：一是具有语言教育的作用，二是文学

教育能提高认识能力、起到思想教育作用和培养审美能力，三是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因此只有文学教育才能完成，才能完成这些教学任务。

为此，1996 人民教育出版社按照大纲编写一套高中语文教材，首先在江西、山西、天津试行，2000 年在全国开始推广。教育部在 2000 年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本）》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本）》，认为“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0：1）这与 1996 年的大纲相比，语文由人类文化的载体变成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语文的文化性认识的进一步肯定。高中语文大纲的教学目的认为，“要在初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水平，使他们具有实际需要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头交际能力，具有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和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掌握语文学习的基本方法，养成自学语文的习惯，培养、发现、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继续学习和终生发展打好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0：1）大纲还要求，至少看 10 部以上的名著，300 万字以上的科普书刊和其他的读物。2000 年的大纲很注重学生的基本的语文能力，对文学的鉴赏能力得以重视，文学教育开始得以在大纲中得以重视；同时对语文的文化性也得以重视。2003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总结上一版教材的经验的基础上，在 2000 年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本)》、2001 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的指导下，结合高中语文教育的实践，编写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

新世纪，中国社会上下对基础教育进行了大的讨论，社会期盼基础教育发生大的变革，教育部在 2001 年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1：1）对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和内容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课程改革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贯彻素质教育；新课程的目标应体现时代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1：1）从这个指导思想可以看出，由过去的政治性向更注重学生本身素质提高的培养方向转变。同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和学生的适应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1：2）也就是说，课程可以有国家的课程，地方的课程，学校的课程，从而使这些课程反映地方和学生实际需求情况，打破了过去由国家统一课程的局面。在教材的管理与发行中，新课标认为“完善基础教材的管理制度，实现教材的高质量与多样化。实行国家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新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改革中小学教材指定出版的方式和单一渠道的发行体制，严格遵循中小学教材的国家标准；教材的出版发行实行公开竞标”。（中华人民共和国，2001：3）实行国家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就是要使“一纲多本”得以落实。

在国家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颁布后，各学科都相继推出自己的学科改革要求。教育部颁布了《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它是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基础上，结合本学科制定的，也遵循了2000年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本）》。新课标在前言中认为“新世纪高中语文教育面临着新的要求，要顺应社会发展新的需要，调整课程的内容和结构，要在追求高中教育共同价值的同时，充分发挥语文课程促进学生发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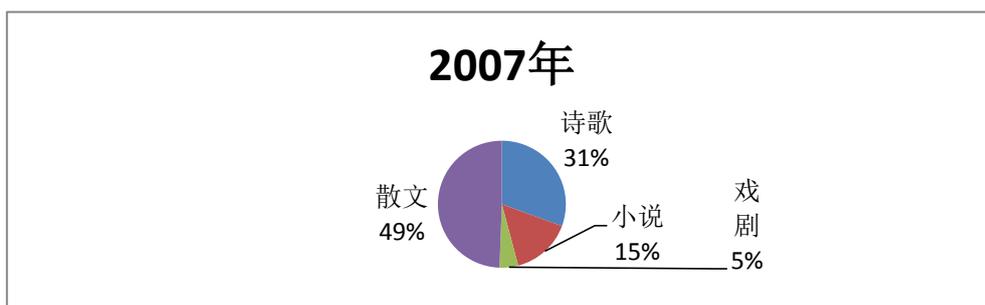
独特功能，要使全体高中学生获得必须具有的语文素养，同时帮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探寻自己发展的方向，给他们展示才华的舞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3：1）。新课标对文学教育的要求提的更详细，要求更明确：“学习鉴赏中外文学作品，具有积极的鉴赏态度，注重审美体验，陶冶性情，涵养心灵。能感受形象，品味语言，领悟作品的丰富内涵，体会其艺术表现力，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思考。努力探索作品中蕴涵的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了解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3：7）这是提出如何培养学生具有初步鉴赏文学作品能力方法，是一大进步。

语文课改始终围绕着如何注重学生个人的发展，更关注学生素质提高的问题。这种对学生素质发展的重视就是体现人文性，也就是文学教育和文化教育，而文化教育最好的载体就是文学教育。

人民教育出版社结合几年的教育实践，并结合语文新课标，在2007年出版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这套教材的编写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文教育研究所合著；语文学科顾问：刘国正、巢宗祺；编写者有：顾振彪、唐健新、赵晓非、程翔、朱于国、黄伟、王秉蓉、史杰鹏、温儒敏、吴岳添、张厚感、赵慎修等。审稿是：王本华和吕达。

这版教材只出版了5册，因此选文的数量与其他版相比少了不少。选文的构成依然是按文学体裁来划分，分为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这版语文课本的文学选文与1956年相比所承担的任务更多，文学教育目标更具体。它的体裁比例如下图：

图 5：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 年高中语文课本体裁比例



来源：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 版高中语文教材全书。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诗歌所占比例是 31%，小说所占比例是 15%，戏剧所占比例是 5%，此三者比例加起来是 51%，超过了散文 49%的比例，这是 1956 年后诗歌、小说、戏剧所占比例最高的一本教材，散文所占比例是最低的，而所选的散文几乎都是名家名著的文学性作品。这套课本是除了 1956 年文学课本之外，文学作品比例最高的。而且体裁比例与 1956 年文学课本相比比例更合理，尤其是给予散文这种常用体裁不少空间。与 1956 年文学课本相比，以中国文学作品为主，兼顾外国文学，而 1956 年都是中国文学，几乎是古代文学，因此 2007 年的文学选文的比例相比 1956 年的文学课本组成更合理。

下面对四种体裁进行详细分析：

首先与 1956 年的文学课本中的诗歌相比，本版课本所选诗歌 23 首，占选文比例 31%，诗歌以古代诗歌为主，现当代诗歌为辅，除了 3 首是现当代诗歌外，都是古代诗歌，而古代诗歌中又以唐宋诗词为主，兼顾魏晋南北朝诗歌，而 1956 年文学课本的诗歌 56 首，占选文比例 50%，诗歌全是古代，没有现当代诗歌，古代诗歌选自各个时代的作品，以文学史编排为编排体系，做到每个时代都有代

表作品。通过对比可以看出 2007 年版的诗歌选文容易教学，不足在于它不能向学生全面反映古代诗歌文学整体情况。

2007 年版所选小说 13 篇，占选文比例为 15%，中国小说 7，古代小说 4 篇，现代小说 3 篇，没有当代小说。外国小说以西方为主，没有苏联作品。而 1956 年文学文本，小说 22 篇，所占选文比例是 19%，古代小说 14 篇，现代小说 5 篇，当代小说 3 篇，没有外国小说。通过比较，2007 年版的小说选文优点在于有中外小说的结合，不足在于没有一篇反映时代的当代小说，与时代脱节。

2007 年版所选戏剧共 4 篇，中外各两篇，中国两篇，古代一篇，现代一篇，所占选文比例是 5%。1956 年文学文本，戏剧 2 篇，古代一篇，当代一篇，所占比例 4%。二者共同点在于选文中是最少的，但比起 1956 年的文学文本而言，2007 年版增加了不少，还增加了西方戏剧。不足在于，2007 年版的戏剧还是没有当代作品，缺少时代气息。当中所选散文共计 45 篇，所占选文比例是 49%，其中古代散文 20 篇，现代散文 7 篇，当代散文 7 篇，外国散文 11 篇。而 1956 年的散文共计 31 篇，全是中国散文，没有外国散文，其中古代散文 20 篇，现代散文 6 篇，当代散文 5 篇。两者相比较，2007 年版中外散文都有，兼顾中外。

通过比较，得知 2007 年版的选文比 1956 年，共同点在于都是选择名家名篇。不同点在与前者在教学上容易入手，选入不少外国文学作品，更具有开放新，多元性，不足在于诗歌、小说和戏剧缺少反映时代文学作品，与时代脱节。

另外从文本承担的任务上看，2007 年文本承担了语言教学任务、文学教学任务和文化教学任务，而 1956 年只有文学教学任务。因此，2007 年版功能更齐全。同时由于是三个任务都有，在实际教学中相互促进，因而更有利于文学教育。

2007年教科书分为必修课本和选修课本，必修是各类高中生共同学习的课程，在高一、高二和高三，共五册，而选修课是为学生主动选择和学习提供的内容，是必修课本的补充。这与1956年相比有相同之处，都提供了教科书的补充内容，只不过1956年只提供课外阅读参考书目，而2007年提供了统一编写的选修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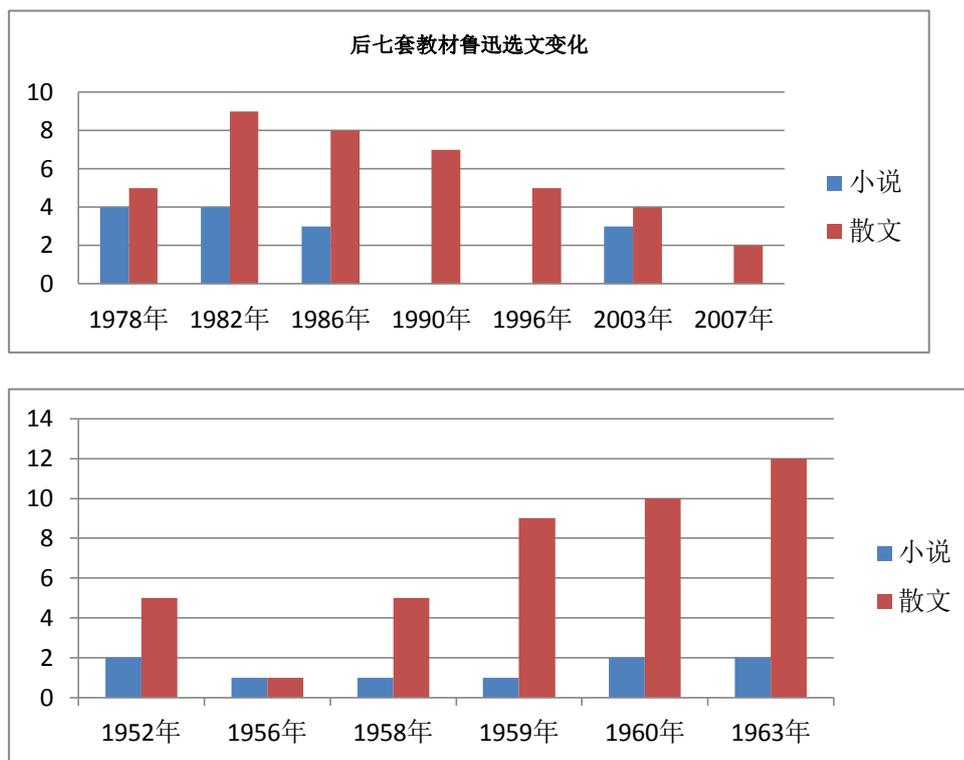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必修课本。必修课本的内容分为“阅读鉴赏”、“表达交流”、“梳理探究”和“名著导读”。前3部分纳入课内学习计划，“名著导读”可在课外自主安排。而论文所选择研究的文本只是“阅读鉴赏”，这是因为能够为研究提供选文支撑，另外这部分是教科书的主体，这与前后十三套教材共同之处在于提供教学的文本。

“课本的是分单元编排，单元的组成考虑文体与人文内涵。每册由4个单元组成，学习重点各有不同：有的侧重于对形象性较强的文学作品进行品味和鉴赏，有的侧重于对思辨性较强的说理文章进行思考和领悟，有的侧重于应用性较强的文章的理解。”（袁行霈主编，2007：1）。

从以上说明中可以看出阅读课文的编排是以单元为编排体系，依据是考虑作品的体裁和人文内涵。这与1956年的编排是不同的，它是以文学史为依据，没有单元的概念，只是以文学史的线索为依据。从这一点上，2007年的教材是有进步，相对科学。

在上一章中也分析了课本选鲁迅文章的缘由，一是基于鲁迅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二是鲁迅作品的政治性与当时国家的意识形态相一致。这里主要通过对比后七套教科书中鲁迅文章的数量变化，来分析变化的原因，同时特别注意在2007年版课本中所选作品的主要任务和原因。

图 6：人民教育出版社后 7 套教材与前六套教材鲁迅选文变化对比表



来源：以上资料整理自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8 版、1982 版、1986 版、1990 版、1996 版、2003 版和 2007 版共计七套高中语文教材。

从后七套中鲁迅选文可以看出如下变化：整体上鲁迅的小说和散文选文是在减少的，具体而言，1978 年到 1982 年小说和散文是增加的，但从 1982 年起，散文开始减少，一直到 2007 年，小说从 1982 年起一直减少到 2007 年一篇也没有，只是 2003 年版突然出现一下，当他的作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和语言教学时，处于增加状态，但文学教育开始后二者都在减少。而前六套鲁迅作品在文本中的变化是整体上是增加的，具体而言 1952 年到 1956 年是减少，但从 1958 年版开始就是不停的增加。当他的作品在作为思想教育和语言教学的课本中是不断增加的，在文学教育中只有两篇，一篇是小说，一篇是文学理论文章。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强时，鲁迅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是在增加，当文学教育强时，二者很少。从这一变化来看，教材的编撰者是把鲁迅的文章主要是作为思想教育的文本来看待的。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原因。

宏观上讲，是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决定的。对于语文学科性质是什么，从编撰第一套教材开始就在争论，思想政治教育过了是文学教育，文学教育过了又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过了又是语言教育，最后又被思想政治教育取代，导致前六套教材都是争论的实验品，这是时代的悲剧，但这种悲剧的过程人们也逐步认清语文的性质，即工具性。改革开放后语文学科性虽然认可工具性，但工具性与政治性的关系，谁是主要的，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才确定下来，虽然 1978 年和 1982 年的大纲认可语文具有工具性，但依然强调政治性与工具性相统一。

“语文课在进行读写训练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的过程中进行，读写训练也必须以正确的观点为指导，二者是相互相成的”（顾振彪等，2001：433）。这种定位在 1980 年的教学大纲依然如此。可见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与语言教育的地位相当。因此，鲁迅的文章数量是递增的。但随着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进一步的加深，直到认识到需要增加文学教育和文化教育，任务的增加，文学文本相应就要增加，而此时思想政治教育相对弱化，鲁迅作品自然就减少了。

微观上讲，是鲁迅文学作品的特点决定的。从上一章分析中得知鲁迅的文章，包括小说和散文或者叫杂文一开始就带有政治性。他就是要通过小说、散文或者杂文来改良国民的政治目的，体裁只是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而已。因此他的文章时代性很强，只是反映他生活那个时代的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

化，尤其是时代性问题，在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中提到“高中语文课程必须体现时代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3：2），因此鲁迅的作品所在的时代性消失了，新的时代出现，就需要进行调整。

因此鲁迅的作品的政治和时代特性与思想政治教育时代相结合时，他的作品就多，一旦这样的时代没有了，就会降低。但为什么依然有，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变弱并不是没有，二是他的作品是用现代文写成的，是现代文学成就最高，所以他的作品依然是语言教学与文学教育的重要文本。

第四节 小结

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的教育政策从为政治服务，转向为经济建设服务，九十年代后转向为国民素质的提高服务，这些政策的变化，加快了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的探索，随着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加深，逐步认识到语文具有工具性、政治性、文学性和文化性，学科性质决定学科任务，因此语文学科性质决定语文的教学任务，因此语文的教学任务有四个，分别是思想政治教育任务、语言教育任务，文化教育任务，也承担着文学教育任务。由于语文课本的组成主要是文学文本，因此这些文学文本的嬗变体现了国家教育政策、语文学科性质和语文教学任务的变化。

后七套课本选文变化的特点是：一是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非文学文本越来越少，思想政治教育逐步淡化，转化成思想道德教育；二是文学文本在课本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文学文本承担的教育任务由过去只是文学教育或者只是语言教育，发展为同时承担着语言教育、文学教育和文化教育。三是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数量都在增加，尤其是外国文学作品由前六套时主要是苏联作品转变成主要是

西方世界作品，外国文学作品承担的教育任务由前六套的思想政治教育转变成后七套的文学教育、文化教育和语言教育。

文学教育主要是从 1986 年版课本开始一直持续到 2007 年版，在这些课本中，文学教育主要是审美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个性化的审美感知、审美创造能力。后七套课本的文学教学与前六套的文学教育相比，时间上具有连续性，是逐步发展与完善的过程，而不像前六套只有 1956 年版才有较系统的文学教育，文学文本兼顾古今中外，而不是像 1956 年只有中国文学。通过 2007 年版课本中的文学选文与 1956 年版的文学文本对比得知，2007 年课本的体裁构成、选文编排，都比 1956 年版文学文本科学系统，但在小说、诗歌和戏剧选文缺少时代性。鲁迅选文的变化特征是，在前六套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时期，选文数量是递增趋势，在后七套思想政治教育弱化时期，选文数量是递减趋势。原因是前六套意识形态斗争时期，课本选择鲁迅的作品偏重选文的政治性，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后七套改革开放时代，课本选择鲁迅的作品偏重于选文的文学性，注重文学教育，目的是为了全面提高国民的素质。

第五章 文学教育与语文课程：工具性、经典性和时代性

第一节 文学教育的工具性：文学接受在教学中的作用

中国国家教育政策从最初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发展到后来为经济建设服务，发展到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这个过程就是教育为政治服务，发展到为经济服务，再发展到教育为国民个人服务。以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为国民个人素质提高服务是教育理论中个性发展观的体现。

张华认为个性发展观是指“健全的个性体现了个人与社会内在的融合，个性的发展内在地包含了社会的发展”，（张华,2000：441）如何理解个性发展观？张华认为从三点来理解，一是“个性是完整的，创造力、想象力等品质是个性发展的表现”，二是“个性是独立的、具体的、特殊的”，第三“个性发展内在地包含了社会的发展，每个人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的发展”。（张华,2000：443-445）可见能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和独立、具体、特殊的个性是个性发展观的内容。

在2003年的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认为，“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有个性的发展”，“审美教育有助于人的知情意全面发展。文学艺术的欣赏和创作是重要的审美活动，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也多贯穿着审美追求。未来社会更需要美，需要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语文具有重要的审美教育功能，高中语文课程应关注学生情感的丰富和发展，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审美感知和审美创造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3：1）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表明审美教育能促进学生个性发展，而语文教育中能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创造力、

想象力、思维能力等个性发展的只有文学教育，文学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审美能力、进行情感体念，进行人文知识的传播和思维能力的开发。审美能力是个性发展的需要，审美体念也是个性发展的需要，人文知识的学习也是个性发展的需要，思维能力的开发也是个性发展的需要。因此进行文学教育，就是在发展学生的个性，是个性发展观的体现。

文学接受是指“通过多种阅读方式与作品进行与作品进行对话、交流。接受美学的理论家认为：文学文本的接受是一种解释活动。作品的意义并不是固有的、隐藏在作品之中，而是存在于读者对作品相互作用的结果”。（陈文忠，2007：158）文学接受有三个层次，主要是欣赏、批评、借鉴。“欣赏性接受，其接受主体是普通读者，着眼于作品的阅读欣赏，目的在于对于作品审美性的感受、体念、赏玩，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它是一种审美接受活动，满足于个性读者的审美需要，着重实现的是作品的审美价值”。（陈文忠，2007：158）在文学教育中的接受者学生就是欣赏性接受，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阅读获得情感体念和审美享受，从而实现作品的审美功能的价值，进而培养了学生们的审美能力。

“批评性接受，其接受主体主要是学者、评论家，侧重于对作品的鉴赏研究、理性批判。它是在审美体念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理论观点和审美标准，对作品进行理性的分析、研究和评价、判断。它是一种建立在审美接受活动基础上的科学活动，是审美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着重实现的是作品的包括价值在内的广泛的社会价值。”（陈文忠，2007：159）教师在进行文学教育中，必然是建立一定审美体念基础上，结合一定的理论观点和审美标准，对所教的作品进行鉴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文学教学的讲解与传播。因此教师在文学教育中是一种批评性接受，目的是通过自己的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从而实现文学作品培养学生情

感体念、审美能力和认知功能等社会价值的实现。“借鉴性接受，其接受主体主要是文人、作家，着眼于对作品的借鉴、学习。它是在审美体念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个性化的研究、分析，意在探寻其成功的奥秘，借鉴其艺术上的优长，学习其创作技巧，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它是一种一审美接受为基础的学习再创造活动，审美性、创造性是其追求的目标。”（陈文忠，2007：158）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审美活动，在文学教育的过程中，学生也可以通过借鉴接受来提高自己的文学创作水平，但这不是文学教育中的主要审美接受形式，在文学教育中欣赏性接受和批判性接受是其主要的接受形式。

在文学教育中，师生主要通过欣赏性接受和批评性接受这两种文学接受形式，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能力，而审美能力的提高就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这就是文学教育的工具性的体现。

语文课本中文学选文的变化体现个性发展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语文课本由“一纲一本”变成“一纲多本”，这是从整体上促使选文的变化，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学生个性差异发展的需要，这也体现了个性发展观；二是在同一套课本中，实行必修课与选修课的结合。“必修课的主导价值在于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共性，选修课的主导价值在于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个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3：4）选修教材明显体现了个性发展观；三是具体到人民教育出版社13套课本的文学选文的变化。

人民教育出版社13套高中语文课本文学选文整体的嬗变情况有如下特点：一是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非文学性散文越来越少，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在弱化；二是文学作品越来越多，主要承担着语言教育任务、文学教育任务和文化教育任务。

文学文本越来越多，这就为文学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文学选文，这就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从而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

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政策是个性发展观的体现，落实到具体的语文教育任务中，就是文学教育的审美教育功能能够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这是文学教育工具性的体现。文学教育的发展，又促使课本中的文学选文的增加，这就为文学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文本，文学教育与课本中的文学文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第二节 文学教育的美学功能：课本的选文与经典化意义

鲁定元认为：“简言之，文学教育是以文学为媒介来培养人的活动。文学教育对学生语言文化知识的掌握、语言读写能力以及审美能力的提高、思想品德的完善和精神境界的提升都具有独特的功效。”（鲁定元，2005：32），郭英德认为：“文学教育，指的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之间，经由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丰富情感体念，获得审美愉悦，培养语文能力，进而传授人文知识、提高文化素养、陶冶道德情操的一种教育行为”（郭英德，2006：11）。孟抗美认为：“文学艺术教育是以文学为媒介培养人的艺术能力和艺术境界的自由有序的系统活动，文学教育是通过文学欣赏品评和文学创作来陶冶情操，塑造人性的一种教育活动。”（孟抗美，2002：2）三位学者都提到文学教育中文学文本作为文学教育的载体的重要性，文学文本是开展文学教育的物质基础，没有文本，文学教育无从谈起。文学教育可以分为体制外和体制内两类，体制外的文学教育是本人自学的，家庭的，社会的一系列方式的文学教育形式（秦春，2009：6）；体制内的文学教育是指，“指文学教育纳入到国家教育体制中，规定文学教育所要实现的目标、实施途径以及评价机制等，往往以教学大纲、文学教材等形式出

现,而这种体制形态的文学教育终落实到各级各类学校文学教育教学实践上”(秦春, 2009: 6)。体制内的文学教育是由基础的文学教育,还有专业的文学教育构成,而本文只限在基础的文学教育,本文研究的就是中国高中语文课本为载体的文学教育。因此综合以上观点,本文的高中文学教育定义就是:按照国家高中语文教育大纲的要求,以指定的高中语文课本中的文学文本作为文学教育载体,进行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对学生进行情感体念和审美教育,以及传授人文知识的一种教育行为。高中文学教育文学文本的选择,是受到国家教育政策的干预,文学教育过程,是一个对文学文本的诠释与传播的过程,因此高中文学教育就是一种促使文学经典形成的途径。

高中文学教育的载体是语文课本中的文学文本,它的教育对象是高中学生,通过文学教育要传播给学生内容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情感体念和审美教育,以及人文知识,这些内容就是文学教育的任务。情感体念也叫情感功能,也叫情感教育,是指读者与作家的一次心灵情感的交流,“在欣赏过程中,读者会依据自己的情感需要和受感染的程度与作者进行情感的交流和心灵的对话,从而使情感得到宣泄、补偿、调节以至升华。”审美教育,是指“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满足读者的审美需要,将读者带入自由的审美境界,并在审美的愉悦和精神自由的快乐之中,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审美趣味。”(王文忠, 2007: 179)文学教育还有文化教育功能,“文化涵养,就是以审美的方式建设学生的内在文化环境,优化他们的文化素养体系,促进学生整体文化素质、文化人格的提高”;文学教育还有语言教育功能,“言语培养功能,就是让学生欣赏到语言艺术的精华,获得丰富的语言底蕴,受到特有的语言磨炼,培养语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文学教育还有思维训练功能,“思维优化功能,就是促进学生形象思维、理性思维和创造思维的

发展。”（范冬梅，2003：17-22）其中审美教育是这些教育中的核心和主导，因为审美功能是众多文学功能的核心和主导，“审美功能又是其他各种功能的核心和主导，离开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其中的情感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就失去了它们的文学身份”。（王文忠，2007：181）

文学教育使学生获得审美能力、提高文化涵养、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提高思维能力等，这样才能使文本的文学功能得以体现，从而使这些文本得以一次次保留在课本；同时接受文学教育的学生群体就变成一批又一批的读者群，读者群的扩大有利于这些文本的传播。“通过教师的引导，培养学生文学的兴趣，为文学作品培养广大的读者群”（李艳梅，2012）使文本一次次的保留在课本和培养一批批这些文本的读者群，就是一种经典的形成过程。

可见，文学教育，就是通过教师的诠释与讲解使文学功能被学生接受与传播，这个过程促成文学经典的形成。

在中国高中语文教育中，文学教育是语文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教育、文学教育和文化教育中的一种教育任务。在第三、四章的分析中可以得知，文学文本占课本选文的主体，但由于受到国家语文教育政策和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情况的影响，文学教育并不是一直就有的。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高中语文教育中的文学教育，根据大纲的要求主要是指文学的审美教育，因为审美教育是文学教育的核心和主导。在语文教育中，文学文本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任务、语言教育任务、文化教育任务、知识教育任务、思维训练任务，但文学的审美教育任务并不是和这些任务同时存在的。在前六套教材时期，只有1956年版的课本的文本是用来进行文学教育的，如审美教育、文学史和文学知识教育，但却没有进行其他几个教育；1952年版、1958年版、1959年版1960年版课本，主要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1963年版课本主要进行语言教育。在前六套教材中，文学教育的几个教育功能都是被分开进行，尤其是文学教育中的审美教育，只在1956年得以体现。在后七套教材时期，1978年和1982年的依然还是进行语言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从1986年开始，才出现审美教育，直到1996年，才出现文化教育。可见在此之前语文课本中的文学选文的文学功能一直是被分开的，这种把文学功能人为分开错误的，这些文学功能是一个整体，就像王文忠认为“文学的情感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认识功能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文学功能的系统结构”从1996年开始，文学文本才开始进行比较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教育、文学教育、文化教育、思维能力训练。文学文本承担这些教育任务的过程，虽然也促使了这些文学经典的形成，但是把审美教育作为文学教育的核心来促使文学经典形成只有1956年版、1986年版、1990年版、1996年版、2003年版和2007年版共计6套教材。因为语文教育中进行文学的审美教育，要受国家语文教育政策和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水平的影响，在这六套教材中，语文教育大纲明确了要进行文学的审美教育和人们在语文学科性质中认识到要进行文学的审美教育，这些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已经阐述了。

在进行文学教育的六套教材中，选文主要是文学作品，尤其是1956年的文学教材和2007年的课本，文学选文最多。在这些作家作品中有一位作家是很典型的，就是鲁迅。在第四章中分析得到，他的作品在13套教材中都有，在前六套教材中是呈递增趋势，在后七套教材中呈递减趋势，但依然没有消失。在三、第四章中分析到，他的作品被选入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二是他的作品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性与时代相结合，国家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

选入其作品，使其成为一种文学经典。现在只从文学教育的视角分析他的作品在六套有文学教育的课本中如何成为文学经典的。

表 5：人民教育出版社有文学教育要求的高中语文课本中鲁迅作品统计情况

版次	篇章
1956 年版	《药》（小说）、《对于左翼作家的意见》（散文）
1986 年版	《祝福》、《阿 Q 正传》（小说） 《纪念刘和珍君》、《拿来主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为了忘却的纪念》、《呐喊自序》、《范爱农》（散文）
1990 年版	《祝福》、《阿 Q 正传》、《药》（小说） 《纪念刘和珍君》、《拿来主义》、《呐喊自序》、《论“费厄泼赖” 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散文）
1996 年版	《祝福》、《阿 Q 正传》、《药》（小说） 《纪念刘和珍君》、《拿来主义》、《灯下漫笔》《为了忘却的纪念》、 《流产与断种》（散文）
2003 年版	《祝福》、《阿 Q 正传》、《药》（小说） 《纪念刘和珍君》、《拿来主义》、《灯下漫笔》、《呐喊自序》（散 文）
2007 年版	《祝福》（小说） 《纪念刘和珍君》、《拿来主义》（散文）

来源：以上资料整理自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6 年版、1986 年版、1990 年版、1996 年版、2003 年版、2007 年版共计六套高中语文课本。

从以上统计表中可以看出，《药》、《祝福》、《阿 Q 正传》是这六套教材中常选的小说，《药》和《祝福》都出现五次，《阿 Q 正传》出现四次。《纪念刘和珍君》和《拿来主义》是这六套教材中出现最多的散文，都连续出现五次。这些作品能够选入课本一是国家语文教育大纲的指导和语文学科性质认识情况的影响，这种指导和影响是一种教学干预，促使这些文本成为经典。二是由鲁迅的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决定的。这种地位的体现主要来自于这些作品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功能上，如审美功能、情感功能、语言功能、认知功能、劝说功能等。

以《药》、《祝福》、《阿 Q 正传》为例，鲁迅在这些作品中创造了典型的“看客”形象，冷漠、无知与愚昧，这种形象是对中国国民性的形象生动的批判。“鲁迅的这些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既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钱理群，2003：55）通过文学教育，老师的讲解，学生的阅读，学生能够感受到鲁迅作品中典型的“看客”形象，能够体会到通过这种批判唤起国民的醒悟，这些作品的审美功能和情感功能就得以体现，作品得以传播。而这种传播是经过六套文学教育的教材，前后近六十年的诠释与传播，这样鲁迅小说典型的“看客”形象就留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这些作品因成功塑造这些形象而流传，最后成为经典。

第三节 课本选文时代性与文学教育

陈思和认为“中国 20 世纪文学是一个开放性的整体，中国当代文学只是其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般是指 1949 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发展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后，所产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过程，它延续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同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与 20 世纪前半叶的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与处于同一时期发展着的另一空间的台湾文学、与殖民地化了一个多世纪、于今终于回归的香港澳门地区的文学，构成一个完整的、难以分割的文学整体现象。但目前它无法沟通、涵盖这些文学现象。”（陈思和，2001：7）洪子诚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是指 1949 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指的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因而它限定在‘中国大陆’的这一范围之内；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在文学史中如何‘整合’的问题，需要提出另外的文学史模型来予以解决。第三，本书在运用‘当代文学’时的另一含义是，‘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间，是‘五

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洪子诚，1999：4）以上两位学者都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从1949年后的大陆文学，特别强调了时间是1949年后，地点是中国大陆，对于没有包括的港、澳、台，两位都提到目前面临的困难，笔者赞同两位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定义既1949年后的大陆文学，使用这个定义除了两位学者讲到的原因之外，还有就是后面的研究中特别需要强调1949年后中国大陆作家的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作品，把这个时间段选文数量与1949年前现代文学、古代文学选文数量进行比较，从而找到高中语文课本文学选文存在的问题。

当代文学作品选文不足是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必修)课本的一个突出问题，从1956年文学课本和1986年语文教育大纲再次要求文学教育开始，当代文学作品一直很少，尤其是诗歌、小说和戏剧更少，这导致课本选文时代性不足的问题。选文缺少时代性使学生失去学习文学的兴趣，更阻止当代作品通过文学教育成为文学经典。由于当代文学作品，特别是1978年后的作品，被大量选入选修课本，但很少选入必修课本。这里的必修课本是指语文教科书，同时人民教育出版社为必修课本编写了配套的选修课本。在语文教育中，教师要充分利用选修教材的当代文学作品进行文学教育。

（一）必修课本文学选文时代性与文学教育

当代文学在高中语文教科书中情况如何呢？先看下面的统计情况。

表 6: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套高中语文教材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统计对比表

年代	古代文学	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	外国文学	作品总数	古文占总数比例
1952 年	42	26	29	11	108	38.9%
1956 年	92	12	9	0	113	81.4%
1958 年	5	15	31	3	78	6.4%
1959 年	32	30	39	10	110	29.1%
1960 年	43	42	40	10	135	31.9%
1963 年	82	38	23	15	158	51.9%
1978 年	34	34	33	11	112	30.4%
1982 年	79	45	54	13	191	41.4%
1986 年	37	27	15	6	89	41.6%
1990 年	58	35	53	10	150	38.9%
1996 年	88	25	73	27	214	41.1%
2003 年	96	22	44	27	189	50.8%
2007 年	44	15	7	19	85	51.8%

来源：以上内容整理自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2 年版、1956 年版、1958 年版、1959 年版、1960 年版、1963 年版、1978 年版、1982 年版、1986 年版、1990 年版、1996 年版、2003 年版、2007 年版共计 13 套教材。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看出，古代文学一直是语文课本的主体，当代文学在整体上是超过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除了 1956 年和 2007 年例外。具体而言课本的当代文学选文有两大特点：一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教育和文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时期，当代文学选文数量超过现代文学选文数量。二是：重视文学教育的 1956 年和 2007 年的语文课本，当代文学却没有现代文学多。

再看另一张关于当代文学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选文分布情况表：

年代	当代诗歌	当代小说	当代戏剧	当代散文	当代作品总数
1952 年	1	7	1	2	29
1956 年	0	3	1	5	9
1958 年	5	4	0	31	40
1959 年	4	5	1	28	38
1960 年	1	6	0	33	40
1963 年	1	2	0	20	23
1978 年	3	3	1	26	33
1982 年	2	3	0	49	54
1986 年	1	1	1	12	15
1990 年	2	1	2	48	53
1996 年	4	1	1	60	66
2003 年	3	1	1	39	44
2007 年	0	0	0	7	7

表 7: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套教材中国当代选文中四个体裁统计

来源：以上内容整理自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2 年版、1956 年版、1958 年版、1959 年版、1960 年版、1963 年版、1978 年版、1982 年版、1986 年版、1990 年版、1996 年版、2003 年版、2007 年版共计 13 套教材。

从以上统计表可以看出，无论是承担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教育任务、文学教育任务还是文化教育任务，散文都占当代文学选文的主体。而诗歌、小说和戏剧在当代文学选文中的地位是次要的，这三个体裁在前六套中入选的作品数量超过后七套入选的作品数量，当然前六套教材中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主要是用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用于文学教育的 1956 年的诗歌、小说和戏剧最少。后七套教材中这三个体裁选文数量呈递减趋势，直到 2007 年一篇也没有。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 13 套教材中，大纲明确要求要进行文学教育的课本只有 1956 年版、1986 年版、1990 年版、1996 年版、2003 年版和 2007 年版，共计 6 版教材，虽然没有占到 13 版教材的一半，但从 1986 年开始，文学教育就开始不断的得到重视，尤其是从 1996 年开始重视文化教育后，文学文本在教材中所占的数量更大，从体裁上看，到 2007 年，就是只算诗歌、小说、戏剧就得到 51% 比例，散文中的文学散文比例也很大。但是按照文学史来划分，情况就不一样了。当代诗歌、当代小说和当代戏剧从 1986 年的文学教育开始所占当代文学的量本身就很少，整体上是递减的，到 2007 年一篇也没有选上。现在看看从 1986 年文学教育开始后这三种体裁的现代文学选文的具体情况。

1986 年的教材，诗歌选了李瑛 1977 年发表的《一月的哀思》，这是表达对周总理的思念之情，马烽 1980 年发表的《结婚现场会》上下部，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农村生活的变化。峻青 1954 年写的小说《党员登记表》，反映国统区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

1990 年版教材选了舒婷 1977 年创作的爱情诗《致橡树》，这是爱情诗歌第一次入选课本；流沙河与 1982 年回应余光中先生“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

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而作的《就是那一只蟋蟀》。这两首诗被选入课文与当时改革开放后追求自由爱情、期盼祖国统一的时代背景是一致的。小说选的是峻青的《党员登记表》和戏剧选的是老舍的《茶馆》，这两篇作品都是在1978年前创作的。

1996年版教材选了选了舒婷的1980年写的爱国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表现诗人对祖国深深的热爱之情。艾青的《鱼化石》和牛汉的《华南虎》，都是关注当下人与自然的问题。高晓松1980年写的《陈焕生上城》，主要描述改革开放后，新时代农民陈焕生进城的故事。这一时期的作品都是反映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生活。

2003年版教材中选了诗歌中国台湾当代诗人郑愁予1954年写的《错误》，写家里的爱人思念归人的情怀；也选了舒婷的爱情诗《致橡树》；还有海子写于1989年的《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抒发了诗人积极的生活热情。高晓松的小说《陈焕生上城》；老舍的戏剧《茶馆》。

以上当代作品中写于1978年以前的少于写于1978年后的。从这些统计可看出，这些教材是尝试过选当代诗歌、当代小说和当代戏剧的，只是更重视文学教育的2007年版课本却什么也没有选。

现在把1956年和2007年的选文进行统计。

表 8：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和2007年课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统计表

年代	古代文学	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	外国文学	作品总数
1956年	92	12	9	0	113
2007年	44	15	7	19	85

来源：以上内容整理自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和2007年版两版高中语文课本

以上两套教材中可以看出，两套教材的共同点在于对中国文学是最重视的，不同点在于 1956 年没有外国文学，而 2007 年外国文学得以重视。在中国文学中，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最重视的是古代文学，其次是现代文学，最后是当代文学，也就是说在两套教材中中国当代文学的选文是最少的，尤其是 2007 年版，当代文学选文还没有外国文学多，再看当代文学更细致的统计。

表 9：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6 年和 1957 年高中语文课本当代文学选文统计情况

年代	当代诗歌	当代小说	当代戏剧	当代散文	当代作品总数
1956 年	0	3	1	5	9
2007 年	0	0	0	7	7

来源：以上内容整理自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6 年版和 2007 年版两版高中语文课本

从当代诗歌、当代小说、当代戏剧和当代散文这四个层面来看，2007 年的选文比例还不如 1956 年合理，有 3 篇当代小说，分别是 赵树理的《老杨同志》、黄铁等的《马铃薯来玉鸟叫》和南宁的《检验工叶英》，当代戏剧 1 篇，是郭沫若的《屈原》，5 篇散文中有四篇是文学史知识，一篇是《人民日报》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在 9 篇当代文学选文中，只有 3 篇小说和 1 篇戏剧是文学作品。

2007 年的当代文学，除了 7 篇当代散文外，其他的一篇都没有。7 篇当代散文分别是：巴金的《小狗胞弟》、周婷 杨兴的《别了，“不列颠尼亚”》、贾永 曹智 白瑞雪的《飞向太空的航程》、周立明的《动物游戏之谜》、朱光潜的《谈美》、袁行霈的《中华文化精神》和梁思成的《中国建筑的特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文学在课本中是缺失的，所选作品缺乏时代性，尤其在文学教育中是没有受到重视的，这会导致学生对文学学习兴趣的下降。对于文学教育中选文的这种情况，不少学者提出了批评。

孙玲在认为现行教材存在的问题是：“多元语境下时代精神滞后，审美意趣老化”、“大众文化文本形态与精英文化文本形态的冲突”。（孙玲，2007：9-13）

另外樊华强认为，作为选文的语文课本应该是经典性与时代性的和谐统一，但实际上教材却没有做到。（樊华强，2013：61-62）

以上两位学者从多元文化角度和经典化角度来指出现行语文教材存在的时代性不足的问题，这与笔者对两套高中语文教材的分析得出的缺少当代文学是一致的。倘如当代文学中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依然不被选入语文教科书，这就缺少了国家层面的教育干预，同时当代文学教育没有教学的文本，就谈不上当代文学教育，这就缺少了对当代文学的诠释与传播。显然不利于当代文学教育的发展，更不利于当代文学作品经典的形成。

（二）选修课本文学选文时代性与文学教育

针对高中语文选文缺少当代作品的问题，国家层面和教材编写者都在进行探索。

从1978年开始语文教学大纲就开始赋予地方有改变统一教材的权利。

如1978年大纲认为“课文分为讲读和阅读两种，其中10%至15%可由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抽换，代之以乡土教材和配合当时斗争形势的补充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78：421）。1980年的大纲这样规定“课文分为讲读和阅读两种。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实际情况，对课文可作适当的抽换和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80：434）。1986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就提出“为了适应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语文学科必须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同时规定“除基本篇目外，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对通用教材

中的其他课文进行抽换，也可以自编补充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1986：445)1990年大纲规定“除基本课文外，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对通用教材中的其他课文进行抽换，也可以自编补充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1990：455)

大纲里明确赋予地方抽换和补充统一教材的权利，在1978年前是没有的，这为地方教育部门灵活的处理教材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在此政策的影响下一些地方因地制宜，开始了尝试。主要有上海、北京进行了初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尝试，浙江、江苏开始了初中教材的尝试。

以上海为例，王光祖等在《以训练阅读能力为主线，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质——上海H版中学语文课本简介》一文中谈到“上海市中小学语文教材，在上海市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领导下，由华东师范大学与徐汇区教育局于1988年联合建组编写任务。主编是徐中玉、徐振维（执行）。1994年，徐振维先生不幸去世后，由王光祖任常务副主编，陈文高、赵百超、盛子明为副主编。先后参加过具体工作的编写成员计有高校教师、区县语文教研员、中小学骨干教师40余人。编写工作从1989年开始，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年级段同时分别进行。1993年底，全套26册（必修24册，选修2册）‘实验本’教材基本编写完成。同时，从1990年开始，该教材在徐汇区各中小学的起点班以及全市40多所学校的试点班进行试点。1993年以后，在第一轮实验的基础上，广泛听取意见，又对实验本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在坚持原有体系特色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质量，降低难度。从1994年开始，作为‘试用本’在全市全面推开。”(王光祖等，2001：703)

上海的尝试是在全国统一大纲指导下的尝试，也为后来‘一纲多本’高中语文教材的出现做准备。上海等地的尝试得到了国家的认可，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纲要第33条中再次明确“中小学教材要在统一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中共中央、国务院，1994:9）这个政策为各地进行在统一大纲的基础上进行课本的改革进行了支持，后来在沿海发达地区，“一纲多本”快速实行，有效的弥补了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课本选文的不足。在新课程标准提出后，高中语文“一纲多本”就正式成为国家基础教育的正式指导思想。

实行“一纲多本”确实给予地方很大的自主权，编写适合本地方的教材，但对于依然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教材的地方在面对课本不足时还是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一个是根据实际情况抽换和补充课文，另一个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自己也在尝试改革，就是编写选修教材。

在全国开始“一纲多本”尝试后，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对教材的多样性也进行了改革。在1996年的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中提出了必修课，限定选修课和任意选修课。“必修课是指各类高中生共同学习的课程，在高一、高二完成。课本主要就是高中语文必修课本”；“限定选修课，是必修课的、应用，供预备升学或就业的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选修。限定选修课在高三开设”；“任意选修课，是为发展学生兴趣爱好、拓宽知识、培养特长、提高某方面的语文能力而设置，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和志向，在老师指导下自主选修。可以开设汉字和书法、使用语法修辞、语言逻辑、影视欣赏和评论、实用美学、乡土文学、民俗文化、中外文学名著选读、中外文化史话等。”（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2001：474）。

有了大纲的指导，人民教育出版社不仅编写了高中语文教科书，还编写了配套的语文读本。这些语文读本分为文科和理科，文科的读本有《写作》、《文言文选读》和《中外文学名著选读》等，主要培养语言、文学修养和文言文能力。理科主要是《中外科普论著选读》和《科学小论文写作》。任意选修课读本就很丰富，有《汉字与书法》、《实用语法修辞》、《语言逻辑》、《影视欣赏和评论》、《实用美学》、《民俗文化》和《中外文化史话》。这就为选修课与任意选修课的开展提供了文本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读本可以弥补语文教科书选文方面的不足，尤其是当代文学选文的不足。倘若老师在上课过程中意识到当代文学作品，如诗歌、小说和戏剧不足，可以从《中外文学名著选读》和《影视欣赏和评论》里面抽选文本进行教学。顾振彪认为“1.按照新的高中课程计划，高中语文课时是有史以来最少的，而教学的要求并没有降低，因此有些教学内容不得不转移到语文读本中。2.语文读本中的内容，有些是帮助对教科书的理解和掌握，有些是对教科书的延伸和演化。要提高语文能力，不能完全依赖于教科书和课堂教学，还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课外认真阅读语文读本。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读本和教科书是姐妹篇，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顾振彪，2001：637-639）顾振彪把语文读本的地位提的很高，这是必修课教材的需要，在教学中语文老师要充分利用读本来弥补教科书的不足。

选修课本在 2003 年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新课程标准》得到了更详细的阐述。语文教材依然是必修课教科书和选修读本，对于选修读本，课程标准认为选修课依然是基础教育的一部分，是高中语文教育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对于选修课程，课程标准作了如下安排“选修课程设计了五个系列：诗歌和散文（语文选修 1），小说与戏剧（语文选修 2），新闻与传记（选修课 3），语言文字

应用（选修课4），文化论著研读（选修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3：2）。在新课程标准中对文学鉴赏的要求很详细，对于诗歌和散文具体开设的课，课标建议可以开设中国古代诗词曲选读、唐诗选读、宋词选读、元曲选读、唐宋散文选读，中国现当代诗歌选读、鲁迅杂文选读、外国诗歌散文选读。对于小说和戏剧也有建议的课程，中国古典小说选读、中国现当代小说选读、外国小说选读、中外戏剧选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3：8）

由于2003年的必修语文教科书存在当代诗歌、小说和戏剧的不足，老师和同学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从诗歌和散文，小说和戏剧这两个系列选修课本中选出适合的文本，如中国现当代诗歌选读，中国当代小说选读和中外戏剧选读，对教科书在这方面选文不足加以补充。

在200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再次修订出版了15套选修课本，这就为2007年的语文教科书提供了丰富的文本。它们是：《中国小说欣赏》、《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外国诗歌散文欣赏》、《中外戏剧名作欣赏》、《外国小说欣赏》、《先秦诸子选读》、《语言文字运用》、《文章写作与修改》、《影视名作欣赏》、《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演讲与辩论》、《新闻阅读与实践》、《中国文化经典研读》、《中国民俗文化》、《中外传记作品选读》²²。这些选修教材在2003年的基础上，内容多了。有8本教材是与文学相关的，可见这套选修教材是重视文学教育的。2007年的语文教科书在当代诗歌、小说和戏剧方面没有选文，可以从《中国小说欣赏》、《中外戏剧名著》、《影视名作欣赏》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中选取作品，对教科书进行补充。

²² 整理自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15套选修教材。

2007年的教科书连一篇当代戏剧作品也没有，但可以从《中外戏剧名著里》选修老舍的《茶馆》。其实戏剧在整个教材体系里都是很少的，这本选修教材可以提供不少戏剧名篇。同时还可以从《影视名作欣赏》中来欣赏经典的影视剧本，影视剧也是戏剧的一部分，它是舞台戏剧发展的结果。“戏剧的发展始终和文学密不可分，与诗歌、散文、小说相激相荡，相汇相融。到了20世纪，戏剧把自己的生命延续到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中，成为这些新兴艺术的血脉。”（袁行霈，2007：前言）在这套教材中，主要的影视作品有：《城南旧事》、《梦断蓝桥》、《阿甘正传》、《淘金记》、《卧虎藏龙》、《海底总动员》、《三国演义》、《故宫》。²³这些作品是国际国内知名的影视名作，倘若充分用好这些作品，就解决了当代戏剧作品不足的问题了。

针对当代诗歌不足的问题，可以选修《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在这本教材里，诗歌单元共分为五个单元，每个单元分为精读和略读两部分，现将这些单元的作品列出来，第一单元，精读作品是郭沫若的《天狗》，略读作品是杜运燮的《井》、穆旦的《春》、邹荻帆的《无题》和蔡其桥的《川江号子》；第二单元，精读毛泽东的《贺新郎》，略读闻一多的《也许---葬歌》、刘半农《一个农家的暮》、痖弦的《秋歌---给暖暖》、江非的《妈妈》；第二单元，精读作品是冯至的《蛇》、略读作品是何其芳的《预言》，陈敬容的《窗》、纪弦的《你的名字》、舒婷的《神女峰》；第四单元，精读作品是昌耀的《河床》、略读作品是郑敏《金黄的稻束》、李广田的《地之子》、牛汉的《半棵树》、洛夫的《边界望乡》；第五单元，精读作品是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略读作品是臧克家的《老马》、绿原的《憎恨》、食指的《这是零点八分的北京》和梁小斌

²³ 整理自袁行霈主编的200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选修教材《影视名作欣赏》。

《雪白的墙》²⁴。在以上选编的诗歌里，有很多是当代诗歌，这可以弥补教科书上当代诗歌的不足。

针对当代小说选文不足的问题，可以选修《中国小说欣赏》，在这本教材里选入了当代小说家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长恨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莫言的《红高粱》。²⁵这些中国当代小说有获得矛盾文学奖的，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么多优秀作品却没有选入语文教科书，是一种不足。它们被选入选修课本，可以发挥它们对必修教材的弥补作用。

这些选修文学课本的选文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它们丰富了当代文学教育，虽然教科书上很少选入它们，但是教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可以选入这些文本。教师对文本的选择，就是一种教育干预，这是文学经典形成的一种途径；通过当代文学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和审美能力，这就是对当代文学进行诠释和传播，这就促进当代文学经典的形成。难度在于语文老师要有扎实的文学功底，才能把这些中国当代作品融入文学教学中。

第四节 古代文学选文与文学教育

古代文学选文在这一系列教材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它们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承担着什么样的教学任务？有文学教育任务吗？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论述了高中文学选文主要承担着语文知识教育、文学教育、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那作为占主要数量的古文又是怎样的呢？在这一章节中主要探讨这个问题。

²⁴ 以上内容整理自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 年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

²⁵ 以上内容整理自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 年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国小说欣赏》。

表 10: 人民教育出版社 13 套高中语文教材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篇数对比统计表

年代	古代文学	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	外国文学	作品总数	古文占作品总数比例
1952 年	42	26	29	11	108	38.9%
1956 年	92	12	9	0	113	81.2%
1958 年	5	15	31	3	78	6.4%
1959 年	32	30	39	10	110	29.1%
1960 年	43	42	40	10	135	31.9%
1963 年	82	38	23	15	158	51.9%
1978 年	34	34	33	11	112	30.4%
1982 年	79	45	54	13	191	41.4%
1986 年	37	27	15	6	89	41.2%
1990 年	58	35	53	10	150	38.7%
1996 年	88	25	73	27	214	41.1%
2003 年	96	22	44	27	189	50.8%
2007 年	44	15	7	19	85	51.8%

来源：以上内容整理自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2 年版、1956 年版、1958 年版、1959 年版、1960 年版、1963 年版、1978 年版、1982 年版、1986 年版、1990 年版、1996 年版、2003 年版、2007 年版共计 13 套教材。

根据以上统计表可以看出古代文学作品所占篇目最多，所占比例最多，如：1956 年 92 篇，所占比例为 81.2%；1963 年 82 篇，所占比例为 51.9%；2003 年 96 篇，所占比例为 50.8%；2007 年 44 篇，所占比例为 51.8%。至于其他各套，除了 1958 年，每套的比例都在 30% 以上。

尤其是前六套教材的古文数量经过 1958 年的低谷后，又开始递增，直到 1963 年得到 51.9% 的比例；而后七套教材也是逐年递增趋势，从 1978 年的 30.4% 达到 2007 年的 51.8%。在这两个时期都有一个突然变低的时间点，前者为 1958 年，只有 6.4%，后者为 1990 年，只有 38.7%。除此时间点外，古代文学作品选文都呈现递增趋势。

为何出现这种突然递减点呢？这和中国高中语文课本所要完成的教学任务有关。以 1958 年为例，那是中国特别的政治时期，一切为政治服务，这反映在语文课本上就要体现思想教育功能，此时文学性强的作品就被排除在外，选了很

多歌颂革命与建设的文章。再加上 1956 年版教材缺少思想和语文知识教育，故而大力抛弃文学类作品。1990 年版，也是中国出现过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波后，国家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这反映在语文教科书上就是突然改变历年古文递增的趋势。总之在这十三套教材中，当国内政治环境不稳定时，语文课本承担的思想教育功能就会加强，此时就会大大压缩古文选文的数量。

那古代文学作品为何成为语文教科书主要的选文？从语文学科的性质上讲，古代文学选文主要承担语文知识和文学教育的功能。以前六套教材为例，1952 年版、1959 年版、1960 年版和 1963 年版，主要是承担语文知识教育。1956 年主要承担文学教育功能。以后七套为例，每套都是承担着语文知识功能，但要注意两个时间点，一个是 1986 年开始在语文教学大纲中明确语文教学要有文学教育，也从此时开始语文教育开始进入系统的文学教育时期，而古代文学作品也是被大量选入时期；一个是 1996 年版，此时语文大纲要求语文教学要承担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任务，而传统文化主要载体就是古代文学作品，如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而这些作品被大量选入课文，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古代文学作品选入呈现出递增趋势，如 1996 年版的 41.1%，2003 年版 50.8%，2007 年 51.8%。因此文学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加强，推动了古代文学选文数量的增加。

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看，承担这个教育任务的主要是 1956 年版，92 篇全是文学教育的载体，1986 年版、1990 年版、1996 年版、2003 年版和 2007 年版的文学教育是一步步增加的。可以看出，前六套教材中古文承担的文学教育是昙花一现，而后七套古文承担的文学教育是徐徐渐进。不过 1956 年版的教材为后面文学教育版开了一个好头，后面以 1956 年和 2007 年两套教材为例探讨古文承担的文学教育功能。

首先与 1956 年的文学课本中的诗歌相比，本版课本所选诗歌 23 首，占选文比例 31%，诗歌以古代诗歌为主，现当代诗歌为辅，除了 3 首是现当代诗歌外，都是古代诗歌，而古代诗歌中又以唐宋诗词为主，兼顾魏晋南北朝诗歌，而 1956 年文学课本的诗歌 56 首，占选文比例 50%，诗歌全是古代，没有现当代诗歌，古代诗歌选自各个时代的作品，以文学史编排为编排体系，做到每个时代都有代表作品。通过对比可以看出 2007 年版的诗歌选文容易教学，不足在于它不能向学生全面反映古代诗歌文学整体情况。

2007 年版所选小说 13 篇，占选文比例为 15%，中国小说 7，古代小说 4 篇，现代小说 3 篇，没有当代小说。外国小说以西方为主，没有苏联作品。而 1956 年文学文本，小说 22 篇，所占选文比例是 19%，古代小说 14 篇，现代小说 5 篇，当代小说 3 篇，没有外国小说。通过比较，2007 年版的小说选文优点在于有中外小说的结合，不足在于没有一篇反映时代的当代小说，与时代脱节。但二者的共同点都是以古代小说为主进行文学教育。

2007 年版所选戏剧共 4 篇，中外各两篇，中国两篇，古代一篇，现代一篇，所占选文比例是 5%。1956 年文学文本，戏剧 2 篇，古代一篇，当代一篇，所占比例 4%。二者共同点在于选文中是最少的，但比起 1956 年的文学文本而言，2007 年版增加了不少，还增加了西方戏剧。不足在于，2007 年版的戏剧还是没有当代作品，缺少时代气息。当中所选散文共计 45 篇，所占选文比例是 49%，其中古代散文 20 篇，现代散文 7 篇，当代散文 7 篇，外国散文 11 篇。而 1956 年的散文共计 31 篇，全是中国散文，没有外国散文，其中古代散文 20 篇，现代散文 6 篇，当代散文 5 篇。两者相比较，2007 年版中外散文都有，兼顾中外，但更是以古文为主。

通过比较，得知 2007 年版的选文比 1956 年，共同点在于都是选择名家名篇。不同点在与前者在教学上容易入手，选入不少外国文学作品，更具有开放新，多元性，不足在于诗歌、小说和戏剧缺少反映时代文学作品，与时代脱节，不过在古代文学的教育上，更加全面。

另外从文本承担的任务上看，2007 年文本承担了语言教学任务、文学教学任务和文化教学任务，而 1956 年只有文学教学任务。因此，2007 年版功能更齐全。同时由于是三个任务都有，在实际教学中相互促进，因而更有利于文学教育。

2007 年教科书分为必修课本和选修课本，必修是各类高中生共同学习的课程，在高一、高二和高三，共五册，而选修课是为学生主动选择和学习提供的内容，是必修课本的补充。这与 1956 年相比有相同之处，都提供了教科书的补充内容，只不过 1956 年只提供课外阅读参考书目，而 2007 年提供了统一编写的选修课本。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必修课本。必修课本的内容分为“阅读鉴赏”、“表达交流”、“梳理探究”和“名著导读”。前 3 部分纳入课内学习计划，“名著导读”可在课外自主安排。而论文所选择研究的文本只是“阅读鉴赏”，这是因为能够为研究提供选文支撑，另外这部分是教科书的主体，这与前后十三套教材共同之处在于提供教学的文本。“课本的是分单元编排，单元的组成考虑文体与人文内涵。每册由 4 个单元组成，学习重点各有不同：有的侧重于对形象性较强的文学作品进行品味和鉴赏，有的侧重于对思辨性较强的说理文章进行思考和领悟，有的侧重于应用性较强的文章的阅读理解。”（袁行霈主编，2007：1）。

通过对 1956 年版和 2007 年版两套教材中古代文学选文的比较可以得出，古代文学是高中文学教育的主要载体，承担着文学教育的主要任务，它从文学知

识，文学审美能力和文学创作能力对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培养。不过 1956 年的古代文学选文只是承担文学教育，忽视了其作为语文课本选文这一基本事实，导致任务单一，最终被改变；而 2007 年版语文教材经过多年的实践和修订，能比较全面兼顾各项教学任务，使其得以发展，从而成为一套接受度较高的语文课本。

第五节 小结

中国国家教育政策从为政治服务，发展到为经济服务，再发展到为国民服务，这是教育个性发展观在中国教育政策中的体现。在语文教育中，能够体现个性发展观的是文学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中的审美教育，它主要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特的审美情趣、审美感知、审美创造能力等个性化的品质。由于文学教育的载体是高中语文课本的文学文本，因此这一时期课本的文学选文都发生了相应的嬗变，一是课本由过去的“一纲一本”变成“一纲多本”，一是课本中非文学散文越来越少，文学选文越来越多，一是语文课本出现必修课本和选修课本，这些课本或者选文的变化是为了适应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的。因此文学教育的工具性体现在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上，通过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有利于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

文学教育使学生获得审美能力、提高文化涵养、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提高思维能力等，这样才能使文本的文学功能得以体现，这个过程就是教师对文本的诠释与传播的过程，也就促进了这些文本文学经典的形成。文学文本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任务、语言教育任务、文学教育任务、文化教育任务，文学文本承担这些教育任务的过程，虽然也促使了这些文学经典的形成，但是把审美教育作为文学教育的核心和主导来促使文学经典形成只有 1956 年版、1986 年版、1990 年版、

1996年版、2003年版和2007年版共计6套教材，就是说从文学教育角度形成文学经典也只有这六套教材，同时古代文学作品承担着重要的文学教育任务。这六套教材中，鲁迅的《药》、《祝福》、《阿Q正传》等作品就是在文学教育中形成文学经典的进一步传播。文学教育对文本的诠释与传播的过程，是文学经典形成的过程，因此文学教育有利于文学经典的形成。

由于语文必修教科书缺少当代文学，尤其是诗歌、小说、戏剧不足，这就使文学选文缺少时代性，既不符合高中语文新课标选文体现时代性的要求，又会影响学生对文学学习的兴趣，更不利于这些文学作品经典的形成，教师可以从选修课本里选择文本进行教学，选修课本主要是文学作品，大多数作品都是写于1978年后的诗歌、小说、戏剧以及影视剧本。选入这些文本进行文学教育，可以提高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促使文本经典的形成。

进行文学教育是语文课程改革的必然结果，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它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有利于文学文本经典的形成。

第六章 结语

高中语文课本选文的形成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国家的语文教学政策，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国家的整体教育政策，国家的整体教育政策影响语文教学政策，而语文教学政策又影响语文课本的形成；二是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发展状况。语文学科性质决定语文的教学任务，语文的教学任务又影响语文课本选文的选择。

高中文学教育是语文教育任务的一部分，语文课本是进行文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而语文课本的教育内容是受到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程度的制

约。在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争论时期，语文教育任务中思想政治教育、文学教育和语言教育三者是不相容的，即使当时的语文课本的选文主要是文学文本，但也很少进行文学教育，主要用来进行思想政治和语言教育，当然也出现 1956 年的文学课本，文学文本给文学教育带来了新气象，但它却忽略了文学教育依然是语文教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剥离思想政治教育和语言教育，是与当时的时代相违背，也是违背语文学科性质，这也注定了文学教育的失败，但有系统的文学教育，如文学史知识、文学赏析和文学理论知识学习，为改革开放后重新重视文学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改革开放后的七套教材中，是人们对语文学科认识的探索时期，语文的工具性得以确立，最后发展到语文不仅是重要的交际工具，还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让语文课本的教育任务由语言教学，增加到文学教育和文化教育，文学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进行语言教育的文本主要是文学文本，这样文学教育的文本就更加的丰富。在 13 套教材中散文一直是主要的体裁，但从 1996 年课本开始，它的比重开始下降，到 2007 年，散文比重以低于 50%，这为诗歌、小说和戏剧文本让出了很大的空间，这也是 1956 年文学课本后第一次出现诗歌、小说和戏剧所占比例超越散文。2007 年的课本中文学教育是后七套教材里最重视的，通过和 1956 年教材的比较，它不仅重视文学教育还有语言和文化教育，课本的编排体系受到 1956 年影响，又有不同，这时的文学教育还有很多自己的辅助系统。可见在这 13 套教科书中，随着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深入，文学教育是愈来愈受到重视。

人民教育 13 套课本选文嬗变整体的特点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非文学文本越来越少，思想政治教育在弱化；进行语言教育、文学教育、文化教育的文学文本越来越多，尤其是进行语言教育和文化教育的文本主要是文学文本，因此进

行文学教育的文学文本是越来越多，这说明文学教育得到了重视，这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审美教育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语文教育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教育、文学教育和文化教育，教师在使用选文进行这些教育的过程中，对选文进行不停的解释与解读，这就是一种诠释，因此语文教学的过程就是一种文学经典形成的过程。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看，通过对文学文本的阅读、解读和接受，培养学生的情感体念、审美能力，以及认知能力的过程，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对文学作品的传播与诠释，文学教育的过程就是文学经典形成的过程。

古代文学选文占据着十三套教材的主要部分，它们主要承担着语文知识教育、文学教育和文化教育。主要体现在 1956 年版、1986 年版、1990 年 1996 年版、2003 年版和 2007 年版共计六套教材中。其中比较系统进行文学教育的教材主要是 1956 年版和 2007 年版。作为文学教育的主要载体的古代文学作品，应该在高中文学教育中被继续开发，使之为文学教育服务。

13 套教科书有一个典型的缺点，就是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小说和戏剧，选入课本很少，课本选文时代性不足。特别是从 1986 年开始进行文学教育后，当代诗歌、小说和戏剧愈来愈少，尤其是 2007 年最重视文学教育的课本连一篇当代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都没有，1956 年的文学课本也同样存在缺少当代诗歌、小说和戏剧选文的问题。这种文学作品脱离时代的问题，必然会影响学生对文学学习的兴趣，如果不把这些作品用来进行文学教育，那么就不利于这些当代作品形成经典，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充分利用人民教育出版社针对必修教材编写的选修教材，这套教材主要文学课本丰富，所选的作品包括很多当代诗歌、小说和戏剧，教师利用好这些资源就能够解决教科书这些作品不足的问题。教师在教学中把这些作品选入文学教育中的当代文学教育，这是一种传播，在教

学中进行阅读与讲解，这是诠释，因此对学生进行当代文学教育，就是使当代文学经典形成的过程。

鲁迅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作品入选课本主要是因它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无可动摇的地位决定，同时也受到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影响，在文学教育文本里，他的作品很少，在思想政治教育和语言教育时期，他的杂文和小说就很多。在进入改革开放后，他的作品在课本中的出现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原因在于人们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更加深入与丰富，这样语文教育承担的任务更多，需要的选文更多，选择面就更多，他的作品就少了。由于他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教科书依然还在选入他的作品。在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的时期，鲁迅作品经典的形成，主要是国家因意识形态的教学干预下形成的；在文学教育时期，鲁迅作品的经典形成，主要是因为他作品的文学成就被作为文学教育的载体，从而促使其文学作品经典的形成。

以上就是研究发现，不过这些研究还存在不少限制。

一是 1978 年后鲁迅作品在课本中出现得愈来愈少的原因，目前缺少官方的解释材料作为佐证，只是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

二是对选修教材的使用情况没有详细的统计资料，尤其是在应试教育的指引下，很多教师和学校对选修教材的使用情况很低，需要这方面的统计资料加以论证，但目前没有。

笔者今后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在如何处理选修教材选文和必修教材选文的关系上。

通过研究得知，中国语文课本是有文学教育的，文学教育在教科书是不断得到重视，但在选文中缺少当代诗歌、当代小说和当代戏剧选文。虽然笔者建议

可以充分利用选修教材的选文来弥补教科书的不足，但问题是这些教材的选择主要是一线的教师，他们不仅面临着应试教育的压力，必须使用好必修教材，又要面临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的压力，适当用好选修教材。如何寻找到一种能处理必修教材和选修教材的关系的方法，就是今后研究的方向，也是笔者今后教学的实践。笔者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教师要提高文学修养上，其次是如何整合两种教材资源的问题，最后如何发挥教学单位力量，在整合了的资源上构建属于本校的文学教材。

引用文献

1. (英)爱德华·泰勒(1992), 连树声译, 《原始文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 白颢(2011), 《中学文学教育研究》,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3. (俄)波兹德涅耶娃(2000), 《鲁迅评传》, 吴兴勇、颜雄译,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4. 陈思(2014), 《新时期人教版高中语文选文变革研究》, 新乡: 河南师范大学。
5. 陈思和(2001), 《当代大陆文学史教程》, 台北: 联合文学。
6. 陈文忠(2007), 《文学理论》,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7. 董学龙(2014), 〈论新课标下的中学文学教育〉, 《文学教育(上)》, 2014年第9期,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页60-72。
8. 范冬梅(2003), 《论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文学教育》,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9. 樊华强(2013), 〈经典性抑或时代性:语文教材选文标准辨析〉, 《当代教育科学》2013年第8期, 页61-62。
10. 冯雪峰(1985), 〈鲁迅的政论活动〉, 选自《雪峰文集》,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页450。
11. (荷)佛克马 蚁布思(1996), 《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2. 郅元宝(2000), 〈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 郅元宝、程光炜、吴晓东、孔庆东、刘勇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页53-79
13. 顾振彪(2001a), 〈人教版1963年初中、高中语文课本介绍〉, 收录自《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 北京: 语文出版社, 页551-562。
14. 顾振彪(2001b), 〈面向21世纪, 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质---人教版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试验本)介绍〉, 收录自《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 北京: 语文出版社, 页638。
15. 顾振彪、顾之传、温立三主编(2003a),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6. 顾振彪、顾之川、温立三等（2003b），《高中语文试验修订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7. 顾振彪、顾之川、温立三主编（2007），《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8. 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1996），〈1996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实验用）〉，收录自《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2001），北京：语文出版社，页476。
19. 郭英德（2006），〈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学教育研究〉，《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页11。
20. 洪子诚（1997），《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台北：青文书屋。
21. 黄耀红（2004），〈新中国中学文学教育的发展流变与反思〉，《教师之友》，2004年第9期，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页32-40。
22. 教育部（1999），《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收录自《人民教育》2001年第9期，北京：中国教育报刊社，页6-8。
23. （英）雷蒙德·威廉斯（1991），《文化与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4. 李慧涛（2011），《新课标下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文分析》，济南：山东师范大学。
25. 李艳梅（2012），《文学教育与当代文学的启蒙意义》，临汾：山西师范大学。
26. 林玫仪（2013），《文学经典的传播与诠释》，台北：中央研究院。
27. 刘国正主编（1978），《高中语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8. 刘国正主编（1982），《高中语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9. 刘国正（2000），〈似曾相识燕归来——中学文学教育的风雨历程〉，《课程教材教法》2000年第6期，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页18-22。
30. 刘真福（2001），〈建国以来中学文学教育评述〉，《课程教材教法》，2001年第6期，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页35-39。
31. 鲁定元（2005），《文学教学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32. 鲁迅（2005a），〈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页3-8。

33. 鲁迅（2005b），〈南腔北调.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文学出版社，页 525-528。
34. 鲁迅（2005c），〈且介亭杂文.序〉，《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文学出版社，页 3-4。
35. 洛寒（1961），〈反对把语文教成政治课〉，《人民教育》1961 年第 8 期。
36. 洛寒（1963），〈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人民教育》1963 年第 1 期。
37. 毛泽东（196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38. 孟抗美（2002），《文学艺术教育》，北京：人民出版社。
39. 钱理群（2003），《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0. 秦春（2009），《中国文学教育历史轨迹及价值反思》，苏州：苏州大学。
41. 覃善萍（2002），《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学教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42. 人民日报社论（1951），〈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奋斗〉，《人民日报》1951 年 6 月 6 日第一版。
43.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部语文组（1952），《高中语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44.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部语文组（1958），《高中语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45.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部语文组（1959），《高中语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46.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部语文组（1960），《高中语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47.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部语文组（1963），《高中语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48. 沈玉荣（2006），〈从接受美学看中学文学教育目标的设定〉，《江苏教育学会 2006 论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页 20。
49. 申小龙（1996），《文化语言学论纲》，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50. 史荣光（1996），〈“一纲多本”中学语文教材的调研报告〉，《教育改革》1996 年第 2 期，页 9。

51. 孙玲（2007），《多元文化语境下高中语文课本选文取向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52. 孙杨（2013），《地域文化视野下我国高中教材编制问题研究》，渤海：渤海大学。
53. （美）泰勒（1994），《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54. 谭家健（2010），《中国古代散文史稿》，重庆：重庆出版社。
55. 田朋朋（2011），《新时期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文变动研究》，重庆：西南大学。
56. 王光祖、赵百强、陈文高、盛子明（2001），〈以训练阅读能力为主线，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质---上海 H 版中学语文课本简介〉，收录自《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北京：语文出版社。页 703。
57. 王红军(2013)，〈新课程.呼唤民族文化的回归〉，《中学课程辅导》，南京：中学课程辅导杂志社，页 3-4。
58. 王雪艳(2003)，《还中学文学教育以本来面目》，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59. 严家炎（1983），〈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求实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 82。
60. 叶圣陶（1955），〈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人民教育》1955 年第 8 期。
61. 叶圣陶（1980），《叶圣陶语文教育论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62. 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编（1955），〈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人民教育》1955 年第 3 期。
63. 余宇士（2011），《新课程背景下的中学文学教育研究》，贵阳：贵州师范大学。
64. 袁行霈主编（2007），《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65. 张毕来、王薇、蔡超尘主编（1956），《高中文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66. 张传宗（1984），〈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和其他任务〉，收录自《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北京：语文出版社。页 10。

67. 张传宗（1999），〈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和其他任务〉，《中学语文教学》，《中学语文教学》1999年第8期，页10-11。
68. 张亚飞（2007），《现代文学的接受与中学文学教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69. 张则桥（2003），〈基于新课标下的文学教育〉，《新课程研究》，武汉：长江报刊传媒集团，页21-25。
70. 张志公（1994），〈语文教学同现代化建设接轨〉，《中学语文教学》1994年第12期。页1-3。
71. 中共中央（194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收编自《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2004），北京：中国法治出版社。页109-122。
72. 中共中央、国务院（199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决定》，收录自《高校理论战线》，1999年第7期，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页4-9。
7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56），〈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收录自《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北京：语文出版社，页377-402。
7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63），〈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收录自《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北京：语文出版社，页404。
7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1978），〈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收录自《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2001），北京：语文出版社，页378。
7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1986），〈1986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收录自《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2001），北京：语文出版社，页445-446。
7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1990），〈1990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本）〉，收录自《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2001），北京：语文出版社。页470。
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0），《2000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7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1），《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学科教育》2001年第7期。

8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3），《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新课程标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8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1958），《钱俊瑞副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点》，收编自《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印，页 8-11。
8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195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收编自《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印，页 4-9。
83. 周正逵（1988），〈中学文学教育浅谈下〉，《中学语文》，1988 年第 5 期，武汉，页 1-3。
84. 庄文中、顾之川、刘真福等（1996），《高中语文实验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85. 庄文中、王文英主编（1990），《高中语文》，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86. 庄文中、王文英（2001），〈人教版 1990 年高中语文课本修订介绍〉，收录自《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2001），北京：语文出版社。
87. 朱羽(2007)，〈叙事学与中学文学教育〉，《语文教学通讯》，2007 年第 32 期,西安，页 4-6。
88. 朱晓进（1996），《鲁迅文学观综论》，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